

目 录

—

-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 8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 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
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10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12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 达赖喇嘛和谭冠三将军的来往信件.....14
(附达赖喇嘛原信照片)
- 班禅额尔德尼致毛主席周总理的电报.....20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三月
二十八日的命令的决议.....22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
- 拉萨市各族各界人民坚决彻底平息叛乱大会给
西藏地区各族各界同胞的电报.....24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26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叛匪司令部繳獲的文件……………32

(附原件照片)

二

周恩來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

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關於西藏情況部分……………39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

會議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43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
會議通過)

班禪額爾德尼和其他藏族代表在第二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一) 班禪額爾德尼的發言……………47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二) 阿沛·阿旺晉美的發言……………55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三) 阿旺嘉錯的發言……………64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四) 喜饒嘉錯的發言……………69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五) 黃正清的發言……………80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班禪額爾德尼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

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86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三

不能允許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損害

-“人民日报”观察家評論 98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 評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新华社政治記者 99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
- 欢呼討平西藏山南叛匪的重大胜利 106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 讀尼赫魯总理的談話“人民日报”評論員 110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西藏人民的新生章 魯 116

四

-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人民日报”編輯部 131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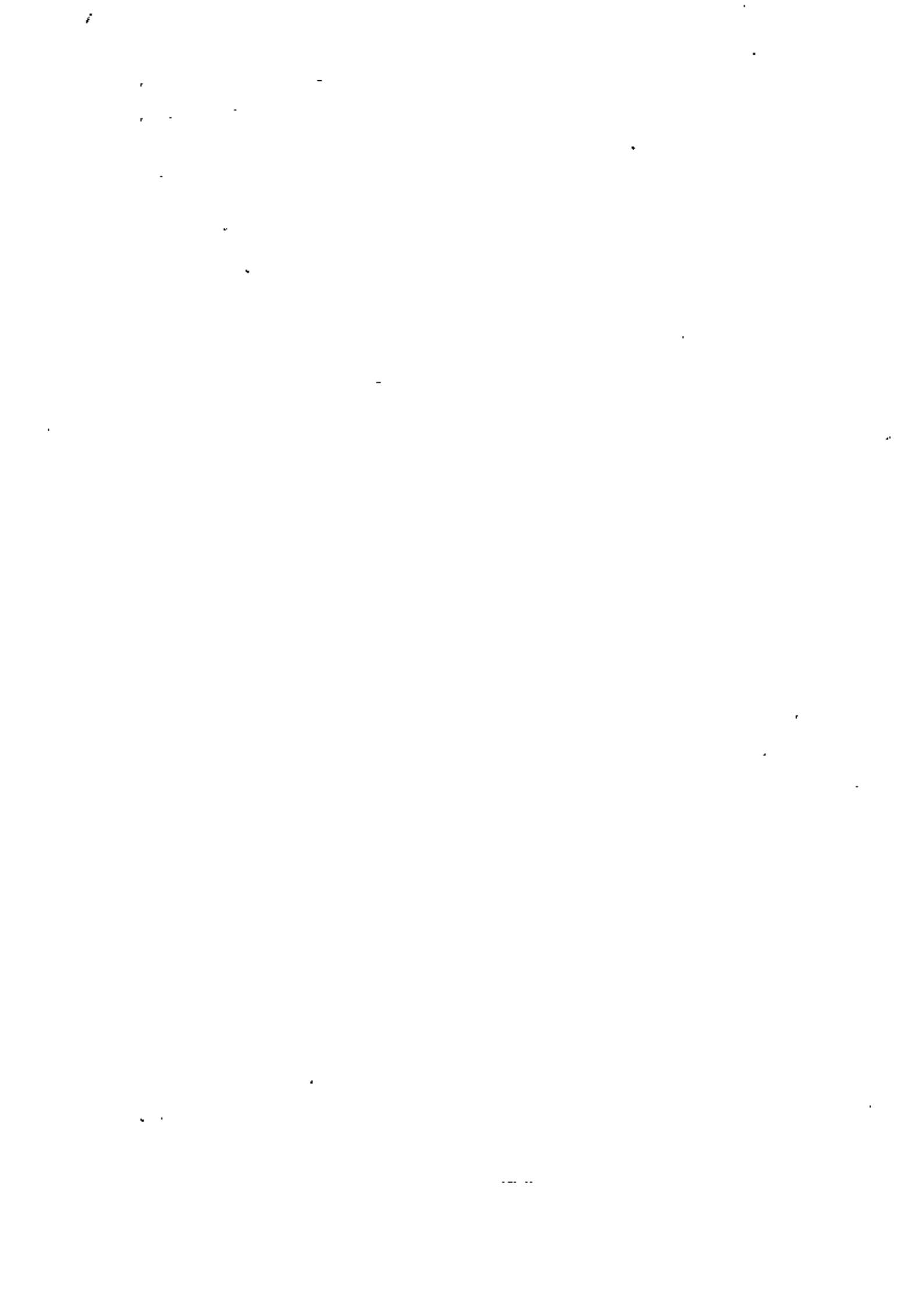
-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印中友誼的決議 161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
- 弥补損害印度共产党总書記 高 士 166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六

- 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发表的所謂“达賴喇嘛的
声明” 175

四月二十二日在穆索里发表的所謂“达賴喇嘛 的声明”	179
尼赫魯三月二十三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勢 发表的声明	181
尼赫魯四月二十四日与达賴会談后发表的談話	184
尼赫魯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勢 发表的講話	187
尼赫魯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再就西藏局勢 发表的講話	197
尼赫魯五月八日在印度人民院討論“西藏問題” 时发表的講話	207

—



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間在拉薩向人民解放軍駐軍发动武装进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队奉命討平叛乱，已在二十二日彻底地粉碎了拉薩市区的叛匪。現在我軍正在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的协助下，繼續向西藏一些其他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蕩中。

为了维护祖国統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三月二十八日发布命令，除了責成西藏軍区彻底平息叛乱以外，决定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薩的武装叛乱，三月十日就开始了。达賴喇嘛原定在三月十日到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礼堂看戏。到軍区礼堂看戏的事，是达賴喇嘛自己在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三月十日这个日期，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西藏叛乱集团到了这一天，却大肆散布西藏軍区部队要扣留达賴喇嘛的謠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賴喇嘛，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且當場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

官員堪勞索朗降措，打傷西藏軍區藏族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等人。叛亂武裝同時包圍了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司令部和中央駐在拉薩的機關。

西藏叛國分子的叛亂活動，由來已久。這些叛亂分子代表帝國主義和西藏最反動的大農奴主。自從一九五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以來，他們就蓄謀撕毀這一協議，準備武裝叛變。由於祖國日益繁榮昌盛，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政策正確，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紀律嚴明，受到西藏各界人民熱烈愛戴，這一小撮反動分子的叛亂陰謀在藏族人民中得不到支持。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規定，歷來堅持國內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團結，在西藏實行民族地方自治，這是西藏人民所熱烈歡迎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早已於一九五六年四月成立。但是，由於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動分子的阻撓，自治區的籌備工作很少進展。十七條協議中規定藏軍要改編，西藏社會制度即農奴制度要按照人民願望加以改革，這兩項重要任務，都因為反動分子的阻撓，不能實現。中央為了等待這些反動分子的覺悟，還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告訴他們，在六年內，即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可以不進行改革，也不改編藏軍。

西藏地方政府，藏語稱為噶廈，委員六人，稱為噶倫。在六個噶倫中，兩個是愛國分子，即阿沛·阿旺晉美和在三月十日被叛匪打傷的桑頗·才旺仁增。其餘四人中，字妥·扎西頓珠已在一九五七年叛離祖國，逃往叛亂分子在國外活

动中心的噶倫堡；另三人即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夏苏)，在这次也已經公开叛变。在这以前，这些叛国分子即已利用他們在噶厦中的合法地位，糾集上层反动势力，勾結外敌，实际指揮康藏两地一些最反动的大农奴主，在雅魯藏布江以东、以北、以南若干地方，組織叛乱武装，反对中央，背叛祖国。他們的叛乱是受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叛乱的指揮中心在噶倫堡，其領袖为被撤职的前任藏王(藏語称为司曹)魯康娃·澤旺饒登。他們的武器，不少是从外国輸入的。在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叛乱根据地，就有多次接受蔣介石匪帮的空投接济，还設有帝国主义和蔣介石派遣的許多特务电台，进行阴谋活动。

从去年五、六月間起，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就指示叛匪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破坏交通，劫掠財物，奸淫燒杀，殘害人民，并且袭击中央派駐当地的机关、部队。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責懲办叛乱分子，維護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軟弱可欺。他們說，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們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們不敢平叛，只是要我們負責平叛；只要我們从外地調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拉薩，給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們就把达賴佛爷架往南山，聚集力量，舉行反攻，夺回拉薩；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們的，可能援助我們；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

蔣總統，已經積極援助；達賴是神，誰敢不從？美國人說過，中國人民公社鬧的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現在是驅漢自立的大好時機，云云。這些反動派的靈魂，已經飛到九霄雲外，簡直要管領整個宇宙了。因此，他們非但不負責制止叛匪的騷擾，反而變本加厲，積極進行叛國的陰謀活動。他們在拉薩集中了相當數量的反革命武力以後，終於在三月十日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武裝叛亂。

在三月十日拉薩叛亂爆發以後，達賴喇嘛曾三次給中央駐藏代表來信，說明他已被反動分子劫持，並且表示正在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中央代表在復信中歡迎達賴喇嘛這種態度，同時表示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變錯誤態度，負責平息叛亂。但是，這些反動分子不但毫不悔改，還決心擴大叛亂。他們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並且在三月十九日夜間向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發動了全面進攻。和平解決的希望消滅了。西藏反動勢力最後選定了使他們自己走向滅亡的道路。

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部隊奉命對罪大惡極的叛國集團進行討伐。人民解放軍在藏族愛國僧俗人民的協助下，經過兩天多的戰鬥，已經徹底地粉碎了拉薩市區的叛亂。據初步統計，截至二十三日止，已俘獲了叛軍四千餘名，繳獲了各種槍八千餘支，輕重機槍八十一挺，八一迫擊炮二十七門，山炮六門，子彈一千萬發。許多叛軍在我軍包圍後成股地投降。

拉薩叛亂的迅速平定，說明西藏叛國集團必然滅亡，西藏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這首先是因為，西藏人民是愛國

的，他們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国分子。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人，而叛匪只有两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因为被欺騙裹胁而参加的，并且还包栝一部分由金沙江以东原西康省地区逃跑过去的叛乱分子，即所謂康巴人。西藏人民絕大多数是极端貧苦的农民和牧民，他們迫切地希望从世界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西藏上层和中层也有許多爱国进步人士，他們拥护中央，反对叛乱，并且主张民主地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西藏逐步地变为一个文明进步的地方。这样，西藏已有一个坚决要求解放的劳动阶级，和很大一部分贊成改革的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中間派人士。目前的任务，首先是平息叛乱，建立和平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对于叛乱分子的方針是：首恶必办，胁从不問，立功受奖。中央已指示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广泛团結一切沒有参加叛乱的藏族同胞，負責保护西藏农牧工商政教各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对于俘虏和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不許报复、伤害和侮辱。

中国政府方面認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信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現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沒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則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

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魯先生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

鉴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尚被劫持，国务院决定在达赖喇嘛被劫期间，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并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常务委员帕巴拉·卓列朗杰活佛

和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阿沛并兼任秘书长。在西藏各地，一俟秩序恢复，都将陆续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并开始执行自治职权。在目前时期，自治制度与人民解放军的军管制度同时并行。随着叛乱的平息，和平秩序的建立，自治制度将逐步完全代替军管制度。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势力把西藏的形势完全估计错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

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 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查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叛乱，残害人民，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并且于三月十九日夜間指揮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发动全面进攻。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統一的行为，实为国法所不容。为維護国家統一和民族团結，除責成中国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員达赖喇嘛·丹增嘉錯被劫持期間，由班禅額尔德尼·却吉坚贊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职务。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員帕巴拉·卓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員；常务委員兼秘書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长。撤銷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夏苏)，宇妥·扎西頓珠，赤江·罗桑益西，噶章·洛桑日增，达拉·洛桑三旦，凱墨·索南旺堆，絨朝色·土登諾桑，帕拉·土登为登，欧

协·土登桑却,朗色林·班觉久美,敏吉林·嘉祥坚赞,呷日本·才旺多吉,庞球,威萨坚赞(功德林扎萨),貢噶喇嘛,楚普噶玛巴·日貝多吉十八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員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別給予惩处。并任命邓少东,詹化雨,惠毅然,梁选賢,崔科·登珠澤仁,詹东·洛桑朗杰,噶登赤巴·土登滾噶,坚白慈里,阿沛·才丹卓噶,多吉才且,协繞登珠,坚贊平措,洛桑慈誠,群觉,平措旺秋,王沛生十六人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員。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藏僧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巩固国防,保护各民族人民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此令。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查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图谋叛乱，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他们即纠集和纵容叛匪，窜扰各地，破坏交通，劫掠商旅，奸淫烧杀，残害人民，中央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严惩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不但不负责平息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助长叛匪气焰。及至今年三月十日，西藏多数噶伦与上层反动集团，更进一步与叛匪结成一体，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破坏统一；公然杀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并且公然于三月十九日夜間向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发动全面进攻。罪大恶极，莫此为甚。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疾苦，本軍奉命討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軍，討平叛逆，不窝匪，不資敌，不給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軍将本寬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来归者，一概不咎既往；有立功表现者，給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

頑抗者，嚴懲不貸。本軍紀律嚴明，維護群眾利益，保護農牧工商各業，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尊重群眾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保護文物古蹟。望全體僧俗人民，一律安居樂業，切勿聽信謠言，自相驚擾，切切此布！

司 令 員 張國華

政治委員 譚冠三

副司令員 阿沛·阿旺晉美

鄧少東

桑頗·才旺仁增

副政治委員 詹化雨

王其梅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达賴喇嘛和譚冠三將軍 的来往信件

下面发表的是在三月十日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以后，到三月十七日夜間达賴喇嘛被劫出拉薩以前，达賴喇嘛和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六封来往信件。达賴喇嘛的三封信都是他亲笔写的。

拉薩的叛乱是在达賴喇嘛預定前往西藏軍区礼堂看戏的那一天发动的。要到西藏軍区礼堂看戏，并定在三月十日去看，都是达賴喇嘛自己决定的。西藏叛国集团經過事前布置，就放出西藏軍区部队要扣留达賴喇嘛的謠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在这一天在拉薩市区聚众把达賴喇嘛困在罗布林卡，并且公开实行武装叛乱。事件发生后，譚冠三將軍即在当天写了一封短信給达賴喇嘛，說明由于反动分子的叛乱，請他暂时不要来看戏。达賴喇嘛在十一日写信給譚冠三將軍，信中說：“反动的坏分子們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設法平息。”

三月十一日，譚冠三將軍写信給达賴喇嘛，指出反动分子公开进行軍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負責立即予以制止。

三月十二日，达賴喇嘛复信給譚冠三將軍，再次說明反动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間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事件”，并表示他“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三月十五日，譚冠三將軍写信給达賴喇嘛，說明中央对此次叛乱事件的态度，并欢迎达賴喇嘛正尽可能设法处理此次事件的态度。

三月十六日，达賴喇嘛写信給譚冠三將軍，說他已經向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进行了教育，并表示几天之后可能到軍区去。但是就在达賴喇嘛发出这封信的第二天，三月十七日夜間，叛国集团就将达賴喇嘛劫出拉薩，到拉薩东南的山南地区去。然后，在三月十九日夜，叛国集团就发动了对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队的全面进攻。

这六封信的全文如下：

（一）三月十日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致达賴喇嘛的信

敬爱的达賴喇嘛：

您表示願意来軍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們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謀挑拨給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譚冠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

（二）三月十一日达賴喇嘛致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信

亲爱的譚政委同志：

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忧虑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計較，送來的信（按：這是指譚冠三將軍十日致達賴喇嘛的信）出現在我眼前時，頓時感到無限的興奮。

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看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幾天以後，情況安定了，一定同您見面。您對我有何內部的指示，請通過此人（按：指阿沛·阿旺晉美）坦率示知。

達賴喇嘛親筆呈

（三）三月十一日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 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致達賴喇嘛的信

達賴喇嘛：

現在反動分子竟敢肆無忌憚，公開地狂妄地進行軍事挑釁，在國防公路沿綫（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機槍和武裝反動分子，已經十分嚴重的破壞了國防交通安全。

過去我們曾多次向噶廈談過，人民解放軍負有保衛國防，保衛國防交通安全的責任，對於這種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實難置之不理。因此，西藏軍區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蘇、帕拉等，請他們通知反動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並撤離公路。否則由此引起惡果，完全由他們自己負責。特此報告，您有何意見，亦請儘快告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譚冠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

**(四) 三月十二日达賴喇嘛致中央駐藏代理代表、
西藏軍区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信**

亲爱的譚政委同志：

昨天(按即三月十一日)經阿沛轉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駐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須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設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時間八点半鐘,有少数藏軍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鳴了几枪,幸好沒有发生大的騷乱。关于您来信(按:这是指譚冠三將軍十一日致达賴喇嘛的信)中提的問題,我現在正打算向下屬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囑托。

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見,請知心坦率的示知。

达 賴 十二日呈

**(五) 三月十五日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区
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致达賴喇嘛的信**

敬爱的达賴喇嘛：

您十一日、十二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經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

勾結外國人，進行反動叛國的活動，為時已久。中央過去一向寬大為懷，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認真處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則一貫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實際上幫助了他們的活動，以致發展到現在這樣嚴重的局面。現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變錯誤態度，立即負起責任，平息叛亂，嚴懲叛國分子。否則，中央只有自己出面來維護祖國的團結和統一。

您來信中說，對於“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對於您的這種正確態度，我們甚為歡迎。

對於您現在的處境和安全，我們甚為關懷。如果您認為需要脫離現在被叛國分子劫持的危險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話，我們熱忱地歡迎您和您的隨行人員到軍區來住一個短期，我們願對您的安全負完全的責任。究竟如何措置為好，完全聽從您的決定。

另外，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已決定於四月十七日舉行。特此告訴您。

此致

敬禮并祝保重

譚冠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六）三月十六日達賴喇嘛致中央駐藏代理代表、
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的信**

親愛的譚政委同志：

您十五日的來信，方才三點鐘收到。您對我的安全甚為關懷，使我甚感愉快，謝謝。

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三月十四日)我向政府官員等的代表七十余人講話,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認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則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責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現在此間內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員中从內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綫。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区,屆时先給您去信,对此請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見,請經常来信。

达 賴 十六日呈

(新华社1959年3月29日訊)

班禅额尔德尼致 毛主席周总理的电报

周总理并請轉毛主席：

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布告。

前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贯阻挠和破坏中央人民政府、西藏人民和爱国人士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所作的努力，一贯进行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活动，一贯反对西藏人民经过民主改革，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完全是反对和损害西藏人民利益，违背西藏人民意愿的反动行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他們的这些反动行为，过去一贯宽大为怀，不断晓以大义，耐心等待，給他們以悔悟的机会。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始終执迷不悟，反認以为强大祖国的中央“软弱”，无敌的人民解放军“可欺”。去年，他們支持和扩大了西藏的叛乱武装，到处危害西藏人民。今年三月十日以来，他們劫持达赖喇嘛，杀害爱国进步人士，迫害藏族干部和工人，公开地走上了叛国、叛人民的罪恶道路。并勾結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在三月十九日夜間，开始向人民解放军駐拉薩的机关和部队全面进行武装攻击。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罪行，表明

他們是祖國的叛徒，西藏人民的敵人，西藏藏族的敗類。他們的叛國罪行，為國法所不容，而且已經遭到西藏廣大人民和愛國人士的堅決反對。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堅決執行國務院命令，為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亂而採取的軍事行動，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因而受到西藏人民愈來愈廣泛、愈來愈熱烈的擁護。我個人並代表西藏僧俗人民，歡呼人民解放軍在平息叛亂中，已經取得的重大勝利。

我為達賴喇嘛遭到反動叛亂分子劫持的處境，對他深表同情和關懷。我希望他能夠早日擺脫反動叛亂分子的控制。在他被劫持期間，我完全接受國務院命令我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的工作。

我將竭誠努力，團結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滿懷信心地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平息叛亂，徹底粉碎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支持下，所搞的一切無恥的叛國勾當。我深信，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下，在祖國六億五千萬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援下，西藏人民和人民解放軍一起，一定能平息叛亂，一定能建設起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的新西藏。

● 偉大的祖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班 禪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 国务院三月二十八日的命令的决议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已公开走向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罪恶道路，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纠集叛匪，进行叛乱，残害人民，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并于三月十九日夜間指揮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发动全面进攻。我們对于这种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罪行表示万分的憤慨。同时，我們对于迅速平息了拉薩叛乱的英勇的人民解放軍表示衷心的感謝并致以亲切的慰問。我們完全拥护国务院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我們坚决彻底执行平息叛乱的命令和中央对于叛乱分子所采取的“首恶必办，胁从不問，立功受奖”的政策。为了迅速彻底平息叛乱，我們号召西藏各族各界全体僧俗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認真执行国务院的命令和西藏軍区以及各地軍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中所宣布的規定和任务，大力支援人民解放軍平息叛乱，肃清反革命分子，安定社会秩序。不要听信反动分子的謠言，并应积极进行生产。

原西藏地方政府各級行政人員應立即向當地軍事管制委員會或軍事代表登記，並且切實負責保管公共財物和文件，听候處理，不得有任何破壞和不法行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級行政人員以及全體僧俗人民，必須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協助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叛亂，鞏固國防，鞏固祖國的統一和民族團結，保護各族人民利益，安定社會秩序，為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而奮鬥。

拉薩市各族各界人民坚决彻底平息叛乱 大会給西藏地区各族各界同胞的电报

今天，我們拉薩市的各族各界人民庄严地举行了一个坚决、彻底平息叛乱的万人群众大会，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彻底平息西藏叛乱，解散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統一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并且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軍坚决彻底平息西藏叛乱。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长期进行叛国活动，妄图使西藏人民重新陷于帝国主义奴役的深渊。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一直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等待这些反动分子的觉悟，广大劳动人民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残酷統治下，也忍受了許多难言的痛苦。但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寬大的态度認为是軟弱可欺，更加变本加厉地勾結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背叛祖国、撕毀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公然发动武装叛乱，迫使西藏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进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忠实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一貫地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帮助西藏地区发展各項建設事业，給我們发放无息农牧貸款，兴办医

院、学校，修筑公路河堤，处处为西藏人民的利益着想，凡此种种，事实昭著，有目共睹。广大僧俗人民都深深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衷心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

现在，反动透顶的公开进行叛国活动的西藏地方政府已被解散，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罪恶活动已遭到粉碎，被奴役被压迫的西藏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要彻底揭发和控诉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匪帮和外国反动派背叛祖国、发动武装叛乱的滔天罪行，我们坚决要求彻底平息西藏的叛乱。

我们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衷心响应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一切号召，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保卫各民族的团结，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坚决彻底平息叛乱，肃清一切公开的和隐藏的叛乱分子，使西藏广大僧俗人民过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决心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搞好今年的生产，抓紧农时，及时下种，不荒掉一亩土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人民已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让我们的力量象汹涌澎湃的雅鲁藏布江一样，把一切阻碍西藏社会前进的叛乱分子，冲洗得干干净净！让西藏沿着光辉灿烂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拉萨市各族各界人民坚决彻底平息叛乱大会

公元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藏历土猪年三月八日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罪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已经奉命彻底平息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已经发布命令，解散这次叛乱的组织者西藏地方政府，并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已经迅速荡平了拉萨地区的叛乱，并且正在肃清西藏其他一些地区的叛匪。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央措施，声讨叛国集团，全国其他地方的各民族人民，也都一致声讨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我们向遭受叛匪蹂躏的西藏各界同胞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在平定叛乱中建立功勋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它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有过自己的贡献。但是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由于满清

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也由于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对内奴役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西藏人民长期陷于黑暗、穷苦和落后的深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从那时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一贯地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逐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实现民主改革的政策。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努力促进汉藏两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中央也尽力促进藏族内部、首先是达赖喇嘛和班禅之间的团结。一九五六年四月，经过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充分协商，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并广泛吸收藏族各阶层人士参加。进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贯严守纪律，爱护人民，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取群众一针一线，并且举办农场、工厂、医院和学校，修桥筑路，帮助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因为这一切，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受到了西藏各界广大群众的热烈爱戴。

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实行改革，要使西藏繁荣进步是不可能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西藏军队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虽然如此，鉴于西藏地方的特殊历史情况，中央一贯的方针是努力加强民族团结，耐心等待西藏上层分子的觉悟。西藏和平解放后，对于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寺院的收入，中央均未予变更；各级僧俗官员也照常供职。对于过

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員，只要他們表示脱离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中央也不咎既往，仍讓他們繼續任职。甚至对于那些在解放后仍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中央也只是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責惩处，沒有直接逮捕法办。中央所以采取这样的等待和寬大的政策，完全是以祖国的統一为重，以民族团結为重，給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以充分的考虑时间。一九五六年底，中央并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六年內，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在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以后什么时候改革，仍然要根据将来的情况，由西藏民族領袖、上层人士以及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

但是，西藏的反动集团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多年策划的所謂“西藏独立”；他們利用在噶厦中的地位，利用在国外的噶倫堡为勾結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的中心，积极糾集叛匪，指使这些叛匪烧杀搶掠、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軍駐地和交通綫，并且組織非法的所謂“人民會議”，准备一旦聚集了相当力量，就馬上撕毀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取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个反动集团自以为他們能够利用宗教迷信长期欺騙西藏人民；他們以为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会給他們有力的支援，他們以为印度等邻国会成为他們的靠山，他們把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寬大为怀的态度看作是軟弱无能的表现。因此，他們有恃无恐，叛乱活动由秘密到公开，由小規模到大規模，直至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許久以来的种种事实表明，西藏反动集团不但是祖国

統一和漢藏兩大民族團結的破壞者，而且是西藏民族繁榮進步的絆腳石。中央雖然早已察覺西藏地方政府的種種罪惡活動，但仍然採取仁至義盡的態度，屢次告誡他們負責制止，期待他們最後能夠幡然悔悟。甚至在三月十日拉薩叛亂發生後，中央仍然作最後的努力，要他們悬崖勒馬。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頑固不化，竟然劫走達賴喇嘛，對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發動全面軍事進攻，摧毀了和平解決的希望，走上了自取滅亡的道路。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央才命令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對西藏叛國集團進行討伐，徹底平定叛亂。因此，西藏各界愛國人民充分認識到，中央人民政府為了維護民族團結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而在現在，只有討平叛亂，徹底粉碎罪大惡極的叛國集團，才是繼續維護民族團結的唯一道路。

目前在西藏的首要任務是徹底肅清一切叛亂分子，建立和平秩序。關於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所將採取的各項政策，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的布告和新华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都已經作了明確的說明。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將堅決團結全西藏一切沒有參加叛亂的僧俗人民；就是對於叛亂分子，也將本寬大政策，區別對待，即來歸者不咎既往，立功者給予獎勵，對俘虜不殺不辱，只對頑抗者給以嚴懲。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將繼續堅持尊重群眾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保護文物古蹟的一貫方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將行使地方政府的職權，並且積極促進西藏地方民族自治的實現。在達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爾德尼代理主任委員職務。

当然，西藏叛国集团的叛乱，证明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关于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骤和办法，中央仍将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我们相信，在粉碎了叛乱集团以后，无论汉藏两民族的团结和藏族人民的内部团结，一定会大大加强，在这个基础上，西藏必将逐步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活动，一直是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进行的。在三月十日拉萨叛乱发生以后，帝国主义者曾经以为，他们梦想已久的所谓“西藏独立”这一下将成为事实了。因此他们就大喊大叫，为西藏叛国集团助威。然而，好景不常，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了拉萨地区的叛乱。于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就集中宣传火力攻击人民中国。美国国务院接连发表了几次声明，诬蔑中国政府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说什么中国要“摧毁宗教和政治自治”，并且假惺惺地“对于处于这种野蛮干涉下的西藏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人们记得，八年以前，当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曾经大肆攻击这个协议。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却又成为这个协议的捍卫者了。这是一个多大的讽刺！美国国务院的诬蔑是不值一驳的，因为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不要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的，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恰恰是为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支持和怂恿的西藏反动集团。甚至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不能不说，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的叛乱和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

外国不得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西藏叛亂事件。大家知道，著名的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是首先由我國同我國的偉大的友好鄰邦印度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提出的。同年六月，我國周恩來總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又發表聯合聲明，莊嚴地宣布這五項原則是指導中印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從那時以來，這五項原則也是中國和亞非國家、特別是與西南鄰國相處的共同原則。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在西藏叛亂發生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三月二十三日發表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我們相信，中印兩國政府將繼續忠實地遵守五項原則，不允許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受到損害。

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叛匪司令部 繳获的文件

在平息叛亂中，我軍從功德林（西藏著名的寺院之一，曾經是叛匪司令部所在地）繳获了一些文件，這些文件中所透露的事實，證明達賴喇嘛是反對叛亂活動的，他在叛亂過程中遭到叛亂分子的劫持和包圍，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繳获的文件之一是“囊瑪堪欽堪勞的意見書”（囊瑪意為達賴喇嘛的侍從，堪欽是大四品僧官，堪勞為四品僧俗官員。“囊瑪堪欽堪勞”是指達賴喇嘛身邊管事務的四品官員）。這個文件沒有注明時間，但從內容看來是三月十一日寫的。文件中透露達賴喇嘛因為反動分子煽動僧俗人民阻擋他出行（到軍區礼堂看戲）而發怒，這和達賴喇嘛三月十一日致譚冠三將軍的第一封信中所說“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忧虑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以及“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着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的情況是符合的。這個文件還透露反動分子違背達賴喇嘛的意願，堅持在羅布林卡開會，說會場遷往其他地方“有弊無利”，企圖在外界造成達賴喇嘛和反動分子站在一起的印

象，以此來危害達賴喇嘛。這個文件中還透露了反動分子在達賴喇嘛周圍布置大量武裝人員來軟禁達賴喇嘛等情況。

在功德林繳獲的另一份反動文件“三大寺的意見書”（三大寺即哲蚌、色拉、噶丹寺，曾經是叛匪的主要巢穴）中，透露了反動分子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劫持達賴喇嘛、不准達賴喇嘛自由行動的情況以及反對民族區域自治，妄圖“獨立”的陰謀。

在功德林繳獲的“囊瑪堪欽堪旁的意見書”的全文如下：

“庶民囊瑪堪欽堪旁共同的意見：

昨日西藏僧俗人民等阻擋達賴喇嘛出行，雖然達賴發怒了，其實大家是為了政教御體，並無反對的心意，正如：為了眾生之故，不能使佛受累。因此請立即送上供奉，並且報告，對此表示謝意。在羅布林卡開會，會引起對達賴喇嘛名聲的懷疑，會場遷往其他地方之事，此舉有弊無利，故仍可在原地開會（按：據俘虜口供，三月十日叛匪包圍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喇嘛前往軍區禮堂看戲，並在噶廈官員堪仲〔堪仲即大秘書，亦稱仲譯清波〕大喇嘛絨朗色·土登諾桑、孜本〔噶廈中管理人事和財政的官員〕凱墨·才汪頓珠的主持下，在羅布林卡內召開了由叛匪控制的所謂“人民代表會議”，會議宣布西藏“獨立”以後，達賴喇嘛很生氣，他指示不許再在羅布林卡開會。此時有人主張把開會地點遷往其他地方，但寫這個意見書的叛亂分子根本不聽達賴喇嘛的話，堅持在羅布林卡開會。）。負責達賴御體問題，是古松部隊

(按：即負責警卫达賴的一代本)与昨晚增加部分，以后还一定要增加組織，否則担負不起任务。

領導人員除原有的外，还应增加功德林扎薩(按：此人为叛軍总司令，已逃往印度)，堪旁格桑阿旺(叛乱分子，四品僧官，已俘)，派郭仁希夏格巴(按：即叛乱分子夏格巴·洛桑頓珠，已俘，他是一九五一年逃到噶倫堡去的西藏叛匪头子之一孜本夏格巴·汪秋德敦之弟。派郭为职务名，管轎；仁希是四品官員)，拉恰拉丁色(即叛乱分子拉丁色·索朗班覺，已俘，拉恰是职务名称，管理总务的意思，四品官)等以幫助。乃旁神(按为卜卦的神)指示精神念經，并且为了平息有碍达賴御体之事，还要各喇嘛神仙打卦，迅速完成广泛念經事。今后的方向，西藏的种族、宗教、語言文字等各方面历史均一定要使其無疑問的适于独立国家，西藏人民公众均按照政教历史多次所闡明的去作。”

在“囊瑪堪欽堪旁的意見書”上签名的二十二人中，有很多是叛乱集团的头子，其中包括帕拉·土登为登，仁希夏格巴，堪旁格桑阿旺，馬基助理(藏軍总司令助理)，堪旁洛卓格桑等。

“三大寺的意見書”的全文如下：

“三大寺的意見書

哲蚌、色拉、噶丹寺的一致意見：西藏人民都講求达賴喇嘛，今后不离开宮殿左右，不赴中央的宴会及观劇，此事由噶厦及古加基巧堪布(按：系指叛乱分子噶章·洛桑日增，“古加”是“近侍”的意思，“古加基巧堪布”为达賴喇嘛高級侍从僧官的名称)答应負責，应遵守不变。并要再次向达賴

陈述清楚，同时今后以自治区筹委会为首的汉藏联合会议亦不需要，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西藏实行独立时，为了达赖的生命及事业的繁荣，要迅速选举可靠的僧俗官员代表，三大寺代表，军队、人民代表经常开会，認真商讨，会址除設在宫殿附近外，設在大昭寺或其他合适的地方亦可。請研究。”

在平息叛乱中从西藏叛匪司令部所在地功德林繳获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給噶倫堡的西藏反动分子夏格巴的两封密电的底稿。

这两封密电底稿的日期是藏历二月七日和八日，即公历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收电人夏格巴（即孜本夏格巴·汪秋德敦）是西藏叛匪首脑之一，一九五一年从拉薩逃到噶倫堡，一直在那里勾結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西藏幸福事业会”是叛乱分子設在噶倫堡的反革命組織，专门在印度进行顛复和分裂祖国的活动。夏格巴是这个反革命組織的领导人之一。

三月十六日密电的全文如下：

“噶倫堡夏格巴轉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

藏历二月一日（按：即公历三月十日，也就是发动叛乱的当天）西藏独立国已經成立，請向大家宣布。并請于公历三月十八日至甘托克（按：这是錫金的首都）听电话。

西藏独立會議上

藏历二月七日

此电由仔恰堪旁发送”（按：仔恰堪旁即叛匪首脑之一

土登列門。)

三月十七日密電的全文如下：

“噶倫堡夏格巴孜本(按：孜本是噶廈中管人事和財政的官員)轉交駐印度藏族幸福事業會：

近于藏曆二月一日，藏族尊卑僧俗全體心意一致，已經宣布了自漢人紅色共產黨的強權之下起而成立獨立國家，在你那個地方亦應宣傳此事。漢政府已在拉薩周圍地區準備大規模鎮壓，似此為免以大吃小，請向鄰國印度政府、佛教會議、聯合國報告，立即派代表來此地觀察真實情況，並請設法電印度駐拉薩代表應于事先了解情況等。總之，用什麼方法謀求支持為好，請本過去熟悉情況的精神，努力進行。並賜告內情。

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全體大會

藏曆二月八日”

(新華社拉薩 1959 年 4 月 27 日電)

==

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西藏情况部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政府已经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这一措施，受到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

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方针历来是明确的。我们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主张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中央人民政府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且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根据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应当团结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鉴于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情况，我们曾经允许西藏的改革可以放慢一些，让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

的时间。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繼續勾結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企图依靠他們的力量来分裂祖国，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保存西藏的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他們根本不想实行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一貫阻撓西藏自治区筹备工作的进行。他們的这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国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以他們的叛乱行为立即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且首先遭到西藏的广大人民、包括許多爱国的进步的上层分子的坚决反对。这些反动分子把形势完全估計錯了；他們不知道，帝国主义摆布中国內政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現在，西藏的局势已經完全在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部队，在西藏僧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正在繼續扫蕩一些流窜在偏僻地区的残余叛乱分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經开始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关于西藏今后的社会改革，将由中央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以决定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驟和办法。无論如何，改革将在充分照顧西藏特点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在改革过程中将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和发揚藏族的优秀文化。达賴喇嘛虽然已經被劫往印度，我們仍然希望他能够摆脱叛乱分子的挟持，回到祖国来。

西藏反动分子常常装出一付虔誠的模样，說是希望人們同登天堂，但是，他們自己却把西藏变成人間地獄，并且想使西藏人民永远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陷于比欧洲中世

紀更加野蛮、更加殘酷的黑暗深淵。他們也常常裝出愛好和平的模樣，但是，他們實際上却指使匪徒燒殺淫掠，殘害群眾，並且到了最後，他們自己竟敢瘋狂地發動武裝叛亂，因而走上了自取滅亡的道路。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後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一百二十萬，參加叛亂的人只有兩萬左右，其中多數是被欺騙裹挾參加的，而且還包括一部分由金沙江以東原西康省地區逃跑去的叛亂分子，即所謂康巴人。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勞動人民和贊成改革的上層進步分子以及可以說服的中間分子，共有一百一十幾萬人。現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聲聲說他們同情西藏人，他們卻沒有區別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那一部分人。是同情一百一十幾萬要求和贊成改革的勞動人民、進步分子以及可以說服的中間分子呢，還是同情極少數的反動分子呢？我們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這裡所說的好心朋友，是指那些願意堅持同我國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人們），對於這種明顯的絕大多數和極少數的劃分，應當首先弄清楚。如果人們認識了西藏內部的真實情況，就應當同情受舊制度壓迫的絕大多數的西藏勞動人民，同情他們的社会改革的要求。由於西藏反動派叛亂的失敗，西藏人民現在已經有可能擺脫農奴制度的枷鎖，實現民主自治和社会進步的願望。他們將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幫助下，逐步地把西藏高原建成一個真正的人間樂園。這對於西藏人民、全國各族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藏族人民的真正同情者，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事情啊！

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西藏反動分子的叛亂和這一叛亂

的平定，是中国的内政，甚至力图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以及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劫往印度境内以后，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印度尼西亚赫鲁总理连续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继续巩固中印友好关系的声明，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中印两国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历史，并且同是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两国都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西藏的一小撮叛乱分子而动摇互相间的友谊和两国共同遵守的外交原则。的确，在西藏叛乱失败以前，西藏的反动分子和某些外国的反动分子，曾经利用中印边界的某些地区，进行破坏我国统一和中印友好的活动。但是，这些反动分子的打算现在已经落空了。我们希望，随着西藏叛乱的平定，通过中印双方的共同努力，亚洲两个共有人口超过十亿的伟大的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将获得更加巩固的基础和更好的发展。那些蓄意破坏中印友谊的人们的一切恶意挑拨，不过是枉费心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会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举行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会议对迅速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表示敬意和慰问，对积极协助解放军平定叛乱的西藏僧俗各界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表示敬意和慰问。

(二)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不是偶然的。自英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印度为基地对我国西藏地方实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以来，反侵略的西藏爱国人民同被外国侵略势力所收买利用的少数西藏卖国贼之间，就展开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而在中国解放前夜，亲帝国主义分子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集团中是占着优势的。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等待这批亲帝国主义分子的觉悟，对他们采取了宽大的态度，让他们在原地方政府继续供职，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究既往。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

这有利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同西藏广大人民以及很多上中层人士建立联系，并且获得他們的信任。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卖国賊对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協議阳奉阴违，繼續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結，阴谋实现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所要求的所謂“西藏独立”，并且发动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薩人民解放军駐軍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討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这就使得这些卖国賊的罪恶完全暴露在西藏各阶层人民之前，暴露在全世界人民之前。一切理由完全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一切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方針的人們方面。任何对于这批出卖祖国、分裂祖国、背信弃义、杀人放火、灭絕人性的叛匪表示“同情”和企图借机干涉中国內政的外国人，只能使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認清他們的面目，从而获得必要的教訓。

(三)在西藏，同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应当坚决实现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妄想实现所謂“西藏独立”，因而积极反对民族区域自治，現在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已經有可能在实行人民解放军軍事管制的同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之下，逐步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級地方行政机构和藏族人民的自卫武装，并且开始执行自治职权。西藏自治区的各級地方行政机构，都应当有广大人民的代表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全体官兵，一切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工作人员，都必須同藏族人民建

立最亲密的兄弟关系，艰苦工作，英勇奋斗，为藏族人民的利益服务。

(四) 西藏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惨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甚至那些口口声声“同情”西藏叛匪的人，也说不_出他们为什么硬要热心于支持这种落后制度的理由。西藏人民久已坚决要求改革自己的社会制度，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出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奠定基础。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密切团结全西藏各阶层的爱国僧俗人民，区别对待未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参加叛乱而迅速投诚的和坚决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注意保护全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文物古迹。

(五) 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人民大家庭的西藏，是西藏广大人民的西藏，而不是少数反动分子的西藏，更不是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的西藏。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对于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在西藏地区，贯彻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由广大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当家作主的民族区域自治，贯彻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主改革，并且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兄弟般的团

結和互助,建設繁榮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定不移的方針。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不但不能阻止这个方針的实现,而且只能加速西藏人民的觉悟,从而加速这个方針的实现。同样,任何外国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对于我国在西藏的这个方針进行干涉,也不能阻止这个方針的实现,只能激起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反对干涉的爱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遵守五项原則,同西南各邻国和平共处,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遺憾地注意到,最近在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了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內政的言行。这种言行不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只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利益。会议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現象将迅速消除,中印两国之間的伟大的悠久的友好关系将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班禪額爾德尼和其他藏族代表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一) 班禪額爾德尼的發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在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會上，我首先表示竭誠擁護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李富春副總理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李先念副總理關於一九五八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九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彭真副委員長關於人大常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這次我和阿沛·阿旺晉美等代表來到北京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全國各民族的代表歡聚一堂，共同商討國家大事，這又一次充分說明，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西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真正地享受着民族平等和當家作主的權利。

從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到現在，四年多來，我們的偉大祖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國家更加統一和鞏固；我國各族人民的團結也空前地加強了；我國不僅已經勝利超額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而且實現

了史无前例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使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呈现出一片极其欣欣向荣的景象。现在六亿多人民继续满怀胜利信心奋勇前进。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始终不渝的履行十七条协议，一贯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爱戴。但是，长期以来，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蒋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的指使下，一贯进行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活动，并且百般阻挠自治区筹委会工作的进展。中央为了等待反动分子的悔悟，一再忍让，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认为中央软弱可欺，竟在今年三月，公然劫持达赖喇嘛，公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罪恶目的是：把西藏人民重新置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并且永远保存世界上最黑暗、最残酷的农奴制度。拉萨地区的叛乱迅速平息，反动分子的叛国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西藏的僧俗人民和爱国的上层、中层人士都热忱地拥护周恩来总理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积极帮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他们一向被压制的要求改革的愿望也纷纷提了出来。

当我看到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以后，感到无比的愤怒。这个

所謂声明，無論同达賴喇嘛平时的言行或者同达賴喇嘛給中央代理代表譚冠三的三封亲笔信对照看来，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声明的口吻既不是达賴喇嘛本人的口吻，也不是我們藏人所习用的口吻。很显然，这个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是外国人强加于他的。

西藏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認的。很早以来，西藏就和祖国内地发生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到十三世紀的时候，西藏地方就正式加入了中国的版图。从此以后，西藏就一直是中国的領土。这个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說：西藏人不同于汉人，这能够作为“独立”的論据么？大家知道，我国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不但都不同于汉族，而且彼此之間各有其不同的民族特点。他們作为民族是不同的，但是对祖国來說，他們都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員。世界上別的多民族的国家很多。因此，民族的不同决不能作为分裂祖国的借口。声明說“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願望”，这完全是捏造的謊言。事实上西藏絕大多数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一样，認為維護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自己最根本的利益。西藏人民根据切身的經驗懂得：脱离祖国的必然結果，并不是什么西藏的独立，而是把西藏变作外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我們知道，所謂“西藏独立”，首先是英国人提出来的。英国侵略者在一九〇四年大举进攻西藏，屠杀很多藏胞，武装占領拉薩。以后英国不但处心积虑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不許中国政府“干涉西藏內政”，而且在西藏內部也制造了惨

痛的分裂。在英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毒手之下，前輩班禪被迫出走了，熱振活佛被殘殺了，格達活佛被毒死了，達賴喇嘛的父亲也被毒死了。這些就是所謂“西藏獨立”給我們的血的教訓！現在有些印度人又在說什麼“西藏獨立”，或者說什麼“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是不許中國干涉西藏內政”。試問：中國的事情為什麼中國管不得，別人反而管得呢？這和英國人以前講的話有什麼分別呢？我看什麼分別也沒有！這種話在全世界只有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和反動派贊成，印度人民和各國人民都是不贊成的，印度的一切主張五項原則、珍惜中印友好、真正同情西藏人民的人士，也是不贊成的。我們西藏人民是堅決反對的。我代表全體西藏僧俗人民在這裡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鄭重聲明：我們西藏永遠是中國的西藏，我們永遠不許任何外國人干涉我們西藏和我們中國的事情！

西藏作為祖國的一個自治地方，享有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這是沒有問題的。大家知道，民族地方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這個政策已載入我們國家的憲法，並且在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也有明文規定。協議的第三條寫着：“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權利。”早在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就已經成立了，達賴喇嘛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籌備委員會過去所進行過的一些工作，都是在達賴喇嘛親自主持下，經過各方面人士的充分協商決定以後進行的。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和干

部絕大部分也都是各階層的藏族人士。這一切都是鐵一般的事實。至於籌備委員會的工作沒有很好的開展，那是因為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阻撓和破壞的結果。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一貫阻撓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迫害藏族干部和愛國進步人士，製造藏漢之間和西藏內部的不團結，反對任何民主和進步的措施。西藏解放雖然已有八年了，但是，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沒有改變。這怎能說西藏地方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呢？我認為就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來說，中央領導和檢查地方政府的工作，是完全應當的和正常的現象。過去中央對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不是管的太多，而實在是管的太少了。解放八年以來，中央對原西藏地方政府一貫本着民族團結政策，寬大為懷，不料那些頑固不化的反動分子，却以為中央是軟弱可欺，竟至喪心病狂，背叛祖國，背叛人民。事實證明，他們所要的不是什麼西藏的自治權利，而是西藏的所謂“獨立”，事實上也不是什麼西藏的“獨立”，而是企圖借“獨立”的招牌來賣國求榮，來維持他們的反動統治。這種所謂“獨立”的招牌，同過去滿奸溥儀投靠日本侵略者所掛的“滿洲國”的“獨立”招牌，完全是一回事。

在對待宗教方面，共產黨和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切實執行了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喇嘛寺廟的政策。八年以來，西藏的宗教制度和宗教信仰，都沒有改變。這是全藏僧俗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實，實際上破壞宗教的不是人民解放軍，而是西藏的那些叛亂分子和反動分子。他們殺害和污辱僧尼，玷污佛像，搶劫供奉器物，甚至把寺院作為叛亂的

据点。显然这不是尊重宗教的善行，而是破坏宗教的恶行。况且他们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国外。这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最大的破坏。原西藏地方政府口口声声说保护宗教，却一贯地干着破坏宗教的勾当。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攻打过色拉寺，残杀了爱国的热振活佛，并且在以后毒死了达赖喇嘛的爱国的父亲。他们这些罪行，难道也叫做“保护宗教”吗？事实证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他们高喊护教，实际上是借宗教来欺骗人民，以便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

现在，西藏的局势已经完全在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西藏僧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正在继续扫荡残余叛匪。我相信在最短期间，西藏地区的残余叛匪定会全部肃清，西藏人民将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西藏叛乱分子制造独立的阴谋已经破产了。这些叛乱分子在他们的外国主子的指使下，假借达赖喇嘛的名义从事破坏分裂祖国的活动，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帝国主义极力利用这个事件破坏中印关系，这是不能允许的。值得指出的是印度的反动派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一直对西藏存在扩张野心，并且进行种种破坏活动。毫无疑问，这种活动只是对帝国主义有利，而不利于中印友好的。

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把自己装扮成西藏人民的朋友，犹如凶恶的魔鬼，装扮成慈善的菩萨一样。但是多年来遭受过外国侵略的西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们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来。任何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不管怎样巧加打扮都是骗不了人的。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依照国务院的命令，已经行使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我遵照国务院的命令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西藏全体干部和僧俗人民，努力完成国家和人民交付给我的光荣的使命。彻底肃清残匪是当前西藏地区的首要任务。现在叛乱虽已基本平息，但是在一些偏僻的地区，还有一些零星残匪进行骚扰活动。他们象堆·德格多杰（按：根据佛经记载，这是一种专门残害人的魔鬼的名字。）魔鬼般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严重地破坏那些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西藏人民必须继续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彻底肃清这些地区的残余匪徒，维护社会治安，巩固祖国国防。

逐步进行改革，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們西藏人民繁荣幸福的唯一的康庄大道。西藏的旧制度，残酷地压迫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如果不加改革，西藏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变。这犹如不經慈航，就无法脱离苦海，走上幸福的极乐世界。西藏的人民早已积极要求改革，很大一部分上层人士为了西藏的发展前途，也赞成进行改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通过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协商，逐步实现改革的任務，努力建设民主的进步的新西藏。

加强汉族藏族以及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是西藏人民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如果没有汉族的帮助，西藏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西藏人民必须象尊重三宝（按：三宝是指佛、法、僧）一样地来尊重汉藏人民的友谊，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这个友谊。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摆脱被劫持的处境,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同西藏人民一道,共同建设光明幸福的新西藏。

讓我們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在祖国大家庭中走向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二)阿沛·阿旺晋美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使我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所拟定的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又是一个大跃进的计划。当每一个爱国人民看到自己的伟大祖国，以如此雄伟壮阔的步伐飞跃前进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只有在祖国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大家庭中，实行民族的地方自治，走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企图走别的任何道路只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灾

难。因而根据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是表示西藏人民走上光明幸福的大道。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一贯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阻挠协议的执行，例如：阻挠实行民主改革，抗拒改编藏军，不愿实行有人民参加的民族地方自治等等。事态发展到最近，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敢于在拉萨纠集大批叛匪，劫持达赖喇嘛，向在拉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央派驻西藏的机关发动武装进攻，企图实现他们投靠帝国主义，永远奴役西藏人民的梦想。叛乱发生后，国务院即于三月二十八日发布命令解散原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彻底平息叛乱，撤销叛乱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及其他一切职务，这是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的，从而也是完全正确的，立即得到西藏广大人民的竭诚拥护。在西藏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不仅在很短的时期内彻底平息了拉萨等各重要地区的叛乱，而且逃窜至其他偏僻地区的叛匪，也可望于最近时期内彻底歼灭。

在这里，我想对四月十八日在印度提斯浦尔地方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新闻界所发表的声明说几句话。

我不仅是西藏地主阶级的一员，而且在原西藏地方政府据有官品，供职多年，特别是当了十年的政府噶伦。一九五一年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我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一九五六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我担任

委員會的秘書長。因此，對西藏幾年來的所有工作，自始至終我都詳細了解。對於西藏年代久遠的歷史，我也比較熟悉。

西藏是中國的領土。這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資料可以證明。這裡着重敘述一下自一九五一年到現在的簡略情況。

一九五一年由達賴喇嘛領導的原西藏地方政府，派我們五名全權代表經康區和繞道印度兩路前往北京。等到兩路人員在北京會齊後，就與中央的幾位全權代表在親切友好的基礎上，經過詳細討論，取得雙方都滿意的一致意見後，簽訂了協議十七條。

協議達成後，為鞏固國防而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到達西藏，在中央駐藏代表的領導下，認真遵守和執行十七條協議和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例如：在西藏和平解放前，由於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瘋狂地製造種種謠言，西藏人民存在着很大的懼怕心理。但是，現在西藏人民對待人民解放軍猶如自己的父母子女，互相幫助，象一家人一樣地生活在一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如以西藏的建設為例，中央出人出錢修築了幾千公里的公路，為西藏人民解除了交通不便的困難。不僅如此，興修公路本來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但如公路通過民田，中央則以高價收買公路所占去的部分。此外在各大城鎮都成立了醫院，免費治病；成立了許多小學和中學。總之，在幫助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作了許多有利於西藏人民的事情。這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政治方面，在拉薩未發生公開的武裝叛亂前，根據協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

原有职权和达賴喇嘛的原有地位和职权都照旧未变，各級官員也是照常供职，对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利和工作，中央从未加以任何强制。根据協議，西藏地方部队应改編为人民解放军，西藏的那种非常落后的制度必須予以改革。但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不同意，中央本着寬大政策，以团结为重，給他們以充分考虑的寬裕时间，不但藏軍始終沒有改編，制度絲毫沒有改革，而且西藏地方政府还始終沒有停发过藏鈔。中央提出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的意見，經大家同意后，于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由达賴喇嘛担任主任委員为其领导，以下的工作人員不仅大部分是藏族，而且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官員，也都参照他們的原有官职，在筹委会安排了职位。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及其下屬机构的經費都由中央供給。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認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风俗习惯，西藏地区的任何一个寺院从未受到任何破坏。总之，中央一貫認真执行十七条協議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秋毫无犯。这是西藏人民的亲身体驗所証实了的。

如上所述，几年来中央对西藏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无论办任何一件事情，都促使西藏人民摆脱落后黑暗的境地，日益醒悟起来。西藏人民从而日益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将得到新的生活。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一心想使西藏人民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統治之下。因而当他們看到西藏人民逐渐觉醒时就惊慌起来，轉而勾結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

派。在外表上假惺惺地装出一种主张团结和遵守协议的态度，其骨底里则是企图依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来破坏祖国的统一，从而在西藏恢复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以维持他们对西藏人民实行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剥削。为了实现他们这种可耻的目的，他们会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例如：执行协议第八条所规定的事项，即“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减轻西藏人民的苛重负担，因为西藏军队的给养原地方政府只负担很少一部分，服装以及其他用项都由人民直接供给。但反动分子对此一贯进行阻挠。又如：西藏广大人民以及一些上层和中层的进步人士都渴望根据协议第十一条，即“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反动分子们对此也千方百计地予以阻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在进步的基础上成立的。因其进步就违背了那些反动分子的意愿，因而尽一切力量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不能有所进展，并且对一些进步人士实行恐怖压迫。中央派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西藏一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任何寺庙都秋毫无犯。在邻省的某些藏族地区，由于反动分子发动反对国家反对人民的武装叛乱，有些寺庙甚至直接变成叛匪的司令部。在镇压叛乱时对这些寺庙不免有所损伤。西藏的反动分子就借此加以夸大和歪曲，说什么“要毁灭寺庙”等等，造谣惑众，不一而足。到去年五、六月间，更变本加厉地纠集从邻省各地逃到西藏的叛匪，在沿雅鲁藏布江两岸地区实行武装叛乱。直到那时中央还是十分尊重

原西藏地方政府，再三責令它平息所屬地區的武裝叛亂。但是，原地方政府除了口頭上承認，並在表面上作作樣子以外，其內幕則是盡一切力量支持武裝叛匪，發展到最近，將大批叛匪集中到拉薩。由於他們對中央的一切措施，找不到任何借口，就利用達賴喇嘛決定到西藏軍區看戲這件事，造謠惑眾。這件事情的經過情況是，在一個月以前達賴喇嘛自己提出要到西藏軍區看戲，三月十日這個日期也是達賴喇嘛自己選定的。但是，反動分子欺騙拉薩市群眾，說什麼請達賴喇嘛到軍區看戲，是要將他強行帶到內地去等等無恥謊言，正式開始了他們破壞團結和祖國統一的罪惡行徑。就在當天，在達賴喇嘛的住地羅布林卡門口殺死了昌都地區的主要領袖人物帕巴拉呼圖克圖的哥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宗教事務委員會委員索朗降措，打傷了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武裝佔領了達賴喇嘛住地的內外圍牆，真是無法無天到了極點。但是，中央方面仍然寬大為懷，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要求原西藏地方政府改正錯誤，設法平息叛亂。為了幫助達賴喇嘛，代理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前後給達賴喇嘛寫了三封信，其中兩封還是由我親自轉的。達賴喇嘛也通過我轉了他親筆寫的三封回信。在信中寫着達賴喇嘛在受叛匪種種脅迫的詳細情況，果然到三月十七日晚間，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而去。以後到三月二十日清晨三點四十分鐘開始，叛匪就向在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和中央派駐西藏的機關實行武裝進攻。為了保衛祖國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安全，人民解放軍不得不在三月二十日當天上午北京時間十點鐘開始予以反擊。

在西藏广大人民的竭诚支援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在这以前人民解放军从未放过一粒子弹，这由拉萨市的全体僧俗人民可以证明。总括以上事实，自始至终究竟谁在遵守和执行协议十七条，和谁在破坏协议，可以一目了然。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破坏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在拉萨地区和其他各重要的地区内已彻底平息，其他逃往偏僻山区的小股叛匪，现正在继续追剿，可望于短时间内彻底平定。西藏现有的一百二十万左右人口，参加叛乱的只有两万左右。西藏人民清楚地知道，叛乱的迅速平定是合乎西藏一百一十几万人口的利益。如若不然，西藏广大人民将要长期忍受种种灾难的煎熬。因为自去年开始小股叛乱到现在将近一年期间，叛匪所到之处洗劫一空，到今年春耕期间就有很多被劫农户无法下种，烧杀淫掠，忍无可忍。不仅如此，其结果西藏人民势难摆脱封建农奴主的残酷剥削。当今世界上人民的力量大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时候，西藏人民将要在这次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尽快地成立西藏自治区，正确地实行适合于西藏具体情况的社会改革，以使西藏人民也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走上幸福美满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充分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从而发展人口，建设新西藏。

自从达赖喇嘛亲政后，我与达赖喇嘛之间，形影相随，始终一贯地遵从他的意愿，竭诚扶持，因而能体会达赖喇嘛的意愿。达赖喇嘛八年来无论公开讲话，或者对我们藏族

官員的私下談話，我們都沒有聽到過“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統一的話。我們聽到的話是，他不僅深刻關懷西藏人民的幸福，而且更加關心祖國統一的日益鞏固和加強。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斷定，這次在印度以達賴喇嘛的名義所發表的聲明，絕非出自達賴喇嘛的意願。而且從聲明的語氣看來，完全不是達賴喇嘛的，也不象是西藏人用西藏文寫的，倒很象是外國人寫起強加在達賴身上的。我想當達賴喇嘛靜坐深思的時候，會感覺被人劫持和利用的痛苦，從而會找出擺脫被劫持的正確措置和辦法。

我沒有什麼特別知識，但是，我知道一切善良的人們，都會分清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何者是公正的，何者是被歪曲了的。因而，我相信全世界人民將會同情西藏一百一十多万力求擺脫封建農奴制的慘重剝削的人們，而不同情一小撮曾吸吮西藏人民的血汗，現在又變成民族敗類的叛亂分子。對竄入印度的叛亂分子，看同一個民族的份上，我要寄托於你們的一線希望是，為了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不至長期分離，希望你們不要在帝國主義、蔣幫特務和外國反動派的操縱和利用之下，繼續作惡，堵絕達賴喇嘛回到祖國的道路。其次，你們拋棄家鄉、流亡於他國的原因，你們可以說是因為中央人民政府不再允許你們繼續吸吮千百年來一直被吸吮着的西藏人民的血汗。如果你們要說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那末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其結果只會遭到西藏人民的堅決反對。最後，只要你們改正錯誤，重新做人，不再進行背叛祖國的罪惡活動，西藏人民還可以寬恕你們，中央人民政府會對你們給以寬大處理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是想把西藏人民引入继续受奴役的灾难道路，他们绝不会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叛乱的平息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生。今后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积极筹备，一定要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并通过民主改革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

最后让我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三)阿旺嘉錯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周恩来总理报告中关于西藏叛乱问题的分析词严义正,对于达赖喇嘛的希望,情真意挚,内心感到十分兴奋。昨天看到报上登载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字里行间充满了捏造和诬蔑,这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在达赖喇嘛被劫持以及完全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情况突然出现,显然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对此,我不能不表示最大的愤慨。

正当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巨大的胜利,祖国的面貌起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国各民族人民满怀信心,大踏步地向前迈进的时候,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竟敢违背西藏人民的意志,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开进行叛乱。这种背叛祖国,破坏各民族团结的罪行已经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一小撮西藏叛国分子长期以来,就一直进行着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破坏祖国统一的阴谋活动。他们毫无廉耻地打着“保

护民族利益”和“保护宗教”的招牌，顛倒黑白，欺騙群众，分裂各民族的团结，叫嚷“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出卖給外国侵略者。他們已經成为各族人民的公敌了。我曾經在西藏居住二十七年，亲眼见过这些反动分子的所作所为。他們一直在叫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等等反动口号，其目的无非是希图投靠帝国主义，維持他們少数人的黑暗統治。早在清朝末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保持本身利益，就勾引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西藏，使西藏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損失。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又勾結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开进行叛乱，破坏人民的和平生活，难道这是“保护民族利益”嗎？其实，这些叫喊“保护民族利益”的上层反动分子，他們的双手早已染滿了西藏人民的鮮血。他們横征暴斂，杀人放火，奸淫擄掠，无恶不作。他們还豢养藏軍，遍設監獄，采用挖眼、割鼻、扒心、剥皮等等酷刑，鎮压人民。穷苦的西藏人民受尽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重重压迫剝削，长期过着最黑暗、最悲惨的生活。多少人家被逼得流浪街头，乞討度日，多少人家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但是，他們的血腥統治决不能摧毁西藏人民的反抗意志。西藏人民受苦越深，要求解放的願望也越加迫切。广大的西藏人民从历史事实中清楚地知道，正是这些叫喊“保护民族利益”的反动統治者，才是他們真正的敌人。现在彻底摧毁这一反动統治的时期已經来到了。

“保护宗教”是西藏叛国分子打出的另一个旗帜。他們伪装成虔誠的佛教徒，利用“保护宗教”，掩飾他們的罪恶活动。但是，善良的佛教徒是不会上他們的圈套的。我作过

色拉寺堪布，亲身領教过他們玩要宗教的把戏。当他們需要利用宗教名义来干什么罪恶勾当时，就召集色拉寺等西藏三大寺的堪布开会，把他們的意志强加在喇嘛群众的身上，然后就以三大寺的名义去欺騙群众。我們知道，佛教有二百五十三戒，不要說杀人，就是杀害小虫也不能容許。但是这些反动分子，为了保护私利，却强迫喇嘛违背教規去干打仗杀人的罪行。一九四七年由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結帝国主义，遭到反帝爱国的原藏王热振活佛的反对，索康·旺清格勒和拉魯等人，竟带兵捉住热振活佛，用残酷的刑罰将他活活害死。热振活佛下屬的三个大活佛和許多喇嘛，有的下獄，有的流放，也通統遭到迫害。我自己也是因此而逃到內地的。我逃出后，他們还通令悬赏要砍我的头，后来竟将我胞弟茨烈嘉錯杀死，把他的头說成是我的头，說我已被他們杀死，而大肆宣传。因为热振事件，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还領兵攻打色拉寺，寺內善良无辜的喇嘛被打死、打伤近一百人，色拉寺所轄十三个孔村，被他們搶劫一空。一九五〇年爱国的格达活佛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到达昌都的时候被上层反动分子拉魯和英国特务福特放毒藥害死。試問，这一切难道就是所謂“保护宗教”嗎？这难道是虔誠的佛教徒应有的行为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是背叛祖国、背叛民族利益、背叛佛教教义的罪人。他們的特点是：无耻，毫无人性，在他們的身上找不到一点正直的人應該具有的东西。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长期以来，对他們进行教育，再三忠告，耐心等待他們悔过自新，并从各方面大力帮助西藏进行建設。然而，这些家伙毫无悔改之意，反認

为中央軟弱可欺，他們背信弃义，一直暗地勾結帝国主义进行阴謀活动，妄想长期維持他們对广大西藏劳动人民的黑暗統治。一九五四年我去拉薩慰問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时，就听說过这些叛国分子組織了所謂“人民會議”阴謀叛国的情况，現在他們竟敢公开叛乱，这只是說明他們把当前的形势和群众的觉悟完全估計錯了。广大的西藏僧俗人民从亲身經歷中，早已認清誰是西藏民族利益的真正保卫者，而誰又是出卖民族利益、背叛祖国的罪人；是誰在認真执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誰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万恶不赦的豺狼？西藏人民早已知道，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才能摆脱貧困和落后，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給了各民族人民以自治的权利；貫徹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历史上从来沒有的事。我們广大的反帝爱国的教徒，决不容許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組織叛乱，残杀人民，維持封建統治，我們要坚决向宗教界的一切坏人坏事和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不懈的斗争。

西藏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渴望翻身解放的，他們决不会忘記帝国主义、蔣介石匪帮、外国反动派和西藏反动統治者給他們带来的灾难。他們热誠地希望民族的进步和发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除了加速他們自己的灭亡之外，决不能阻挡西藏人民前进的道路。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想把西藏分裂出去掌握在他們魔掌里的阴謀，必

將遭到彻底的粉碎。我們深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們伟大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将更加巩固，西藏人民也将从此永远地結束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統治而获得新生。現在，一个幸福、繁荣、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已經展現在眼前了。

最后，我高呼：

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

反对西藏叛国分子，彻底平息西藏叛乱！

坚决维护祖国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結！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万岁！

(四)喜饒嘉錯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各位代表、各位委員：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經济計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決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預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員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工作报告，李維汉副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員会工作报告，并表示坚决貫徹执行。現在我就政府平定西藏的叛乱問題，暨在印度提斯浦尔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发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发言如下：

四月十八日，被西藏反动集团挾持前往印度的达賴喇嘛，被迫发表了一个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大談其西藏独立。这个詞屈理屈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声明，內容荒謬絕倫，它同达賴喇嘛八年以来在国内外所发表的一切言論完全不同，它同最近以来，帝国主义者及外国反动派曾不断发出过的西藏独立的陈腔調調，如出一轍，这完全是一种阴谋。西藏反动集团在拉薩能够劫持达賴喇嘛，到了印度后，在帝国主义者及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直接摆布下，达賴喇嘛岂能幸免不被强迫发表謬論，因此我們有理由怀疑这个所

謂聲明，不是真達賴的話，而是許許多多假達賴的話。人們都知道，當英帝國主義霸占我們偉大的鄰邦印度時，曾利用印度為基地侵略我國西藏，在英帝國主義被迫退出印度後，而印度的一些擴張主義者，居然忘懷其被霸占的黑暗時代的災難，反而繼承其侵略衣鉢，欲取英帝國主義過去在西藏的特權而代之，真是好了瘡疤忘了痛。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說西藏人不同於漢人，西藏可以獨立，豈不因印度有不同的民族，可以成立幾個不同的獨立國家嗎？擴張主義者這種狂妄的舉動，嚴重地違背了中印共同遵守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如不改弦更張，可以斷言，不僅擴張主義者的空想永遠無法達到，反而將招致引狼入室的后患。我們珍視中印友誼，但我們堅決反對外國擴張主義者干涉我國內政的粗暴行動。我們認為所謂聲明這一拙劣文件，不但不能為西藏反動集團開脫罪責、混淆我國和全世界人民的視聽，反而把西藏叛亂集團叛國叛人民的罪行暴露無遺，也把帝國主義者和印度擴張主義者妄圖瓦解我國統一，置西藏為他們的殖民地或保護國的陰謀大白於天下，我們對這種極不友好的態度，表示無比的憤慨。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一貫堅持反動立場，最近竟於三月十日，公開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劫持達賴喇嘛，糾集叛匪，假借保護佛教的旗號，煽惑和威脅部分不明真象的僧俗群眾，狂妄地叫囂驅漢獨立，妄圖扭轉歷史車輪，永遠奴役西藏人民，全國各族各界人民，莫不切齒痛恨，同聲聲討。國務院在作了種種和平解決的仁至義盡的努力之後，處於和平解決已屬無望之際，為了

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為了維護西藏民族的發展繁榮，不得已而責成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徹底討平叛亂，明令撤銷策動叛亂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其職權，全國人民一致表示擁護。作為一個愛祖國、愛西藏、愛佛教、愛達賴的藏族佛教的虔誠老沙門的我，對國務院此一英明賢能的偉大正確措施，衷心表示熱誠的擁護和堅決貫徹執行。

西藏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組成祖國大家庭民族成員之一，在偉大祖國的締造和發展過程中，同其他民族一樣，曾經貢獻了自己的辛勤勞動，因而對各民族共同締造和發展起來的偉大祖國，天賦了強烈深厚的熱愛，這種強烈深厚的愛國感，牢不可破地巩固着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由於帝國主義陰謀在我國內部製造分裂以利其實現侵略目的，由於清朝及國民黨反动政府民族壓迫歧視政策的倒行逆施，由於西藏反动統治階級投靠帝國主義以便巩固其壓迫剝削的特權，從而長久以來在西藏形成了一個投靠帝國主義、分裂祖國、奴役人民的反动集團。它們不顧國家民族利益，違背人民意志，一貫主張分裂。自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反动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結束了中國民族壓迫歧視的歷史，開始了民族平等團結的新紀元，把各民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對西藏採取了和平解放的措施，之後，中央始終堅持照協議辦事，一貫堅持祖國統一民族團結，逐步實現民族區域自治，逐步實現民主改革的政策，給西藏做了許多史无前例的好事，獲得了西藏廣大僧俗人民的一致擁護。政

府在执行協議中，为了照顧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对西藏上层分子的因循阻碍，始終以国家民族为重，采取了极大的耐心等待，冀其幡然觉悟，凡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应当如何痛改前非，貫徹協議，爭取在建設西藏的伟大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然而事实出乎意料，頑固不化的西藏上层分子，不但未因中央的耐心等待的寬大政策改变其狼子野心，反而同床各梦，从解放之日起即包藏祸心，蓄謀撕毀協議，发展至最近，竟于三月十日勾結帝国主义、蔣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公开叛国，打死打伤爱国的藏族干部，所到之处，搶劫寺院村落，残杀僧俗群众，破坏了西藏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也破坏了神圣的佛教，全国人民同声声討叛逆，一致支持中央领导西藏人民平乱的正义措施，迅速地把反动集团投进它們自己所卜葬的墓穴。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既体现了我国的統一领导，又体现了各民族的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切合少数民族特点的最好政权形式，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中，明白規定了逐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一九五六年，中央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經過充分协商，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几年以来，筹委会在中央的领导下，对西藏的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文化卫生以及工业，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开始改变着西藏貧穷落后的面貌。如果不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的百般阻挠，无疑的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广大僧俗人民，深深体会到在祖国統一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即是意味着西藏民族的繁荣幸福，因而坚决走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无如西藏反动集团，不願

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过幸福繁荣的生活，一心梦想实现帝国主义企图瓦解中国统一而长期策划的西藏独立，以达到他们永远奴役西藏人民的丑恶野心，最近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大谈其独立，荒谬达于极点。所谓西藏独立之说，是毫无理由的白日说梦，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历史吧，在今天西藏的辖区中，历史上曾出现过唐代的松赞干布王朝，仅仅传了十代，在相当于唐武宗时，王朝即随藏王朗达马之死而告终。其后，历唐末及整个宋代，西藏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到了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才使西藏由分而合成为元代辖区中的一个完整行政区域，并册封八思巴在元朝的统一领导下主管西藏。经过了七十五年，为其属下帕莫主巴所篡夺。又经过了七十五年，为其属下仁本所篡夺。又经过三传，为其属下藏巴见呵所篡夺。又经过三传，进入清朝初年，清廷固始汗（即今青海河南蒙旗亲王）灭掉了藏巴见呵，才由康熙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主管西藏，并另封达赖襄佐（总管）为执政，从此，达赖喇嘛才在西藏逐渐形成领导地位。到了乾隆十六年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才由清廷批准成立噶厦，此一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服从清朝驻藏办事大臣的领导，遇有清廷谕旨，达赖喇嘛应行三跪九叩之礼接旨，原噶厦政府中的噶伦、扎萨、台吉等十三级官职，均必须经清廷批准任命。由此可见，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导地位，是由当时中国的统一政府册封而获得，而噶厦地方政权，更是当时统一政府所属的一级行政机构。这些历史说明了西藏地方自古即为中国的行政区域之一，从今天的现状讲，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区域，并成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达

賴喇嘛不仅受国家的任命，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員，并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选举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同时，由于中央正确执行了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給西藏人民带来了并将逐渐带来更大的幸福繁荣，因而拥护符合自己利益的祖国統一民族团结的政策。由此，我們可以做这样一个結論，西藏反动集团和所謂达賴喇嘛声明中所謂西藏独立的謬論，是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也是违背西藏人民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其目的在使西藏人民失去祖国的领导，以便其为所欲为的宰割奴役。我們对这个謬論的回答很简单，我們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独立，我們坚决拥护在祖国統一的大家庭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是中国領土的事实，全世界都承認，甚至力图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也无法否認这一点，至于它們还厚顏无耻地在西藏問題上大做文章，誣蔑我政府平乱的正义措施为野蛮侵略，实际上是为掩盖其妄图瓦解我国統一，以达其侵略目的的野蛮罪行。同时，在这个阴谋的背后，还隐藏着利用我国平乱，制造亚洲紧张局势，破坏我国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以遂其迫使亚洲国家放弃中立政策，重新供其奴役的更恶毒的大阴谋，我們迫切要求亚洲国家洞烛其奸，揭下帝国主义挑拨侵略的画皮，以确保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

民主改革是西藏民族走向幸福繁荣的过程中必須解决的問題，奴役西藏人民的西藏叛国集团，是压在西藏人民头上的大山，层层封建特权的奴役，阻碍了西藏人民幸福繁荣的道路，如果不实行民主改革，就不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

面貌，所以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中，規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中央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鉴于西藏上层人士的覺悟不高，始終采取耐心等待的寬大措施，說服群众，保留其种种特权，一九五六年，中央并宣布在六年內在西藏不进行改革，以后在什么时候如何进行改革，仍然要根据客观情况，由西藏民族領袖，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共同協商解决，給予充分考虑時間，可謂仁至义尽。但是西藏反动集团，根本无視西藏人民希望改革的正义要求，始終不願放弃其特权。同时又憊于人民群众的覺悟日益提高，感到其奴役人民的反动統治的岌岌可危，因而一貫进行反革命活动，曾指使西康反动分子，武装叛乱，破坏西康地区的改革工作，作为其反抗祖国的前綫，掩护西藏本区驅汉独立。在上述地区叛乱平息后，又庇护逃往西藏地区漏网叛匪、搶劫人民、破坏交通和袭击中央派駐当地干部和部队，中央仍然一再寬大容忍，冀其覺悟，而反动集团反而認为軟弱可欺，公然武装叛国，妄图一举赶走共产党，根本葬送人民改革願望，巩固其奴役統治。西藏人民迫切要求改革，深深知道共产党是支持人民改革願望的，因而一致支援人民解放軍迅速扑灭了叛乱，以达逐步进行改革。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無論如何，改革将在充分照顧西藏特点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在改革过程中将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和发揚藏族的优秀文化。” 极端符合西藏情况，我們完全拥护。現在世界上有一些人，故意不了解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願望，假惺惺地装出同情西藏人的面孔，然而他們同情的不过是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近二万人的少数反动分子，即

不是別有用心，也是一種幼稚，我們不歡迎，我們歡迎他們同情西藏勞動人民一百一十幾萬的多數，這個將在西藏高原建設人間樂園的多數，是值得世界上一切好心人同情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共產黨對待宗教堅定不移的長期政策，國內外反動派誣蔑共產黨破壞宗教的慣技，以及最近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中在宗教問題对党所進行的誹謗，絲毫不能動搖我們對党的信賴。解放以來，党和人民政府，對國內各宗教一視同仁的採取保護措施，從政治上講，達賴和班禪，參加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領導人的行列，我和許多佛教界人士也參加了國家各級政權的領導工作，對所有一切宗教者的政治權利毫不歧視。全國佛教組織的中國佛教協會及西藏、內蒙等其他各地的佛協分支機構，均已成立。正當的佛教活動，不僅在國內有自由，在國外同樣有自由，達賴和班禪，我和許多各族佛教人士，均曾參加過不少國際佛教活動。教徒的宗教生活受到人民的尊重。教徒的物質生活，得到政府照顧。佛教的名山古剎，如在抗戰時期被敵偽所毀壞的五台山，黃教祖師宗喀巴的誕生地的塔爾寺，達賴喇嘛家鄉的青海湟中縣的峽峻寺，北京雍和宮，杭州靈隱寺等許多叢林道場，均在政府的資助下修復一新，政府並指撥巨款，在北京西山名勝區修建佛牙舍利寶塔，敦煌和炳靈等地的壁畫，雲崗和龍門等地的石刻，房山石經，金陵經版等許多佛教文物古跡，也在政府的幫助下，得到保存和整理。拿叛亂分子所熟知的西藏地區來說，達賴固有地位和職權及寺院收入，中央均未予變更，各級僧官照常供職，駐藏人民解放軍部隊和工作幹部，一貫尊重教徒信仰，

陈毅副总理赴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在全藏斋僧二十余万，并赠送各寺礼品，捐助各寺常住，这一切都是佛教徒敬爱的党和毛主席伟大的民族政策的体现，真是功德无量。这是中外佛教史上以护法闻名的中国梁武帝和印度无忧王所无法比拟的。丧尽天良的西藏叛国集团，妄图用共产党破坏佛教的陈腔调来动摇佛教徒对党的信赖和忠诚，是白费心机的。我们再看看标榜保护佛教的叛国集团，他们挟持达赖，沾污佛教领袖的声誉，威胁和欺騙信佛群众为保护其特权而广开杀戒，烧毁经象塔寺，劫走佛教文物珍藏，残杀喇嘛，造下了五逆十恶大罪，不仅为国法所不容，也为教规所不许，真是披上佛教外衣的豺狼，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即使在平乱的战斗中，仍然坚持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和文物古迹，例如为了珍惜达赖喇嘛驻锡之地和西藏建筑艺术，对策划叛乱的司令部所盘踞的布达拉宫也注意保护了建筑的完整。从这些鲜明的对比中，不难认识，破坏佛教的不是叛国集团所指责的党和政府而是叛国集团本身。所谓达赖喇嘛声明中说许多喇嘛被杀，是不符事实的，除在平乱战斗中，枪弹无情，难免在打死的一些武装叛匪中有个别披上袈裟的佛门败类外，根本无所谓许多喇嘛被杀之事，而且这必须由叛乱者首先是叛乱的指使者负责。我们藏族人民有强烈的佛教信仰，更有锋利的慧眼，对那些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杀人放火，沾污佛教圣洁的假佛教徒，认为死有余罪，决不姑息。当疯狗咬人时，打死它是应该的，妄想我们在受到疯狗狂咬的时候，不还手招架，未免也太天真。我们认为打死了几个叛国叛人民叛佛教

的假喇嘛，是完全正义的，因为这不仅是为国家人民誅了乱臣贼子，也是为佛門除败类正清規的护法功德。帝国主义者及其代言人，借此兴风作浪，装腔作势的表演一出为西藏佛教遭破坏而痛哭流涕，如丧考妣的丑戏，我們熟知帝国主义者慣用破坏佛教来制造佛教徒对共产党的紧张心理，为了騙取宗教界的輕信，有时装得声泪俱下，但是，假眼泪無論如何也騙取不了中国佛教徒会怀疑正确执行信仰自由政策而对宗教采取保护措施的中国共产党，可是国外佛教人士中，可能有不明真象、发生揣测的人，这是毫不必要的，我們認為国际佛教界有許多賢达的朋友講得很好，他們認為这次西藏叛乱和佛教沒有任何关系，如說：“沒有真正的佛門弟子，会拿起帝国主义供給的机关枪来向已經用行动証明尊重宗教自由的人員开火”。这是对帝国主义无耻調言的有力譴責。

过去达賴喇嘛和班禅額尔德尼两位佛教領袖，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挑拨离間而长期不睦，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而重归于好携手合作，佛教徒莫不感激。在这次达賴被反动集团挟持出国后，国家和人民都体諒他的处境，保留他的地位，周总理在人大报告中，明白表示希望他能摆脱挟持，回到祖国。充分表现了国家对达賴的关怀。甚至在荒謬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发表后，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仍明察秋毫，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賴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賴喇嘛的”。这种对达賴的体諒爱护，我衷心表示感謝。我敬爱达賴喇嘛，我願向达賴喇嘛进一言，如前所述，达賴喇嘛在西藏領導地位的取得，始自清

朝的册封，到了新中国，由于达赖喇嘛拥护祖国统一，更加得到人民信任，给予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领导人之一的崇高荣誉。足见达赖喇嘛只有接受祖国的领导，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荣誉，切不可脱离祖国，丧失人民的信任，我谨遥寄喻达一张，切望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立场，不为反动集团所动摇，努力摆脱挟持，回到祖国，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西藏高原的人间乐园。

西藏反动集团中，有的过去是我的学生，有的过去是朋友，现在你们背叛祖国，都是我的敌人，我要正告你们，继续反动，是肯定没有出路的，国外流亡生涯，又是至可悲的，而且将来终究逃不过人民的审判，唯一的出路是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者、蒋介石反动集团一刀两断，向人民低头认罪。人民是慈悲的，宽大之门对真诚悔罪来归的人是开着的，其速立功赎罪，争取人民的宽大，孰去孰从，幸勿自误。

现在西藏叛乱已经平息，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已经搬掉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更加巩固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在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的领导下，行使原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将逐步彻底实现，今后勤劳勇敢的西藏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支援下，将发挥充沛的革命生命力，鼓足干劲，把西藏高原建设成为人间的乐园。

最后我祝愿在胜利扫荡西藏边远地区叛匪战斗迅速取得彻底的胜利，在新生的西藏的各项建设与改革事业和佛教飞跃发展。

(五) 黃正清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作为一个藏族代表，我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彻底平息西藏叛乱，并在西藏逐步进行社会改革和实行民族地方自治的方针。

西藏从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西藏民族，同各兄弟民族一样，对缔造我们的祖国有过贡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同各兄弟民族结成了血肉的关系。西藏民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西藏才发生了非爱国主义的倾向。而西藏的和平解放，又使西藏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祖国的统一。这一切，都有历史事实可以查考，决不是任何人所能随便歪曲的。我们甘南藏族人民知道得尤其清楚。原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投靠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阴谋策划所谓“西藏独立”，这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采取坚决措施平息西藏叛乱，完全是行使我国主权，完全是我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否则就是干涉我国内政，就是违反

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就是对我國不友好的舉動。祖國的命運，同我們各民族的命運是休戚相關、血肉相連的。在我們祖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動派統治的歲月里，各民族的遭遇都充滿了悲慘、痛苦和血淚。而今天，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強大和統一的祖國大家庭里，我們各民族都享受到溫暖和幸福，走上了繁榮發展的道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把各民族的命運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了。祖國的統一，就是各民族共同的最高利益。對於曾經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壓迫下受盡苦難的各民族人民來說，難道還有比一個強大的統一的祖國更為可貴的嗎？離開了各民族的最高利益，就根本談不到民族利益。原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為了掩蓋自己的叛國罪行，裝出一副代表西藏民族利益的样子。其實，這是無濟於事的。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要求的是祖國的統一，不是祖國的分裂；是民族團結，不是民族分離；是忠实地履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不是撕毀這一協議；是光明幸福的大道，不是黑暗痛苦的深淵。而這些叛亂分子却是里通外國，破壞祖國統一，想把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把西藏人民推向水深火熱的境地。他們的所作所為，那里有一絲一毫代表着西藏民族的真正利益？背叛祖國，就是背叛本民族利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叛亂分子的罪惡活動，遭到了全國各民族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和愛國人士的堅決反對，而陷於可恥的失敗。這樣的下場，對於那一小撮偽裝代表民族利益的西藏叛亂分子，真是最好不過的諷刺了。

黨和人民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地方自治，使

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的一致拥护。在西藏逐步实行民族地方自治，是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的，也是完全符合西藏广大人民愿望的。记得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西藏人民欢欣鼓舞的情景，深深受到感动，衷心为西藏人民美好的未来祝贺。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完全不顾西藏人民的意志，根本反对实行民族地方自治，百般阻挠西藏自治区筹备工作的进行。他们的所谓“西藏自治”，实际上就是“西藏独立”，目的是要维持他们对西藏人民的黑暗统治，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保存封建的农奴制度，使西藏脱离祖国的怀抱。显然，这种“独立”，同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由西藏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族地方自治，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种“独立”，除了对帝国主义和极少数反动分子有利以外，给西藏广大人民带来的，只能是屈辱和苦难。这当然是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民族人民断乎不能容忍的。西藏叛乱的失败，正是说明了叛乱分子的所谓“独立”在西藏人民心目中早已彻底破产，而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地方自治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

西藏叛乱分子还叫嚣“赶走汉人”，诬蔑人民解放军是“汉人的军队”，企图挑拨汉藏民族的关系。然而这毕竟是徒劳的。解放以来，在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汉藏民族的友爱合作关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们藏族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汉族老大哥的

亲切帮助，我們藏族要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就拿我們甘南藏族自治州來說，几年来能够在各方面得到这样重大的进展，都是同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的帮助分不开的。事实証明，叛乱分子的叫嚣，除了更加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以外，还能够得到什么呢？大家知道，人民解放軍是各民族的优秀子弟組成的，其中，有汉族也有其他兄弟民族。我自己就是甘南軍分区的司令員。我們的副司令員楊复兴同志，也是藏族。这难道可以說解放軍是“汉人的军队”嗎？再进一步說，更重要的是人民解放軍日日夜夜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保卫着各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各民族人民一向認为人民解放軍是自己的军队。有了人民解放軍各民族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建設，而不至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分子的破坏。就拿这次西藏叛乱事件來說，如果不是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队給了叛乱分子以毀灭性的打击，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真不知道要受到多么重大的損失。現在可以看清楚，西藏的反动分子所以一貫敌視人民解放軍，原因也正在这里。

西藏現存的封建农奴制度，是一种最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是造成西藏民族落后和西藏人民苦难的根源。这种制度不改革，西藏人民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翻身，西藏民族就不可能走向繁荣和进步。解放以来，西藏广大人民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西藏的爱国人士也主张改革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的社会改革，仍然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針，这完全是以祖国統一和民族团结为重，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但是，原西藏地方政

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不但拒不履行十七条协议中有关社会改革的規定，而且变本加厉，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企图保存封建农奴制度，繼續压迫和奴役西藏人民。結果呢？适得其反，恰好为西藏的社会改革排除了障碍，創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們甘南藏族地区，在一九五八年废除了剝削制度和封建特权以后，很快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我相信，这种一步直登九重天的伟大变革，不久也将出現于西藏。

昨天，我看了四月十八日在印度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官員散发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感到极大的憤怒。这个声明完全是歪曲事实顛倒黑白的捏造。它显然是外国侵略者和西藏叛乱分子共同制造出来的东西，而并非出于达賴喇嘛的本意。特别是从文体、語气上看，完全不象我們藏族的，倒象是某些外国人的手笔。叛乱分子既然把达賴喇嘛劫出了国外，何尝不可以在外国侵略者的授意下盗用达賴喇嘛的名义发表这样那样的声明。这是誰都能够想象得到的。我們不禁为达賴喇嘛当前的处境担忧，希望他能够早日摆脱外国侵略者和叛乱分子的挟持，回到温暖的祖国大家庭里来。

讓外国侵略者和叛乱分子去叫嚣和哭泣吧，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队的援助下，在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支持下，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班禅額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員的直接领导下，經過西藏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取得平息叛乱的彻底胜利，一定能够順利进行社会改革和实行民族地方自

治。西藏人民在封建的农奴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就要永远结束，落后、黑暗、残酷的西藏就要成为过去，在祖国土地上一定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最后让我高呼：

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班禅额尔德尼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各位委员：

最近，我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依照西藏全体僧俗人民的意愿，并以充分事实为根据的发言，竟引起了印度一些报刊的仇视和咒骂。出于我的意外的是，连尼赫鲁总理也说我的发言“不公正”。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借政协会议的机会谈几句。

尼赫鲁总理在指责我的时候并没有作什么解释。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发言究竟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难道我郑重地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对于印度就不公正了吗？难道我谈了我们不许任何外国人干涉我们西藏和我们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就是“不公正”的吗？难道我对于印度某些扩张主义分子大肆破坏我国统一、破坏中印友谊的荒谬言论表示愤怒，就是“不公正”的吗？我想这些都不能成为责备我“不公正”的理由。试问，如果印度某一个邦的内政遭受别国粗暴干涉的时候，印度的爱国人士能够表示赞成，表示欢迎或者闭口不言吗？当我国内政受到外国狂妄干涉的时

候，我站在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維護中印友誼的立場，表示義正詞嚴的警告，這不但完全是公正的，而且完全是應該的。

尼赫魯總理在談話中還表示，他歡迎我到印度去會見達賴喇嘛，或者會見我願意會見的任何人，並且說，印度會以每一種禮儀來接待我。邀請無疑是應當感謝的，但是據說，這個邀請的用意是要我去証實一下達賴喇嘛並不是被劫走到印度去的。我想，既然尼赫魯總理也說，達賴喇嘛已經承認他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是真的，那麼，只是這一點，就已經有力地說明了達賴喇嘛被劫走的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看不出我去印度還有什麼意義。如果尼赫魯總理的意思是希望我到印度去談所謂西藏問題，那麼我應當鄭重聲明，西藏問題只能在西藏解決，在中國解決，決不能在任何外國去解決。這個道理非常明顯，我相信，無論什麼人在這一點上不會不了解，也不應當有任何的不了解。

在達賴喇嘛回國以前，我代理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雖然我很關切達賴喇嘛，但是，由於身負重任，勢難遠行。我可以遙向達賴喇嘛告慰的，一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選出達賴喇嘛和我為人大副委員長；二是西藏反動分子的叛亂現已基本平息，流血的戰事已經基本停止，秩序迅速恢復，軍民親如一家，人民安居樂業，並且正在積極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準備民主改革。我和西藏人民都希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到祖國，看到他平日關於西藏改革的願望順利實現。

印度是我們偉大的鄰邦。對於印度和印度人民，我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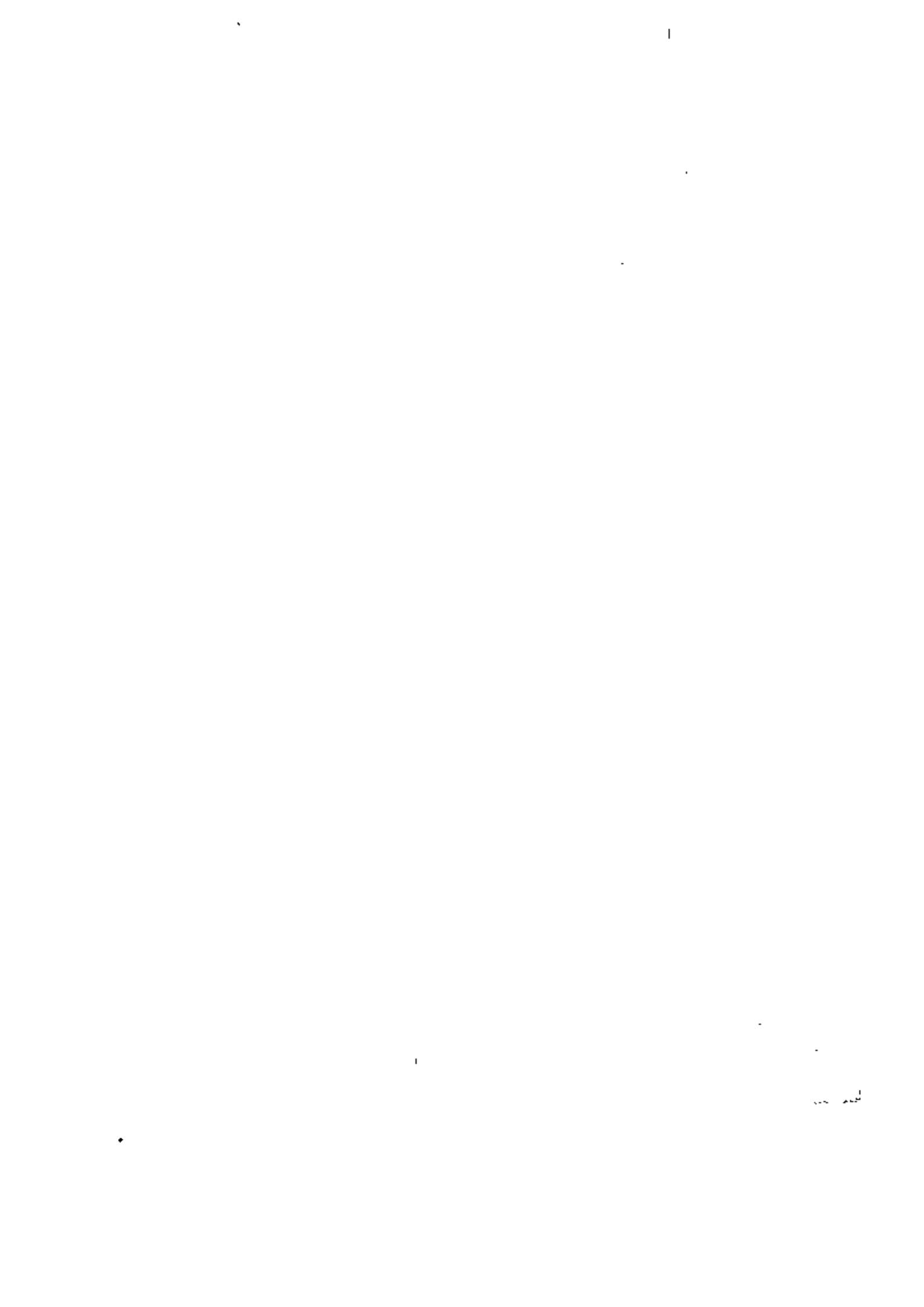
有充分的敬意。我和达賴喇嘛曾經在一九五六年应印度副總統的邀請到印度。印度人民对达賴喇嘛和我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是我深切感謝的。中印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誼，由此又得到一番証明。不过我也順便想起一件小事：在那次訪問期間，某些印度官員在安排接待的时候，常常表現出一种对我的歧視，我的随行人員有时甚至沒有房子住，而只好住在火車車廂里。这当然不是印度人民所知道的，而且我想，这也許不是印度政府有計劃的安排。不过这不能不給我留下一个印象罢了。

尼赫魯先生說：“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历史的、情感的和宗教的，而基本上不是在政治方面。”我觉得，这种說法并不能解释最近以来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干涉我国內政的言行。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印度噶倫堡几年来就成了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匪幫和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謀活动的一个中心。最近，印度有一些狂妄的人，利用西藏叛乱和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对我们伟大祖国进行攻击毀謗，破坏五項原則，干涉我国內政，鼓吹所謂“西藏独立”，煽动反华情緒。象这些人的这些言行，怎么能說并不屬於政治方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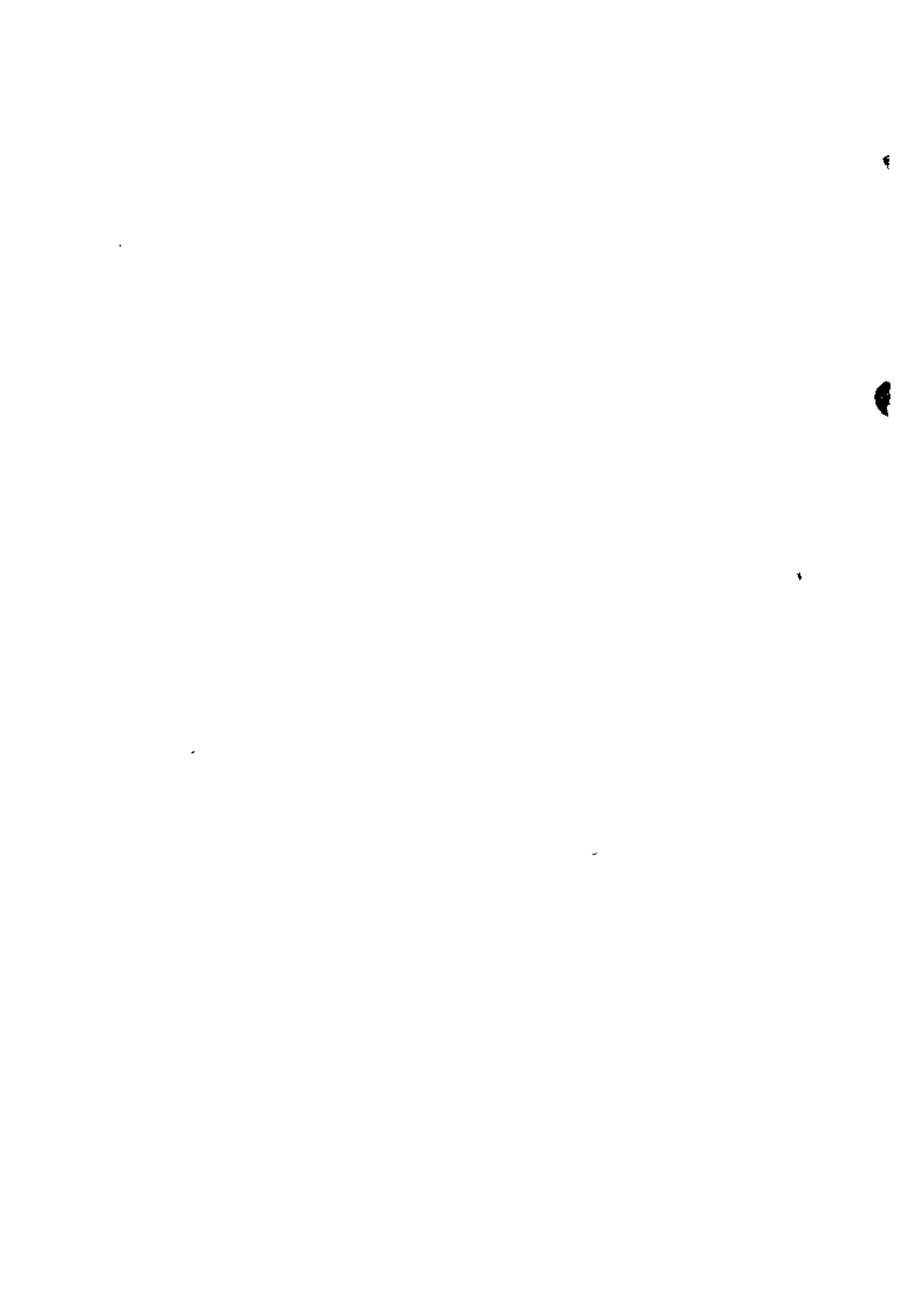
至于說到宗教方面的兴趣，我不禁又想起一些亲身經歷。佛教曾經在印度流行过，印度有許多佛教圣地。但是我們一九五六年在印度參觀时亲眼看到，印度有名的納連哲、瓦日拉色（釋迦牟尼首次講經的寺院）、陆乔、巴基惹等不少宗教寺院，破烂不堪，香烟不茂，善事几乎絕緣；佛像东倒西歪，破鼻烂眼，缺臂少脚。印度現在信佛教的人很少，这原

是我們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對自己國家的佛教如此不關心的人，偏偏口口聲聲關心西藏佛教和西藏文物，這不是很奇怪嗎？我們虔誠地信仰宗教，但是堅決反對任何人借着宗教的幌子進行干涉別國內政的活動。無論西藏人或者印度人，都應該對於這種人提高警惕，不要上當！

現在西藏反動分子的叛亂既然基本平息，所謂西藏問題也就基本結束。但是少數外國干涉者還在企圖利用所謂西藏問題在世界上興風作浪。我相信，一切不是同情那些劫持達賴喇嘛的萬惡叛匪、而真正同情達賴喇嘛和同情西藏廣大僧俗人民、維護五項原則、維護中印友好的印度朋友們，一定能對這種干涉者的狂妄叫囂給以嚴厲譴責和制止。我國各民族六億多人民和印度四億人民，決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名義來破壞中印兩國人民之間的偉大友誼！



三



不能允許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損害

“人民日報”觀察家評論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西藏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遭到可耻失败以后，长期策划和支持这个叛乱阴谋的帝国主义者，再也掩藏不住他们的懊丧和仇恨的心情了。他们公开站在罪恶的叛乱分子一边，大肆污蔑中国人民平定西藏叛乱、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安全的行动是“压制自由”、“摧毁宗教”、“吞并”、“扩张”等等。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代言人发出这一类司空见惯的论调，原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在攻击中国人民的同时，正在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露骨地挑拨中国和西南邻国，特别是和印度的关系。他们胡说什么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似乎是“为进一步向南扩张扫清道路”，“从战略上指向印度”。帝国主义挑拨者的居心何在，是一望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印两国人民、两国的政治家和舆论界共同努力维护和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显然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最近期间，在印度国内竟然出现了大量的同中印友好关系极不调和的言论。有些人公然把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西藏境内平定叛乱，说成是对别人的“干涉”和“侵犯”。似乎西藏并不是中国的领土，而是印

度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似乎沒有比印度人民社会党表現得更“勇敢”的了。这个党的领导人不但在印度人民院中要求討論純屬中国內政的西藏叛乱問題最积极，而且还組織了所謂“支援西藏人”的示威。这个党的领导人之一克里帕拉尼說，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沒有历史根据”，中国政府平定叛乱是“侵略行动”，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动”。这个党的領袖阿索卡·梅达竟然說，“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把西藏問題完全看作是中国內政，是錯誤的。人們不免要問，难道象梅达那样，把印度和西藏的关系說成是“母子关系”倒是“正确”的嗎？

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有一些人做得还要过分。他們公开宣传中国平定西藏叛乱已經“威胁”了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主张印度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印度快报”四月二日的一篇文章把中国的西藏看作是中印之間的“緩冲国家”。它并且說，“对緩冲国家的威胁是最大的邻国之間发生冲突的前奏”。这家报纸对印度总理尼赫魯在三月三十日的演說中申明的政策并不滿足。它說，尼赫魯“在送鮮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鮮花，而左手向中国大扔鮮花。难道总理沒有認識到，他这样做是在把侵略和被侵略者等同起来” 这家报纸还說，“尼赫魯总理一方面表示印度对西藏人非常同情，另一方面又要說明維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要在人民院中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这家报纸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所謂“更加坚决的态度”。印度人民同盟領袖瓦吉帕伊甚至危言聳听地說，“假如西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

国家,被中国并吞了,这将危及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錫金的独立”。他要求立即采取步骤“使国家处于军事准备状态”。

很明显,如果依照这些人的主意行事,其结果只能损害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所日夜馨香祝祷的。“印度时报”记者在报道美国的态度时说,华盛顿人士希望“中印关系可能变得极为紧张”。美国“希望通过同情印度的做法来证明中立是无益的”。

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当然不能认为是以事实和理智为依据的。西藏既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更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平定西藏叛乱,完全是中国自己的内政。这是世界上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尼赫鲁总理在西藏叛乱发生后的几次声明中,都重申了印度历来就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至于所谓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会威胁印度的安全,这尤其是毫无根据的说法。新中国成立近十年以来,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威胁或侵略任何国家。西藏叛乱分子长期以来的罪恶活动,恰恰是构成了对中印两国友好和安全的危害。因此,西藏叛乱的平定,只能有利于保障中印两国的共同安全,有利于消除在两国之间制造不和的因素,从而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必须指出,象上述那样地重复帝国主义诬蔑中国的滥调和蓄意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人,毕竟在印度只是少数。许多印度朋友是认识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认识到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也肯定维护中印友好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西藏的自治表示很大的“热心”,似

乎是由于中国政府破坏了西藏的自治，才发生了叛乱。他们把一小撮的叛乱分子当作整个西藏人民，并且对叛乱“同情”，而对西藏自治之“消灭”感到“不安”。这些印度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使自己陷于难以辩白的矛盾中。首先，既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末，关于西藏的政治制度问题，当然同样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任何外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事宣传这种主张或者那种主张，犹如另一国家在印度政府对某一邦或某一少数民族的政策的问题上大事喧嚷一样，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其次，事实上，中国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历来主张在西藏实行地方自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已成立，仅仅是由于西藏反动集团的阻挠，筹备工作很少进展。西藏反动集团要的不是区域自治，而是帝国主义多年策划的所谓“西藏独立”，实际上也就是要把西藏人民投入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灾难的深渊。现在，这批叛国分子已经遭到西藏广大人民的唾弃，两三年来没有做任何工作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的叛乱平定之后，在班禅代理主任委员的主持下，已经在四月八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并且就贯彻执行国务院命令作出决议，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叛乱，建设新西藏。可以完全肯定，西藏叛乱彻底荡平之后，西藏民族地方自治必将迅速实现，西藏人民必将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在西藏人民欢庆新生的时候，偏偏要对西藏人民的处境表示什么“同情”和“不安”，好象在人家办喜事的时候唱哀歌一样，这难道是一种明智的行动吗？

有些印度朋友对于噶伦堡问题特别敏感。这也不能说

为是实事求是的。西藏叛国分子以噶倫堡为在国外的基地，勾結帝国主义分子，策划叛乱活动，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印度“閃电”周刊在最近对此已經作了有說服力的揭露，我們不想多說。尼赫魯总理在四月二日的談話中，一方面否認那里是指揮叛乱的中心，另一方面又說他“不能担保任何秘密的东西”。的确，噶倫堡的叛国分子有时是公开活动，有时是秘密活动，印度的朋友們可能不知道，但是不能因此推斷我們也一定不知道。印度朋友不能太相信他們了。

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有共同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作为基础。我們两国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是任何人都破坏不了的。我們高兴地看到，在帝国主义者竭尽挑拨之能事的这些日子里，印度广大人民和公正輿論对于中国人民始終抱着友好的态度。他們要求注意帝国主义的挑拨伎倆，反对在西藏問題上采取任何損害中印友好关系的做法。印度“閃电”周刊最近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空談西藏独立是有害西藏人的事业的；而且，这等于在离間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德里时代周刊”說，“印中友好不但應該保持，而且應該进一步加强”。“团结报”說，借西藏事件叫囂資难的人希望印度“对中国和俄国采取敌对的态度，同美国和英国結合起来”。“自由报”要求爱国的印度人注意“美国战争販子在亚洲的大阴谋”。它說，“帝国主义集团过去和将来都是要阴谋打击万隆精神下的团结和根据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不干涉政策的”。

現在达賴喇嘛在叛乱分子劫持下已經进入印度。那些

仇視中印友好的人正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新的挑拨。在这个时候，尼赫魯总理在印度議會外交諮詢委員會的講話中着重指出“不可讓中印关系恶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誠如“甘露市場报”所說的，“也許还有不单是出于对佛教的虔誠的其他有关方面想利用达賴喇嘛逃亡印度来达到政治目的”。这家报纸还說，估計还会出现很多这种复杂的事情，“假如印度政府采取任何步骤来防止这个国家被用来作为进行反对中国活动的便利場所，这个步骤应当是防止印度被进一步牽連到比冷战更能危害印度安全的事情中去”。

我們相信，只要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帝国主义者和某些反动分子企图利用西藏叛乱事件損害和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詭計，是一定要失败的，正同他們在发动西藏叛乱的事件中遭到完全失败一样。同帝国主义者的願望相反，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誼，将通过这一切考驗，进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評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

新华社政治記者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发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詞穷、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維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統一国家的事实，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独立”。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几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达賴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謀。这个声明从所謂西藏独立开始，証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一九五一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一九五一年協議一开始就確認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却没有一句話說到这一点。只是这个事实，就使得声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協議”的話，无法令人置信。

这个声明硬說，一九五一年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

七条協議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造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沒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事实真相是这样: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后达成的。达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后的一九五一年十月間給毛澤东主席的电报中曾說到这个協議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达成的,并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完全忠实地履行十七条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均未予以变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职;宗教活动和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藏軍应逐步改編为人民解放军,一直沒有进行。到一九五六年底,中央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过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負責进行。中央为了根据宪法在西藏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成立了以达賴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之所以沒有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为他們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国主义者所要的“西藏独立”。他們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十七条協議,从指使康巴叛匪騷扰

一直到他們自己在三月十日这个日子公开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个声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条協議的事实，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违背十七条協議的事实。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一九五五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原西康地方叛乱的平定。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后来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达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道經四川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迫不及待，阴谋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举行叛乱。他們的企图是以康巴叛乱为前綫，掩护西藏本区驅汉独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战斗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决策，以为煽动康巴人首先叛乱是大为得計的。事实与他們的設想相反，这个叛乱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当然会死一些人，损坏一些建筑物，这必須由叛乱者首先是叛乱的指使者負責。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杀、許多寺院被摧毁的事。这个声明举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乱来攻击中央人民政府违反十七条協議，不但反証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这一協議，而且恰恰証明了西藏叛乱集团正是康巴叛乱的指揮者。

这个声明在談到三月十日至十九日发动叛乱的經過时也是歪曲事实的。大家知道，三月十日是发动叛乱的日期。叛乱集团选定这个日期，是因为达賴喇嘛自己决定在这一天到西藏军区礼堂去看文艺表演，而看这次文艺表演的要求也是达賴喇嘛自己在一个月以前提出的。声明不敢直接

否認这个事实，故意含混地說什么达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艺表演，而三月十日这个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声明可不敢講。但是，达賴喇嘛在三月十一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昨天（指三月十日）我決定去軍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訪”。声明避而不談达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証明了写这个声明的人不敢面对事实。声明說人民解放軍在三月十七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三月十七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宮打了两三炮”，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开了一道后門：“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进攻，为什么偏偏只打两三发炮弹，而且在打进了池塘以后，就不多打一发呢？

声明中关于达賴喇嘛离开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对于达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离开拉薩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这一段話表明，并不是达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离开拉薩。这是关于达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无法掩飾的流露。达賴喇嘛三月十一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动的坏分子們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三月十二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厦，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須立即撤走。”这說明三月十日以后达賴喇嘛是被叛乱武装包围起来，并在三月十七日被劫走的。声明不敢否認这

些事实，使所謂达賴喇嘛“願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薩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云云，成为一种显然的欺人之談。

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賴喇嘛本人的声明。第一，声明的内容同达賴喇嘛本人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三月十日叛乱发生后达賴喇嘛的三封亲笔信，完全违反。甚至一九五六年达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动分子包围的时候，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談話中，也决沒有表示过这次声明中那种分裂祖国而迎合外国侵略者的观点。第二，这个声明是以达賴喇嘛本人的声明的形式发表的，可是在声明中却找不到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称的“他”字，这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声明中的某些观念和詞句也是外国的，例如所謂“中国的宗主权”的說法，就是英帝国主义首創的，英国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国对西藏的所謂宗主权的掩护下进行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沒有使用过这种字样。現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繼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們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簡直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声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国的报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乱事件时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达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从以上的情況看来，人們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賴喇嘛本

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

这个声明說了一个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汉人不同。这个真理适用于蒙古人、滿人、維吾尔人、回人、在广西的僮人、南方几省的苗人和瑶人以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他們都不同于汉人。但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要求独立，他們都在祖国的大家庭内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独立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同西藏发生外交关系。现在忽然說要独立了。所謂独立也者，实际上就是要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独立，人們不禁要問：这是不是企图把达赖喇嘛置于同祖国敌对的地位，堵塞达赖喇嘛重返祖国怀抱的道路呢？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北京的观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国分子的真面目以外，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声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这个希望倒是切合实际的。一个多月以前爆发的叛乱不要很久就会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队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区的叛乱，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区的叛乱集团。人民解放軍部队已經在平叛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去几天中已經控制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国的全部国境綫。只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乱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战斗中，当地的藏族人民完全

站在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被裹胁的分子纷纷脱离叛匪队伍，回家生产。不但流血将成为过去，而且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也将成为过去。

欢呼討平西藏山南叛匪的重大胜利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論)

奉命討伐西藏叛国集团的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部队，在彻底平定了拉薩地区的叛乱之后，揮师南下，又在山南地区蕩平了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匪的老巢，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目前，我軍已控制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喜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和这个地区的所有边境国防要点，正在当地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乘胜清剿零散叛匪，不日即可彻底肃清。捷报传来，举国欢騰。这是西藏人民的福音，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福音！

山南地区是叛匪长期盘据的一个重要老巢。这股叛匪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指使下，勾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进行背叛祖国的叛乱活动。他們利用这个地区同外国接壤，不断接受从外国輸入的武器和外国飞机的空投接济，进行劫掠財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因此，我軍一举肃清这股叛匪，解放这个地区，对于加速平息西藏地区的叛乱，有着特別重大的意义。西藏其他偏僻地区的零星残匪，現在已成瓮中之鳖，无路可逃。他們如不迅速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就将被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一心想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人民变成它们的奴隶牛马。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为了攫取我国的西藏，一直在西藏统治集团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策划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以便为它们进一步侵略西藏制造口实，最后把西藏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这次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背叛祖国，就是受到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的唆使和策动的。但是，无论西藏叛国集团也好，无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也好，它们都把西藏的局势完全估计错了。山南地区叛匪老巢的迅速复灭，正是人民解放军和西藏人民用实际行动，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分裂西藏阴谋的一个最响亮的回答。应该再一次警告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扩张主义者：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胆敢侵略西藏的阴谋，一定会在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铁拳下被打得粉碎。中国人民不要任何外国一寸土地，但是也决不让别人抢走一寸土地。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扩张主义者，都应该是一次有益的教训。

山南地区平息叛匪的伟大胜利，是对西藏叛国集团一个致命的打击，也是对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胜利，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并且进一步巩固了我国西南的国防，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人民解放军进驻边境国防要点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任意派遣特务间谍，私运军火，进出我国国境，进行侵略活动了；他们

指望发动叛乱从而分裂中国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这对于中国安全当然是大大的好事，对于亚洲和平也是大大的好事，只有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是大大的坏事。

人民解放军在平息山南地区叛匪的战斗中，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这是迅速获得完全胜利的重要原因。大军到处，藏族人民箪食壶浆，修桥补路，引导解放军追歼叛匪。这充分表明，山南地区藏族人民完全站在解放军一边，热烈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山南地区人民长期处于叛匪控制地区，受着叛匪和当地反动的奴隶主的压榨，痛苦不堪，他们迫切地希望从黑暗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因此，当人民解放军一到，他们就象遇到了亲人一样，欢庆新生，同声感激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救命恩人，并积极协助解放军讨平叛匪。山南地区藏族人民同人民解放军鱼水相得的关系，证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也说明了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正是由于广大当地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一边，而叛匪在当地人民中完全陷于孤立，所以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叛匪则望风披靡，一触即溃。这再一次有力地表明，西藏叛国集团根本不代表西藏人民，他们只是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是西藏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力图把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里通外国、祸国殃民的叛乱，说成是什么“民族独立运动”，实在是最无耻的谎言。

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还残存的零星股匪的唯一出路是立即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政府和解放军对于叛乱分子

的政策是：繳械投誠者將從寬處理，立功者將受到獎勵，勸導分子不加追問，只有對那些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的首要分子才依法懲辦。在山南地區的战斗中，有些叛亂分子逃亡到印度去，那是絕路一條。

西藏叛亂的迅速平息，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從此，西藏人民將逐步擺脫落后的黑暗的生活，走上繁榮進步的光明大道。叛亂的平息，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鋪平了道路，也將使西藏迅速實現民族區域自治。現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已經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職權。有關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的具体步驟和方法，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將同西藏各階層人士進行充分的協商。西藏上層和中層愛國進步人士的利益將得到適當的照顧。宗教信仰自由亦將繼續受到保護。民主改革是西藏走向繁榮幸福的必由之路，無疑將獲得西藏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

人民解放軍從一九五一年進駐西藏以來，對西藏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們充分發揮了我軍的一切優良傳統，正確地執行了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得到了西藏廣大人民和愛國人士的愛戴。在这次平定叛亂的战斗中，人民解放軍部隊不顧地形險阻和雪山峻嶺，勇猛追歼叛匪，很好地完成國家和人民付托給他們的神聖任務，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建立了功勛。在这里，我們謹向忠勇的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部隊的全体指揮員、战斗員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他們早日徹底肅清殘匪，巩固祖國國防！

讀尼赫魯总理的談話

“人民日報”評論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口)

印度总理尼赫魯在四月二十四日会见达賴喇嘛之前和以后，接連发表了几次談話。尼赫魯总理在会见达賴以后发表的談話，証實了达賴喇嘛所写的关于他被西藏反动分子劫持的信件是真实的。这当然会促使印度輿論界和政界在这个問題上的許多不正确意見得到澄清。此外，尼赫魯总理还表示仍然願意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并且一再表示希望印度的那些就西藏問題大发議論的人們“运用智慧和自制，在这个問題上說什么話的时候要有責任感”。我們欢迎尼赫魯总理的这些有益于中印友好的表示。

达賴喇嘛写給譚冠三将军的三封信，对于認識西藏叛乱的性質和达賴喇嘛在三月十日以后的处境，是一个重要关键。在这三封信里，达賴喇嘛不仅象尼赫魯总理談話所說，“希望避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而已。他再三指明他是被“拦阻”，被“危害”“生命难保”，而那些以“保卫”他为名而拦阻他、危害他的人是“坏人”，是“反动的坏分子”，是“违法”的“反动集团”，是“狂妄”的、“严重离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达賴喇嘛因为受到这些

反动分子的劫持而“无限忧伤”，而“害羞难言，忧虑交加，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这还不是完全证明了他确是被劫持了吗？达赖喇嘛虽然“设法平息”违法行为，“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并“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七十余人进行了教育”，但是非常明显，他的已经背叛了的政府官员根本不听他的命令。据参加达赖喇嘛在三月十四日召集的会议的堪穷土登丹巴证明，达赖喇嘛在这次向政府官员进行教育的会议上曾经明白宣布：“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到印度去为好，这种作法只能是为了个人的安乐。以前我去过亚东，前年也去过印度。住在那边是不行的，我只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因果。”根据达赖喇嘛三月十六日写给谭冠三将军的第三封信，他当时的计划还是在几天以后“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并要求军区“亦采取可靠的措施”。直到三月十七日下午四时，据尼赫鲁总理的谈话说，达赖喇嘛仍然没有想到离开拉萨，流亡印度。忽然，尼赫鲁总理接着说，当“据声明（印度报业托辣斯原注是指达赖喇嘛在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说‘那些炮弹或者什么东西落在他的宫殿’——不管是什么原因——的时候，这于是就对他的想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既然一切都完了，‘我们走吧’，于是他们就在六小时以内离开了。”请注意：据四月十八日提斯浦尔声明，是“迫击炮打了两三炮”，“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只隔了六天，炮弹后面就加上了“或者什么东西”，“池塘”就变成了“宫殿”，而且加上“不管是什么原因”！两个或者两三个不知什么东西不知什么原因落到宫

殿或者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就会使被劫持的达赖喇嘛忽然得到自由和权力，“自愿”同他所深恶痛绝的反动分子离开拉萨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一切难道能使任何有客观态度冷静头脑的人信服吗？这还不是明明证明，劫持达赖喇嘛的叛乱分子向达赖喇嘛任意编造了一个恐吓他的谎言，（也就是提斯浦尔声明所谓“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就此不由分说，把他劫出拉萨，劫到印度去了吗？印度孟加拉文日报“划时代报”四月二十日的评论说得好：如果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达赖喇嘛目前的声明（指提斯浦尔声明）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恳切地希望，所有印度的朋友，包括我们尊敬的尼赫鲁总理，终于能够达到同我们一样的结论，即：既然达赖喇嘛亲自证实了他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他就是确实被劫持了，而提斯浦尔的声明就仍然是被劫持的产物，完全不能代表达赖喇嘛的意志，完全不能反映西藏叛乱的真实情况。

尼赫鲁总理在二十四日对国大党人说：西藏事件为印度造成了困难问题。印度政府正面临着一种已经引起了混乱的困难局面。尼赫鲁总理的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尼赫鲁总理说，在还不了解全部事实的时候就对一些复杂的问题表示意见，是不太负责的做法。我们以为，印度政府的烦恼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此而引起或者由此而增加的。

印度政府再三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对西藏决没有领土的和政治的野心。但是印度某些政界人士对于中国在西藏的内政如此热心于干预，却远远超过了

一个耐心的友好的邻人所能忍受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严肃的国家，它对于它所宣布要实行的东西持有郑重的态度。中国一定要解放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果然进驻西藏。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规定在西藏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人民政府就果然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积极筹备西藏地方自治，这种自治本来早已会实现了（就象在内蒙、新疆、广西、宁夏一样），如果不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竭力阻挠的话。中国和印度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其中首先规定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就果然严格遵守这个协定，严格执行五项原则，不干涉印度的内政，也拒绝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的印度朋友熟知中国的这种态度，而且没有理由非难中国的态度。既然如此，印度的某些政界人士为什么硬要在西藏问题上怀疑中国政府的正式文告，硬要进行不信任中国和干预中国内政的宣传，因而自寻烦恼呢？

尼赫鲁总理说：我们对别人说我们的一切话不能充耳不闻。这大概是指中国人民近日对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击。诚然，中印两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友好关系，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受到了损害，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方面的过错。谁都知道，中国并没有干涉印度的内政，而西藏并不是印度的领土。但是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前，从今年二月开始，印度的一些报纸上就散布了许多预告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言论。而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的许多报纸简直就象遇到了节庆一般，连篇

累牍地发出了大量的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論。据对二十九家印度报刊从二月二十四日到四月七日（沒有包括最近更高涨的二十天）的統計，就发表了有关西藏叛乱的新聞和評論三十一万余字。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反应在长时间内是异常克制的。甚至有人在印度的国会中誹謗中国政府，并且在中国駐印度的使館和領事館門前組織了反华示威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仍然表示希望两国的友好关系繼續发展，並沒有对这些极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譴責。但是，这一切並沒有使印度的那些扩张主义分子知所检点。他們利用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对中国大肆攻击，公然要求“西藏独立”，要求召集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面的圓桌會議，在报纸上发表污辱中国元首的漫画，甚至組織污辱中国国家元首的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直到这时，中国人民才表示了不能抑止的义憤。虽然如此，珍惜中印友誼的中国人民，始終沒有象一些蓄意破坏中印友誼的印度人那样地行动。相反，我們的斗争限于反对印度的干涉者和扩张主义分子，对于这些人的回击是必要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既然在中印友好关系上下了傾盆毒雨，就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消毒工作。否則，中印的友誼就无法巩固。

尼赫魯总理表示关心达賴喇嘛的前途。我們当然更关心达賴喇嘛的前途。我們以为，在証实了达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信件的真实性的以后，这个問題应当是容易解决了。达賴喇嘛本来不願意到印度。即令相信他的顧問們的話，也只是两个不知什么东西不知什么原因掉在他的宮殿或者附近的池塘里，才迫使他莫名其妙地离开拉薩。人們如果真

的同情达賴喇嘛，而不是同情那些劫持达賴喇嘛的万恶的叛匪，就有道义上的責任帮助他实现他在給譚冠三將軍的信件中的願望。我們相信，除非劫持达賴喇嘛的人下定决心，硬要使达賴喇嘛永远退出西藏的政治生活，而印度方面也贊助他們的这种决心，否則，达賴喇嘛終于会回到可爱的祖国来的。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 西藏人民的新生

章 魯

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策动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他們所控制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統一的武装叛乱，他們已經遭到可耻的失败。

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和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是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維護祖国統一的。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則蓄意撕毁協議、分裂祖国統一。在維護祖国統一和破坏祖国統一这两种力量之間，存在着不断的斗争。西藏叛乱事件的不定，表明維護祖国統一的力量已經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所簽訂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是維護祖国統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協議。協議第一条規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驅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二条規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

員和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八年來堅決執行協議，在團結西藏人民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的鬥爭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英帝國主義在一九〇四年攫取了西藏的亞東、江孜、噶大克三地的通商特權，英帝國主義後來是印度政府在以上三地派駐官員、軍隊，開辦郵政電報、學校、醫院，沿途設立驛站，並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權。這些特權，在一九五四年經過中央人民政府與印度共和國政府的外交談判，全部取消了。英帝國主義挑唆尼泊爾王國進犯西藏所取得的各种特權，經過中尼兩國政府的外交談判，也在一九五六年取消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擺脫了近百多年來遭受帝國主義奴役的命運，實現了祖國的統一和主權的完整。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儘管受到上層反動集團的多方阻撓，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由於國家的幫助和兄弟民族的支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所有這些，都促進了西藏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間以及西藏民族內部的團結，為西藏人民建設新的生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仍然沒有放棄侵略西藏、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一貫勾結英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對於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死不甘心。他們狼狽為奸，從協議簽訂之日起，就蓄意進行破壞，企圖把西藏地方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八年以來，以魯康娃·澤旺饒登、索康·旺濟格勒、赤江·羅桑益西、帕拉·土登為登、柳霞·土登塔巴、仔本夏格巴、嘉樂頓珠、宇妥·札西頓珠和威薩堅贊（功德林札薩）等為首的叛國集團，在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帝

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下，进行了一連串的叛国阴谋活动。一九五一年冬天，当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西藏的时候，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代理藏王）、叛国首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领导下，一部分反动分子在拉萨组织所谓“人民会议”，公然反对协议，叫嚣要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后来因为受到中央的严正指责，原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宣布反动的“人民会议”为非法，并撤销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司曹职务。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分裂祖国的反动活动没有因此停止。一九五六年底，他们又利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的机会，企图劫持达赖喇嘛，不让他返回西藏，同时阴谋在拉萨发动叛乱。

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中央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些反叛分子，中央并没有直接出面处理，而只是责成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制止和惩处，并且再三申明，只要他们改过自新，仍可不予既往。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对于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竟然无动于衷。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西藏各地疯狂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的群众，扩大叛乱队伍，到处截击汽车，破坏公路，杀戮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终于在今年三月十日在拉萨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并且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长期以来，麇集在印度噶伦堡，勾结帝国主义特务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进行罪恶活动的西藏叛乱分子，在这时候，也更加疯狂地活动起来，把噶伦堡作为指挥叛乱的中心。与此同时，印

度的一切扩张主义分子大肆进行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叫嚣什么“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中国政府平定叛乱是“侵略行动”。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这种一唱一和、里应外合，暴露了这次的叛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策动的。他们所策动的这次叛乱，同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及其他民族国家所策动的破坏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是什么母子关系，那么，西藏的一小撮认贼作父的叛国分子的确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亲骨肉，而且他们都是从英帝国主义一脉相传下来的。在西藏叛乱平息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如丧考妣，两行眼泪流个不停，这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嗎！

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发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說什么“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願望”，說什么“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活动的”，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信口胡說。从十三世紀以来，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甚至达賴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都是由历代的北京朝廷陸續規定的。現在的十四世达賴喇嘛·丹增嘉錯在一九四〇年“坐床”，也是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派人到拉薩去主持的。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事实。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是由英帝国主义者和他在西藏的走狗叫嚣出来的。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額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饒嘉錯、阿旺嘉錯等代表，根据丰富

的历史事实，又正詞严地駁斥了这种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謬論。

英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西藏已将近一个世紀。一八八六至一八八八年英軍第一次向西藏边境侵略，占去了哲孟雄地方(錫金)。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又向西藏发动了大規模的武装侵略，攻陷了拉薩，从腐敗的清朝政府取得了在西藏的各項特权。西藏人民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抵抗，使英帝国主义者感到单靠軍事侵略不能达到奴役西藏人民的目的，在一九〇四年以后，英帝国主义者对西藏的侵略就轉而采取了更为阴险、更为恶毒的办法。他們标榜“帮助”西藏民族“独立”，以迷惑西藏人民，轉移西藏人民的斗争目标，企图使他們由反对帝国主义轉而反对祖国。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英帝国主义就在西藏大农奴主当中物色了一批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敗类，把他們扶植起来，攫取西藏統治地位，执行英帝国主义者交給他們的任务。这样，早在二十世紀初叶，英帝国主义者就在西藏内部培植了一批代理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帝国主义积极插手侵略西藏。一九四七年以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繼承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干涉和分裂政策。从此，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多年培植起来的一批走狗，就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三重奴才。这一批奴才，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西藏大农奴主的利益。他們所以死心塌地甘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走狗，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同残酷剝削西藏人民的反革命階級利益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讓我們看一看这次組織

西藏叛乱的一些首恶分子的来历，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索康·旺清格勒，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他家几代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从小就在英帝国主义者办的英文学校讀書，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一九四一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經派他向英帝国主义購買軍火。一九四七年，他和另一个噶伦拉魯屠杀了西藏的爱国分子热振呼图克图。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前逃亡印度，一九五二年又回到西藏，执行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交給他的破坏祖国統一的反动任务。索康·旺清格勒的父亲，就是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来的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前任过“外交局长”，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有密切的联系。索康·旺清格勒的弟弟索康·拉旺多杰，在印度大吉岭英文学校和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訓練，一九四七年以“西藏商务代表团”团员身分去过美国和英国，西藏解放后一直住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

赤江·罗桑益西，一般称“赤江活佛”，他出身于西藏大贵族凱墨家中，同时又是一个大买办，在西藏买办商业机构喜馬公司中有大量股金。他是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前藏王大札的亲信。西藏和平解放前，曾經到印度“游历”，勾結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西藏和平解放后，一貫在幕后策划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是西藏叛国集团的重要“謀士”之一。一九五五年他随达賴喇嘛从北京回西藏路过四川藏族地区的时候，到处点火，煽动所謂康巴人进行叛乱。

帕拉·土登为登(僧官)，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火卓尼

(达赖喇嘛的副官长)。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前藏王大札的亲信爪牙。解放以前，他在自己的家乡江孜与印度驻军有密切联系。他是一九五二年伪“人民会议”反革命组织的策谋人之一。他弟弟帕拉·多吉才旦也在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曾经担任古松代本（达赖喇嘛警卫团团团长），是这次叛乱的骨干。

宇妥·札西顿珠，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理噶伦。他曾在印度受过英帝国主义的军事训练。一九四八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帝国主义订购军火。一九五〇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经任命他为赴英“亲善使团”团长。西藏解放后，他往来于印度噶伦堡和拉萨之间进行叛国活动。

鲁康娃·泽旺饶登，是西藏和平解放前的代理藏王，是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忠实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后，他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命令，组织伪“人民会议”，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撤职后，逃亡印度的噶伦堡，成为流亡在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的头目。这次西藏武装叛乱发生后，他曾率领所谓“西藏代表团”向印度政府请愿，他们在给尼赫鲁总理的“呼吁书”中奴颜婢膝地说“跪在你的面前”祈求帮助。

仔本夏格巴，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全藏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等事务的重要官员。他曾留学英国，是经过英帝国主义者长期培养的一名忠实走狗。一九四八年，西藏地方政府派他担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国和英国活动，要求美国的“援助”。一九五〇年，他又被任为“西藏亲善使团”团长，准备再去美、英活动，要求英、美、印度、尼泊尔出

面干涉，阻止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後，他一直住在噶倫堡與嘉樂頓珠、阿樂群則等反動分子結合在一起，進行叛國活動。

這一群由英帝國主義培養起來的走狗，是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在西藏的政治上的代理人，同時又是外國侵略者在經濟上掠奪西藏的大買辦。他們壟斷西藏地方和國外的貿易，英帝國主義以及它的繼承者通過他們榨取西藏工業原料（如羊毛、礪砂、皮張、鹿茸、麝香、藥材等），傾銷剩餘生產品（布匹、毛織品、煙草、糖、五金等等），致使西藏市場在解放前完全由外貨占領。

這一批外國侵略者的忠實走狗，都出身於西藏的大農奴主家庭。他們每家占有的農奴，多的一萬人以上，最少也有一千多人。他們每家從農奴身上壓榨來的地租，多的一年達到三萬多克（一克約合二十五市斤），最少的也有兩三千克。他們為了永世保存西藏野蠻落后的農奴制度，需要帝國主義作他們的“靠山”；而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為了奴役西藏人民，為了阻止西藏人民的覺醒，也就盡力維護西藏的農奴制度，盡力維護這批賣國賊對西藏人民的殘酷統治。

西藏的農奴制度，比歐洲中世紀的社會制度還更野蠻、更黑暗、更反動。在這種殘酷的剝削制度下，西藏的全部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都由貴族、寺院和地方政府所占有。西藏貴族總共二、三百家，大農奴主有二十多家，而最大的只有七、八家。政府占有的土地可以分封給貴族和寺院，貴族和寺院占有的土地可以互相贈送、布施、抵押，但不能買賣。

西藏的农奴主就是依靠这些土地的占有对西藏的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拿出很少的土地，作为给农奴的份地，使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每年要以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进行无偿劳役。农奴主只拿出种子，至于耕牛、农具、劳动力等等都由农奴负担，从春耕、夏耘一直到秋收、冬藏，完全由农奴承担。农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的时候还要自带伙食。农奴的劳动，一般都是在贵族的管家监督和鞭打下进行的。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如果逃亡被抓回来，就要受很重的处罚，甚至被挖眼、割鼻或砍去手脚。农奴生下子女，贵族立即登记在账簿上，当做财产看待。贵族为了镇压农奴反抗，在很多的庄园内都设有监狱和刑具。贵族可以将农奴连同庄园一起赠送、抵押或者布施给别人，还可以把农奴作为陪嫁的财产。

所有农奴还要担负贵族、寺院和西藏地方政府各种沉重的差役。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来往，都要由沿途农奴无偿供给乘马和住宿，要送牛羊肉、酥油、豌豆、糌粑等礼品，并且要派年轻女子侍候。地方政府的军粮调拨、物资运输，都要由农奴派出牛马和人力无偿转运。地方政府的房屋，也由农奴无偿建设和修补。贵族和寺院的农奴除了担任地方政府的差役之外，还要担负贵族和寺院的各种差役，如修理房屋、运送租粮和货物，以及背水、砍柴、扫地、饲养马匹等等家务劳动。因此，农奴剩下来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的时间就非常少了，他们的份地很多都荒蕪了。

农奴为了生存下去，常常只好靠借债过活。据在拉萨以北的朗塘、卡则、林周、旁多等四个宗（相当于县）的调查，

旁多有一百六十六戶，全部負債；林周二百二十七戶，有二百一十七戶負債；卡則二百一十五戶，有一百八十五戶負債；朗塘五十戶，有四十戶負債。負債戶一般占戶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這些負債戶中負債一萬克糧食以上的十二戶，五千克以上的十四戶，一千克以上的一百五十九戶，五百克以上的一百零六戶，一百克以上的二百六十六戶。這些農奴的債務，都是上輩遺留下來，據說有的已經有一百二十年，有的已經有三輩的歷史。

原西藏地方政府就是農奴主專政的工具。農奴不但根本不能參與政治，而且不能與貴族平起平坐，不能與貴族通婚，甚至服裝樣式、說話用的許多詞彙，也是不能和貴族相同的。在宗教界，出身於農奴和牧民的廣大貧苦喇嘛也不能參與政治，也受着宗教上層的壓迫和剝削。

對於這樣一種野蠻、反動、黑暗的農奴制度，全世界一切進步人類都認為應該改革，只有帝國主義、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和西藏反動集團才想要把它千年萬代地保留下去，讓西藏勞動人民子子孫孫永遠過牛馬的生活。當然，這只是一種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夢想。

實行社會改革，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历史規律。但由於各個民族具體條件不同，社會改革的時間、步驟和方式，是可以不一樣的。早在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簽訂的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對於西藏地方應該進行社會改革，就已經採取了肯定的態度。但是根據西藏各方面的實際情況，為了使原西藏地方

政府和上层人士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中央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慢一些进行，并且可以由人民和上层人士经过民主协商去和平地解决。一九五六年，中央又根据当时的西藏情况，宣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西藏可以不进行社会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决定。对于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宗教信仰的基本政策，更是作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一贯地坚决地执行协议和中央的上述规定。西藏的农奴制度原封未动，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照旧受到尊重，不论什么教派的喇嘛寺院一律受到保护，他们的收入没有作任何变更，他们的宗教活动照旧进行。所有这些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但是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想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胡说什么这次叛乱是由于中央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无非是要掩盖叛乱分子背叛祖国、出卖西藏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掩盖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侵略西藏、干涉我国内政的可耻阴谋。

与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叛国集团的愿望相反，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叛乱的平息，促进了祖国的统一，促进了西藏人民的新生。他们企图用武装叛乱来堵塞在西藏实现社会改革的道路，堵塞在西藏实现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的道路，但是结果却激起了西藏广大

人民的义愤，使西藏劳动人民被压抑已久的对于实行民主改革的愿望，迅速地昂扬起来，在中上层人士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而叛乱的平息，原西藏地方反动政府的被解散，也为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扫清了道路，这就将导致西藏民主改革的提前实现，使西藏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民主的地方自治。西藏今后的民主改革将按照西藏人民的意志，照顾西藏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办法，逐步进行。在改革中和改革后，一切爱护祖国统一的贵族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包括赞成改革的进步人士和经过说服可以同意改革的中间人士，都将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受到妥善的安排。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农奴制度的束缚，才使它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使绝大多数的西藏人民陷于极端黑暗的地狱般的生活。现在，西藏大农奴主横行不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藏人民摆脱农奴制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了。毫无疑问，粉碎了这些套在西藏人民身上的重重枷锁以后，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在西藏高原上建设起人间的天堂，西藏民族一定会同国内各兄弟民族一样，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和生活幸福的先进民族。一个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前途，已经展现在西藏民族的面前。一切爱国的进步的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美好的前途前进！

(原载“红旗”1959年第9期)



四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人民日报”編輯部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一場叛乱战争，已經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們的可耻的失败，在西藏絕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現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決議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繼續。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就是說，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沒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阶级将采取贖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經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現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輿論正在对西藏問題大談特談，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們認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分光

榮，讓全世界注意他們，讓他們在全世界的議論中得到教育，得到鍛煉。有些外國人說：西藏的少數反動分子的叛亂是“革命”，是“民族主義”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他們應該獲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獨立”；而人民解放軍在藏族人民的積極支持下對於叛亂的平定，則是“武裝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希特勒主義”。這樣說的人是西方帝國主義者，是各國的反動派，例如亞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吳庭艷和蔣介石（但是他並不贊成西藏獨立，而要求西藏歸順台灣）。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的一般政治態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問題上卻跟帝國主義站在一邊，例如印度的某些資產階級分子。所有上述的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數，在本國也是少數，但是他們控制着相當大量的宣傳機器，一時顯得頗為囂張。世界上更多的人說，西藏的叛亂是反動的，平定叛亂是正義的。社會主義各國人民一致支持中國人民對叛亂分子的鬥爭。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站在中國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數。他們包括各國的勞動人民，主張正義和進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對外國侵略外國干涉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民族資產階級懂得，贊成外國干涉西藏，就等於贊成外國干涉印度尼西亞、錫蘭、柬埔寨、尼泊爾、伊拉克、古巴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內政，等於贊成侵犯這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正義的聲音暫時沒有那批反中國的宣傳機器所造成的喧聲高。有些人感覺難過：好端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好端端的中印

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亂，豈不更好！他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出，西藏叛亂既然發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这次叛亂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將最終結束外國干涉西藏的歷史，這對於中印友好的真正鞏固也是完全必要的。總之，對於這種不同議論，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國人民應該認真研究，得到教訓，而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那些對西藏問題大嚷特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人民，也將會加以研究，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教訓。

我們現在想談談尼赫魯先生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本報編輯部按：在我們寫好這篇評論以後，我們讀到了尼赫魯總理五月四日在印度聯邦院的講話。這篇講話的主要論點並沒有超出四月二十七日講話的範圍。所以，我們沒有對這篇評論作任何的修改和補充。）

尼赫魯先生從今年三月十七日到四月底，在議會講西藏問題，這是第七次了。尼赫魯先生曾經多次表示同情所謂“西藏人的自治願望”，反對中國的所謂“武裝干涉”。在四月二十七日，他講的話比較更有系統，本報已經在四月三十日全文發表過了。為了讀者的方便，我們現在把他的話再引出一段，這段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他對於西藏叛亂和印度作用的看法的一個提要：

“情況無疑是困難的。一方面，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迅速前進的社會；而另一方面，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沒有改變的、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很大，看來很難有任何會合點。與此同時，某種形式的改變

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质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入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去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

尼赫鲁所谓西藏的“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

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没有说明。但是，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资料——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都属于三种领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牧民都没有自己的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领地一部分属于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负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领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负。其余的领地是农奴主的所谓“自营地”。在这种领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领主只给一小块（约占领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给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领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剥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维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贷。大批农奴所欠的债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经欠了几百年的债。农奴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没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须由领主准假。

西藏的贵族是世袭的。全西藏现在有贵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财产多少而定。大贵族约占贵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们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成千上万个

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这些大贵族手中。贵族和农奴等级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见了贵族要回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讲话也要有一定的讲法，不许讲错。贵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认为违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甚至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统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贷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剥削，比官家和贵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剥削。寺院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农奴出身的贫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剥削者。寺院内也设有各种刑具和牢狱，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残酷的程度跟其他农奴主没有两样。

大致说来，贵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败现象和内部斗争。在达赖喇嘛周围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员中，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赖喇嘛，并不是象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经常把达赖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甚至

把达赖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们知道，一八五五年，达赖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达拉宫暴亡；随后，一八七五年，达赖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暴亡。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者倾軋异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残酷了。一九二三年，班禅九世被迫终身逃亡内地；一九四七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并勒毙狱中；同年，现在穆索里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赖喇嘛而毒死；一九五〇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统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经济衰敝，文化落后，连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丝毫也不“温和”，丝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試問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鬧的所謂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們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誰呢？你們所宣傳的西藏的自治或“獨立”是誰的自治或獨立呢？你們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亂的失敗是誰的失敗呢？看起來，很多所謂“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們所同情的並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壓迫者、剝削者、殘殺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腦。在西藏的大農奴主剝出農奴的眼睛和心臟來的時候，這些同情專家不覺得是悲劇，不向這些農奴主要求溫和和人道。在這些大農奴主向駐守在自己國土上的人民解放軍舉行武力進

攻的时候，在他們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們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同情家們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們要求温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军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豺狼由防御轉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說，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叛乱失敗而最后遭遇着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象潮水冲破了閘門一样地泛滥起来了。由此可见，进行这种叫喊的人們，除了有一些是出于誤会以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梅特涅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鮮李承晚、南越吳庭艳、中国蔣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我們感到惊异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魯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許多肮脏人物有重要的矛盾，懂得他們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魯自己的阴谋詭計，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謂“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讓他們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們現在被迫在自己的評論中同尼赫魯先生有所爭辯，这是我們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們來說，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

于社会进步，也曾經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在獄中所写的“自传”一書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现很多誤解和偏見(他自己也說，他是“典型的资产階級”，带着在资产階級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見”)，但是他仍然承認，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說：“經濟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階級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弃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階級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統治的特权階級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沒有什么理由說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魯在这里說得很对。但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調子！他或者是完全抛弃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見解，或者是实际上沒有了解他所曾以为了解过的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現在責备我們沒有能够感化統治西藏的特权階級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階級分析作为“頗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笔勾消，把极端对立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階級，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魯的这个企图是我們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階級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問題，更談不到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采取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絕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坚决反对改革的人。在

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万人。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們已經說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騙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军队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以为整个西藏上层阶级都叛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赞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阶级也必须分别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們所一向坚持的政策。如果說，上面說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絕大多数人，他們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魯在討論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認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說来，他不但沒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剝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极大多数被剝削者和极少数剝削者混为一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認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負責，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說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錯誤。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魯所討論的問題的當事人，我們認為，指出这个錯誤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魯的邏輯，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許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許的。大家記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

本上也沒有脫離封建社會的範圍。這個社會也是一向被稱為停滯不前的、沒有變化的、與世隔絕的社會。有些人也曾經譏笑我們是從陳腐的、過時的、極端簡單化的和完全不合國情的外來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斷言我們的改革運動將受到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們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國，是聽命於莫斯科的所謂“赤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現在歷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確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有對於共產主義者的種種攻擊和誹謗，一概都徹底地破產了。停滯不前的、沒有變化的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一變而為生氣勃勃、迅速前進的中國，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過去的停滯不前，不過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受到落后的生產關係的束縛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真正代表着民族的利益和祖國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稱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儘管也曾暫時迷惑過一部分群眾，却真正被證明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我們相信，中國歷史的這個結論，尼赫魯總理也是不至於反對的。但是按照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邏輯，只要他的同情不僅僅限於“西藏人民”，而擴大到整個“中國人民”，那麼，整個中國革命也就要變成為令人百倍難過的空前的大“悲劇”了。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的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比西藏的兩萬左右叛匪多得多，說他們不止是“上層反動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戰爭的規模也大得多，總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應該強烈得多。但是，據我們所知，尼赫魯總理在同情整個中國的時候，並沒有同情於漢族的“大農奴主”；而在同情

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蒋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魯先生可能說我們不公正，因为他所講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跟汉人是不同的。这就是說，汉人在西藏人中間領導革命，將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礙。西藏人跟汉人不同，千真万确。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維吾尔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鮮族人，以及中国的其他許多少数民族，也都跟汉人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政府面前，存在着国内的少数民族問題。我們是十分謹慎地对待这个問題的。我們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培养了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并且在汉族人民中，特别是在汉族干部、共产党的汉族党员和人民解放軍的汉族官兵中，認真地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教育。我們采取了資本主义世界上沒有先例的办法，在汉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說服汉人，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例如內蒙古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西藏，为了争取西藏上层分子的合作，我們用了特別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時間里，一直保存着原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軍隊甚至它的貨幣，一直說服西藏人民暂时不要进行他們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象所謂达賴喇嘛声明所說，不給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权利，那么，那些叛国有据的反动分子早就会被逮捕惩处，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会拖延到現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那些反动分子采取了如此仁至义尽的态度，甚至在拉薩叛乱爆发以后，甚至在知道达賴

喇嘛已經被劫出拉薩以后，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区的部队还是一直等到叛匪向軍区直接发动了武装攻击的七小时以后，才开始举行还击。很明显，到了这一步，反动分子已經把和平解决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坚决討伐和平定叛乱以外，任何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可能了。人民解放軍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薩地区的叛乱，如果它願意先下手，当然早就可以把罗布林卡包围起来，使叛匪无法劫走达賴喇嘛。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炮弹打向宮殿、落入池塘的童話。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面对着这种严重局面，始終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針，正是說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民族問題始終是很慎重的，对于爭取西藏上层分子尤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政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階級才能認真执行，資产階級或者其他剝削階級就是想要这样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問題上，根本的关键仍然是階級分析的方法問題。尼赫魯先生希望我們“爭取他們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魯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間接地指責我們过去和現在沒有这样作。事实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階級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問題。民族之間的糾紛和隔閡，基本上是剝削階級造成的，剝削階級也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現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階級的正确領導之下，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糾紛和隔閡，結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誼。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蒙古統治者和滿洲統治者压迫过汉人、維吾尔人和西藏人，

而汉族統治者也压迫过蒙古人、滿洲人、維吾尔人和西藏人。在无产階級領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占人口絕大多数并且是革命主力的汉人，現在仍然需要派這一部分人員到內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現在不是去压迫和剝削那里的少数民族，而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在一起，帮助那里的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压迫者、剝削者手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就是說，建立使各少数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繁荣昌盛起来的基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汉族人員，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不但沒有騎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头上摆威风，相反，他們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一道，做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务員。他們常常不避艱險，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为他們的权利和幸福而斗争。这样，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一切爱国的、贊成改革的上中层分子，就跟汉族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致，象汉族人民一样地推翻了他們本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的反动統治。这样，各民族的糾紛和隔閡的根源就消灭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获得了真正巩固的基础。这个过程，在內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广西，都已經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领导改革的人員都竭力团結各少数民族的贊成改革的各阶层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間和改革以后都跟他們保持密切的合作。誠然，不可能沒有斗争，而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族地区还曾經发生了武装叛乱。但是，如我們在別的地方已經指出过的，这些藏族地区的叛乱，正是由西藏的反动分子利用他們

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动起来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大农奴主的統治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沒有受到变动，他們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揮保卫农奴制度的旧藏軍、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并且繼續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結。因为这样，在那里不但沒有进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的叛乱。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軍进駐西藏以来，西藏人民仍然是屢次三番地热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們担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大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义者諸君須知，西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們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們、鞭打他們、挖出他們的眼睛的魔鬼是他們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們相信那些热誠地、和藹地帮助他們劳动和治病、不取他們一針一綫的解放軍战士是他們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乱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沟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轉瞬之間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軍收繳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繳了叛匪的枪枝，收繳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这三样东西把他們压迫得太惨了！他們給解放軍自动带路，自动报告匪情，自动协助捕捉残匪，搜查枪枝。只是在拉薩人民法院一处，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繳来的枪几百枝。在山南，許多村庄的居民听说解放軍要来，馬上聚集起来向战士献哈达，献鮮紅的桃花和嫩綠的柳枝，同时向解放軍哭訴叛匪奸淫擄掠

杀人放火的罪行，要求解放军一定要替他们报仇。貢噶宗的叛匪曾在公路上挖了四条横沟阻挡解放军前进，但是叛匪一走，当地居民马上把壕沟填平。解放军一到林芝，当地的群众马上自动组成一支骡马运输队，帮助解放军运送弹药粮草，并且跟随解放军一道追剿残匪。这种感动人的例子是说不完的。叛乱一平，广大群众很快协助人民政府恢复秩序，很快在人民政府协助下转入生产。山南的春耕虽然因为叛匪骚扰推迟了半个月，但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播种期并没有延长。那里成群的人正在地里送粪、播种，整修渠道，并且唱出了多久没有唱过的欢乐的歌声。农民们纷纷询问什么时候分配土地。在根据群众要求，宣布叛乱头目的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以后，劫持达赖喇嘛的主犯之一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开苏溪卡的农奴，马上自动把所有劳动力组织成为劳动互助小组，共同耕种所有的土地，争取丰收。很明显，西藏的农民们相信，他们在西藏的土地上翻身作主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很抱歉，我们在这里的话说得太长了一点……但是，关心西藏的一切善良的人们请看，这一切跟清朝以来的旧式中国军队进驻西藏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不同！跟英国侵略军由印度攻入拉萨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相反！试问：怎么能够把人民解放军跟西藏人民在一起平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叛匪的正义行动，描写成为民族镇压和民族侵略呢？

尼赫鲁先生断言，汉族社会和藏族社会两者之间很难有任何会合点，冲破双方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不是没有作，就是作了没有成功。对于西藏的劳动人民，这个问

題現在已經由事實作了答復，而且將來還會作出更大量更生動的答復。就是對於藏族的上層分子，他們中間許多人的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礙，也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變化。達賴喇嘛在被劫持的情況下完全自發地、秘密地寫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和班禪額爾德尼、阿沛·阿旺晉美、喜饒嘉錯、阿旺嘉錯、黃正清等人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這一方面的顯著證明的一部分。站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方面的，有大批西藏的愛國的上中層分子。拉薩的中小學學生，有大量的上中層分子的子女，叛亂一結束就來上學，而且人數比叛亂以前大大增加。可見，斷言叛亂是民族性的“革命”，叛亂的平定是民族性的“悲劇”，是沒有根據的。

有一些對中國並無惡意的印度朋友，由於受了長時間的有偏見的宣傳的影響，由於他們沒有直接看見西藏社會生活和人民解放軍活動的真相，而他們的報紙又很少發表中國方面的完整的資料，一時誤解中國的立場和政策，這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實勝於雄辯，水落自然石出。我們完全相信，那些暫時有所誤解的、對於我們現在所說的話仍然將信將疑的印度朋友們，終會得出客觀的結論來的。我們希望，尼赫魯先生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當然，尼赫魯先生有很大的自信，他有一套對於西藏問題的獨立的見解。他傾向於假定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勢力集團是一群純潔的羔羊，甚至在他們向我們發動了進攻以後，他仍然認為是我們不對。我們不能要求我們的外國朋友對於中國的事情一定要跟我們一樣看，我們更不能要求尼赫魯先生一定要改變他

的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观点。在尼赫鲁先生的思想中，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我们不打算讨论应该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固然可以进行友好的辩论，也完全可以不辩论。大家家里的事情都很多，各人自扫门前雪就够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尼赫鲁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说得好：“要把一个国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批印度人，其中不幸也有尼赫鲁先生，一定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主张办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和邻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是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吗？你的办法如果在印度行得好，那么我们再向你学习也还不迟。究竟有什么必要象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是我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尼赫鲁总理否认印度曾经干涉西藏。他追述了印度独立和分治前后的情况，证明印度对西藏从来“没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我们承认，尼赫鲁的话，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合乎实际的，这就是说：印度政府不打算吞并西藏，或者派遣武力来干涉西藏的事务。印度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享有对于西藏的主权。印度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同中国签订了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且随后从西藏撤出了自己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设施。这些都是中国人民认为满意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的

干涉，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要說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西藏过去和現在根本沒有任何方式的干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們記得，本报也公布过，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政府命令自己的部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印度政府就曾經經由外交途径进行干涉。当时，中国政府在下令进军西藏的同时，曾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談判。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內政問題。但是，印度政府却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一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說“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被認為是可悲叹的”，是“沒有理由的”，說这对印度政府“是最为惊异和遺憾的”。照会中还提出，中国军队进驻自己的領土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在联合国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問題上“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并将使那些反对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国家获得有力的支持”；“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見”；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就难于与此同时进行”；将不“符合中国或和平的利益”；“已經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已經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誼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对此，中国政府在答复印度政府的照会中曾經指出，人民解放軍进军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西藏問題是中国的內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許的。这个問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竟然利用联

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威胁中国不得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罢了。在中国政府一再坚决地表示了这种严正的态度之后，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在昌都地区取得了歼灭企图阻挡进军西藏的藏军主力的重大胜利以后，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团，才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到达北京。经过谈判，终于在同年五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重提这一段经过，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怎么能说，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西藏呢？

不幸的是，这种干涉仍在以某种形式继续着。这种干涉发生在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之后，就不能不令人更为遗憾了。就以尼赫鲁总理本人来说，他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发表过的声明和谈话，其中虽有不少友好的表示，但是有些话我们觉得不能认为是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例如，他说，“北京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四月十三日）。“我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将能维持并且享受他们的自治，而不受其他人的压迫和镇压”（四月十四日）。试问：把中国对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发生的叛乱实行平定称为“武装干涉”，称为“压迫和镇压”他们的“自治”，并且说什么没有遵守“对印度提出的保证”，这一切怎么能说不是干涉呢？印度政府坚持说达赖喇嘛不是被叛乱分子劫持的，而是叛乱分子的领袖，既然如此，印度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和尼赫鲁总理本人到穆索里的访问，岂不意味着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叛乱领

袖的欢迎和会商么？由于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明确执行不干涉的政策，人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甘地夫人和国大党总書記克里帕拉尼夫人都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自治国家”，包括国大党在內的印度多数政党組織的“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問題提交联合国，印度的报刊公然污蔑中国政府“采取强盜行径和实行帝国主义”，污辱中国国家元首是“可恶的雪人”，并且要求召开有所謂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會議式的會議来解决純屬中国內政的西藏問題。西藏叛乱发生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就展开了一个誹謗中国的运动，規模之大，使人想起美国政界和报界对于古巴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干涉。試問，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內政采取这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难道能說是符合五項原則嗎？

尼赫魯总理說，印度对于西藏問題的反应实質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本能的，它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我們了解，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西藏人民具有亲密感情。不但如此，印度人民对于整个中国人民也具有亲密感情。周恩来总理訪問印度的时候，到处听到“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热烈口号，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对于西藏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被用来作为一些政界人士損害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干涉中国內政的理由呢？这种邏輯具有一种显然的危險，因为，如果这样的邏輯是可以成立的話，那末，在西藏走上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强盛的道路之后，

是不是也可以用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为理由，組織什么“支援阿薩姆邦人民委员会”、什么“北方邦事务委员会”，来干涉印度的阿薩姆邦或者北方邦的事务呢？西藏自治区政府以及整个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把对于阿薩姆邦人民或者北方邦人民的深切同情宣布为一項基本政策，并且根据这种政策对那些邦的事务指手划脚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給予印度某种保証，那么，印度政府不是也可以干脆用对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对全部內政給予印度某种保証嗎？同样，中国政府不是也可以用对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內政給予中国某种保証嗎？那还有什么和平共处，什么五項原則可言呢？世界不是就陷在互相干涉的混乱中嗎？我們相信，我們的印度朋友一定跟我們一样，不会欢迎而且也无法容忍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

把印度方面前后两次对于中国西藏的干涉联系起来，人們不难看出，印度政府虽然不打算占領西藏，或者使西藏正式独立，但是的确力图阻挠中国在自己的領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权。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在这一方面繼承过去英国政府的传统：只承認中国对西藏的所謂“宗主权”，有如印度对于不丹和錫金的“宗主权”。他們所說的西藏“自治”，不同于中国宪法上所明文規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內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是一种半独立状态。不錯，西藏不是一个省，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它比省具有宪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更多的权限，但

是它决不是什么保护国——既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也不是印度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什么缓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跟对于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一样，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是丝毫不容任何外国或者联合国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问题，都只能由中国解决，在中国解决，而不能在任何外国去解决。西藏的任何半独立状态不利于西藏人民，不利于全中国人民，不利于印度人民，不利于中印友好和亚洲和平，而仅仅有利于西藏的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和支持这伙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的外国干涉者，仅仅有利于那些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制造纠纷的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阴谋家。中印两国是两个爱好和平并且有悠久友谊的国家，我们两国有一千种一万种理由要和睦相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而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要互相冲突，要设什么缓冲地区；如果硬要设，那就恰恰是要制造本来不存在的真正可悲叹的冲突了。鉴于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鉴于印度一些并非不负责的人士的言论，我们认为，彻底澄清这一点，对于巩固中印友谊是十分必要的。尼赫鲁总理在四月二十七日讲话中提及五项原则的时候，只说到“互相尊重”（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没有说“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是五项原则的原话，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我们希望，这不过是一种疏忽。

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带有时代的特征。印度是一个摆脱英帝国主

义殖民統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它要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民族經濟，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的大资产階級跟帝国主义又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对外国資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而且，大资产階級的階級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这就使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以尼赫魯总理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問題上，在执行对中国友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不参加美帝国主义的軍事集团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并且繼續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资产階級却繼承着而且企图繼續保持英国殖民統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遗产。当然，伟大的印度人民对于印度资产階級的这种两面性不負任何責任。我們也相信，不但印度人民，而且印度政府中的一切有远見的明智的人士，都承認印度的出路是在进步方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們跟他們一样地認為，一个不久以前才获得独立、而現在也还受着帝国主义干涉者威胁的国家的当局，竟然干涉自己邻国的事务，这是現代国际政治中一种令人惋惜的現象。

我們跟尼赫魯先生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意見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大概是沒有分歧的，就是中国並沒有干涉印度的內政。中国人民只是在印度方面发出了大量的污蔑性的言論之后才开始回击的。尼赫魯总理在四月二十七日的講

話中正当地譴責了某些印度人的旨在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言行。可惜，他随即集中力量攻击中国的反干涉言論。他說，“中国的負責人物对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是“不顧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語言”。但是，中国指責印度方面的干涉是有事实根据的，已如上述。中国輿論界怀疑所謂达賴喇嘛声明的真实性，也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个声明中的大量漏洞和冒名頂替的痕迹，現在仍然是客观地存在着。很明显，那些把达賴喇嘛劫到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跟那些长期以来聚集在噶倫堡进行叛国活动的西藏反动分子在一起，正在竭力利用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来堵塞达賴喇嘛回到祖国的道路，而这是跟尼赫魯总理多次表示的願望不相符的。

說到重視事实真相和礼节，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对中國所說的很多話，决不能認為合乎事实和礼节。我国人民注意到，尼赫魯总理在这一方面不止一次地起了节制作用，这无疑是有益于中印友好的。但是，我們究竟不能說，在他指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破坏十七条協議、提出所謂中国对印度的“保證”等等的时候，他的話也是合乎事实真相和礼节的。至于說到冷战的語言，那么，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咒罵中国是“新的和凶恶的帝国主义”、“扩张帝国主义”，攻击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是“軍事干涉”，“殖民行动”，“强盜行径”，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冷战的語言”嗎？对于这类“冷战的語言”，我們在一个相当长的時間內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們的报纸几乎守口如瓶。人們記得，直到四月

十八日，周恩来总理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出维护中印友好的热誠呼吁。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所换来的却是对于所謂达賴喇嘛声明的大事宣揚，却是对于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更放肆的攻击。退无可退了，我們不得不起而反击。有人企图用“言論自由”来为印度的反华誹謗运动辯解。但是，他們为什么不想一想，难道中国人就不要言論自由嗎？西藏是我国的領土，西藏問題是我国的内政，外国人尚且可以有所謂本能的反应，我国人民反而会沒有本能的反应嗎？現在，某些外国对于我們的誹謗运动似乎已經趋于低落了，理智正在重占上风。但是，也还有极少数人企图繼續煽风放火。可以正告这些人：你們的反华誹謗运动一天不停，我們的反击就一天不止。你們願意用多长的時間，我們就准备付出多长的時間，而且还准备着你們煽动別的国家来對我們进行围攻，也准备着在你們后面还有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的助威。但是，想用任何压力来干涉中国内政，来挽救西藏大农奴主的穷凶极恶的統治，那是毫无希望的。世界上一切反共反华的人們对于我們越罵得凶，就越能暴露他們的真面目，也就越能教育全世界人民。

如前所說，現在世界上議論西藏問題的人很多，他們的出发点有許多不同。尼赫魯总理跟許多对中国显然怀有惡意的人們不同。他跟我們在西藏問題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对于这一点，我們沒有任何怀疑。我們所以对于尼赫魯总理的指責作这样詳細的答复（当然在文章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了那些對我們显然

怀有恶意的人)，正是因为，我們怀有充分的信念：分歧是可以縮小的，爭論是可以解决的。誠然，爭論是有些尖銳，因为这是我們祖国和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所在。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爭論从本質上能够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益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友好，并且在語言上也能够沒有疏忽了友誼和礼貌。我們完全同意尼赫魯总理的一些語重心长的、对中国人民十分亲切的話。他說，“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緒，这将会是一个悲剧。”中印友好是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基础的，我們的基本利益相同，我們的主要敌人也相同，我們决不会忘記我們的共同利益，而落入我們的共同敌人的圈套。这次的爭論虽然令人遺憾，但是我們坚决相信，它不会造成敌对情緒，它不会动摇我們两国的友誼。尼赫魯总理宣布：印度一点也不愿干涉西藏。我們热烈欢迎这个友好的声明。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爭論就会随之結束。中国从来沒有也永远不会干涉印度。我們还願意郑重地告訴关心印度安全的全体印度爱国者：一个民主的、繁荣的、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員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好的因素，而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对于印度共和国的什么“威胁”。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睦邻政策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我們两国近十一亿人民的友誼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就象喜馬拉雅山的不会动摇一样，那些誹謗者的胡說八道是毫无根据的。在尼赫魯总理一九五四年十

月訪問我國的時候，他曾經說：“中國和印度都是大國，面對着類似的問題，並且都已經堅決地走上前進的道路。這兩個國家彼此了解愈深，那末，不但亞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證。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緊張局勢，要求我們共同為和平而努力。”我們願意兩國人民永遠記住尼赫魯總理在這裡所指出的真理。跟中國人民一樣，偉大的印度人民是一貫珍惜中印兩國的友誼的。我們深信，那些毒化中印關係的謠言，隨着對於事實真相的了解，隨着兩國有關人士的共同努力，必將為印度廣大人民所識破，所拋棄。中印兩國和兩國人民，將在和平建設的事業中繼續友好合作，並將繼續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攜手奮鬥。

五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加强印中友誼的決議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

在过去几年中发展起来的印度和中国之間的亲密友誼，是我們的时代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在維護和平和在亚非国家的复兴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它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和合作的典范。

这种友誼加强了我們两个伟大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且加强了亚非的团結。它是抵御殖民主义和战争势力的自由和世界和平的堡垒。由于印中友誼的发展，帝国主义逐渐陷于孤立，并且被推回去，亚非各国人民的尊严和地位有了提高。潘查希拉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正是由于这种印中友誼和諒解。

然而必須承認，在西藏事件发生之后，这种友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損害和破坏。因此有必要了解这些事件的真正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是一小撮农奴主和頑固派組織的一次叛乱，目的是阻挠一切改革，从而使野蛮的压迫和暴政永远保持下去。他們不想使西藏人民得到現代文明的光明，而使他們仍然陷于落后、奴役和无法形

容的苦难的无底深渊中，这些反动分子在他们的叛乱中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鼓励，甚至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物质帮助。正是在他们的煽动和帮助下，前西藏地方政府才成为一个阴谋的中心，并且滥用了广泛的自治权，并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当局和它的西藏地区地方政府在一九五一年所达成的协议而准备了现在的叛乱。因此，帝国主义者——美巴双边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的煽动者——迫不及待地欢迎西藏叛乱，认为这是执行他们破坏中印友谊和亚非团结的阴谋和侵略性计划的新机会，这是不足为奇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着重地声明，这个叛乱同西藏人民的利益是毫无关系的。这个叛乱的目的只是为内部的一小撮反动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把这样一个叛乱说成是“民族起义”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容易使人误解的。

印度所有爱国者当然将珍视印度同西藏人的文化联系，但是不能通过对农奴主和封建压迫者表示同情来这样做。今天的印度对农奴制和中世纪压迫的势力是不能有任何同情的。印度同西藏人的文化联系只能在开明和进步、在潘查希拉的共同发起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互相尊重和互相了解的前提下发展。

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西藏的事态发展正在被我国的某些人加以歪曲和利用，不仅被用来妨害印中关系，而且还被用来破坏潘查希拉和印度的外交政策。他们公开鼓吹西藏独立，并且鼓动印度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以促进这个目的。他们要求让已经逃离自己的祖国、现在

在印度的叛乱分子有一切自由和机会繼續进行他們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他們还要求允許这次叛乱的煽动者和組織者可以作为西藏政府以我們的国土执行任务和进行他們所謂“爭取独立的斗争”。他們的言論是在进行仇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的同時发表的。

这些势力中最主要的是人民社会党、印度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以及其它潘查希拉和印度外交政策的死对头，包括有名的亲美分子在內。

这些党派現在联合起来进行它們煽动印度反对中国的凶恶运动。它們在制定印度的外交政策中沒有起任何作用。相反，它們一直譏諷和嘲笑尼赫魯总理，并且一貫破坏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

中央执行委员会警告全国提防这些分子的阴險策略，他們对西藏的假装的同情永远隱藏不住他們的別有用心的阴谋。他們不是从对西藏人民的任何热爱和关怀出发的。他們是从他們仇恨共产党人和希望印度的外交政策遭到削弱和破坏的梦想出发的。要注意的是，甚至某些著名的国大党人也同他們携起手来，力图損害他們的領袖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先生所主张的事业。

尼赫魯总理在制訂和指导印度外交政策和建立印中友誼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因此，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在最近几个星期內，他竟有好几次所表示的态度和发表的言論不能符合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及其指导原則潘查希拉，而印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原則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維護并向前发展。

潘查希拉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西藏的事態發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忘記這個基本事實或者縮小其重要意義的任何傾向都只會造成嚴重的糾紛，引起誤解，並削弱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人民注意這個事實：印度政府方面的某些不幸的和不正確的步驟正在被印度外交政策的敵人拚命加以利用，他們希望這個外交政策完全改變。還要注意的是，帝國主義者正在力圖使印中關係進一步惡化，使萬隆精神垮台。無疑，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將在未來的時期內不遺余力地達到這個目的。

中央執行委員會強烈地希望尼赫魯總理和一切奉行和支持印度在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友好的政策的人們堅決反對這種勢力。

委員會認識到政府受到了某些反動方面的非常強大的壓力，這些反動方面仍然夢想西藏是一個在他們影響之下的緩衝國。但是委員會相信，支持印度外交政策的人們將知道如何戰勝這種壓力。

在印度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發生的爭論中有時出現了激烈的言詞。但是委員會認為這是朋友之間的爭論，並且相信，嚴格遵守具有歷史意義的潘查希拉所包含的和平共處原則，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這個爭論。

尼赫魯先生五月八日在人民院的講話中重申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以潘查希拉和不結盟的政策為基礎的，他斷然拒絕了關於改變這種政策的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歡迎這個

声明，認為这是对帝国主义者、他們的盟友和印度外交政策的敌人的打击。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这项決議重新強調两国之間的友好关系。

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一切民族和爱国力量挺身而出，保卫印中友誼和我們的外交政策，这不仅是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是符合全体亚非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今天，鉴于威胁着我国而且事实上是整个亚非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美巴双边軍事协定和其他侵略性阴謀，这就变得更加紧迫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相信最近的事件所造成的損害不久会得到弥补，印中友誼将会越来越巩固，从而有助于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新华社新德里 1959 年 5 月 14 日电)

弥 补 损 害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高 士

西藏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組織的叛乱所遭遇的命运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者的重大失敗。由于束縛西藏經濟和社会生活的反动枷鎖被打破，西藏人民現在能够前进了。叛乱的失敗标志着向西藏的新生迈了一大步，新生的西藏将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享受民主和自治。

反动派在西藏遭到了严重的失敗，但是，假如硬說它的疯狂的冒险沒有产生严重的后果，那是沒有用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也許是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中印关系严重恶化了。許多年来，事实上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帝国主义者一直竭力想在印度和中国之間散播敌对情緒。他們知道，亚洲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間的友誼是亚洲团結的基石，是阻止他們的使亚洲人打亚洲人这个阴谋得逞的最有效的障碍。他們力图破坏这个友誼。

今天他們洋洋得意。他們認為他們已經获得重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活灵活現地反映了他們的这种得意心情。他們的領袖們的談話也表示了这种心情。那些嘲笑印度的和平和不結盟政策的人，那些曾大肆侮辱印度总理的人，今天把印度捧上了天，对印度所采取的“富于政治

家风度”的和“独立”的立場进行了令人作呕的贊揚。

在这方面，巴基斯坦統治者所发表的言論具有不祥的意义。他們由美帝国主义者武装并受他們的唆使，一直在对印度进行神經战。他們对印度的領土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在袭击中使用了美国武器。即便在今天，他們还非法地占領着印度的图克格兰村。他們在克什米尔問題上揚言要进行战争。就在前几天，他們还击落了一架沒有武装的印度飞机。

現在这些老爷們突然开始用新的調子來說話了。巴基斯坦的軍事独裁者阿尤布汗將軍向印度提出了“共同防御”的建議。巴基斯坦駐美大使阿齐茲·艾哈迈德显然是表示他的美国主子的意見，他說：“我冒昧地認為，印度次大陆只有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共同努力才能在領土方面和意識形态方面得到保卫……而巴基斯坦方面是清楚地了解这个次大陆所面临的严酷的生活现实的。它並沒有忘記共同的危險。巴基斯坦願意参加共同防御計劃，如果妨害采取这种共同行动的障碍能够首先排除的話。”

每一个印度人都欢迎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这里所建議的却不是这种关系。所建議的是，印度放弃它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参加罪恶的巴格达条約，同美国的仆从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在領土方面和意識形态方面”保卫它自己。

尼赫魯憤怒地拒絕了这种露骨的建議，这是好的。5月4日他在联邦院講話時說，“我完全贊成解决我們同巴基斯坦的糾紛，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生活。”“但是，当

人們說，‘我們制訂一項共同的防禦政策吧，’我就不明白了。對付誰呢？我們是否要成為巴格達條約、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其他某種聯盟的成員呢？我們不希望制訂一種共同的防禦政策，這種政策幾乎是某種軍事聯盟的另一個說法。我們所奉行的整個政策都是反對這種概念的。”

所有這些話都是值得歡迎的。但是，西藏危機和在印度發生的與它有關的事件在帝國主義集團以及同他們結成同盟的統治集團當中產生了這樣大的希望，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信號。這應該使我們停下來想一想。

因為在我們自己的國家里有這樣一種強大的勢力，他們從不掩飾他們敵視我們的外交政策，一貫反對我們同社會主義世界的國家友好，並且不斷宣傳我們的“天然的朋友”是“西方國家”。所以，這樣做就尤其必要了。屬於這一類的有人民社會黨和印度人民同盟的大多數高級領導人以及尼赫魯自己的黨里的某些主要人物。他們還在壟斷資本家控制的報紙的幫助下，發動了反對中國的宣傳攻擊，並且在“同情”西藏的借口下，公開支持叛亂分子和他們的事業。

處在危險中的問題是嚴重的。但是處在危險中的並不是西藏的前途。

西藏人民，不管帝國主義者和印度的某些人是否喜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將清除許多世紀來累積起來的廢墟，向民主和社會主義邁進。處在危險中的和受到危害的是我們自己的外交政策，亞洲團結的事業，我們跟那些從來沒有干涉過我們的內政的國家的友誼，這些國家在

克什米尔和果阿問題上一貫支持我們，反对威胁我們自己的安全的侵略性軍事条約以及反对殖民統治和种族歧視。

不幸的是，我們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尼赫魯似乎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一点。他似乎認為，印度在整个西藏事件中的行为是无可非議的，是完全符合潘查希拉原則的，一切过失都在中国方面。5月4日他在联邦院的講話中再次重复了这种說法。有必要对这篇講話发表一些意見。

尼赫魯对于中国报纸在評論印度对西藏問題的反应时的“一致”和“类似”感到“驚訝”。这似乎是暗示，这一定是从上面操縱的。但是，事情真是这样令人感到驚訝嗎？在作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克什米尔的問題上，印度各党派和各报纸显示了同样的“一致和类似”，难道这不是事实嗎？西藏叛乱分子公开宣布他們要使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难道这不是事实嗎？那么，尼赫魯为什么要感到如此驚訝呢？

尼赫魯对中国人民和报纸反应的方式表示惊异以后說，“我們的議會这里或議會以外的行事方式在中国沒有得到充分的了解。他們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議會里，在議會以外和在报纸上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不用說，我們是不希望任何人的意見受到压制的。印度的許多政界領袖和一些报纸一貫中伤和誹謗中国政府，这也是事实。但是中国报纸和领导人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严厉地批評过印度。

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于私人、政党和报纸的印度政府，过去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問題采

取这样一种态度。連作为印度政府首脑的尼赫魯在最近时期里发表的几次談話，也只能被認為是十分偏袒叛乱分子的。尼赫魯甚至到現在似乎还没有認識到这一点。

我們只举一个例子。

人們原来希望，尼赫魯会收回他認為西藏叛乱是“民族起义”的說法的。但是他沒有这样做。他借口“即便根据中国的說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和“它牵涉到許多西藏人民”来为这种說法辯解。

根据中国政府所作的估計，大約只有两万人参加或者支持叛乱。这肯定不能証明所謂西藏全体人民起来叛变的說法。但是，且不談这个，尼赫魯一定知道，即使有大批人参加，也不一定使叛乱成为“民族起义”。

反动派往往是能够用宗教的名义来欺騙成千人的。民族起义是人民反对他們的民族压迫者和为了消除真正民族苦难的起义。

印度政府的态度是不是認為，中国人民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达賴喇嘛和喇嘛統治集团是保卫他們的民族自由的“西藏民族”的战士呢？这符合潘查希拉的原則嗎？

如果一个友好国家政府的首脑把我国一个地方的公然表示了脫离印度联邦的目的的武装叛乱說成是“民族起义”，那么我們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难道我們不会提出抗議嗎？难道我們不会認為这是对叛乱分子的直接鼓励嗎？难道我們不会把它叫做对我国內政的干涉嗎？

我們知道，这不是唯一的意見。有几种意見表現出明确的政治傾向和願望想保持西藏作为印度和中国之間的某

种缓冲地区。

尼赫魯对关于扩张主义的指責感到难过。但是据我們所知，这种指責并不是针对尼赫魯或印度政府的。关于扩张主义的指責是针对印度的某些反动分子发出的。人家說，——这样說有充足的理由——印度的某些反动分子鼓吹西藏在自治的幌子下“独立”。这能否認嗎？

其次，有关于达賴喇嘛被劫持的說法。据我們所知，在这个問題上，也沒有人說，达賴喇嘛是违反他的意願被扣留在印度的印度政府的阶下囚。但是，包围他的、勾結帝国主义、想利用达賴喇嘛来反对中国、并且破坏中印友誼的反动分子，甚至在現在还在对他施加压力，要他留在印度以便他們能够繼續搞他們的那套罪恶的把戏，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能的嗎？达賴喇嘛本人在这场肮脏的插曲中担任了什么角色，这还不清楚。他沒有否認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提斯浦尔声明。尼赫魯確認声明是达賴喇嘛的意見。但是，也沒有被否認的是，达賴喇嘛的几封信——尼赫魯一度对它們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是真的。如果达賴喇嘛写了这些信，也发表了这个声明，这肯定不会使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此沒有理由說明：为什么应当那么信賴他的話，为什么应当把他奉为伟大的英雄和宗教伟人，为什么他的声明应当由官方来散发。

但是，我們面前的基本問題并不是达賴喇嘛是否可以信賴的問題。在激烈的爭論中，这方或那方是否說了某些刺耳的話，这也不是基本問題。基本問題是，我們是否不在乎在公認是中国的內政并且必須以中国政府認為是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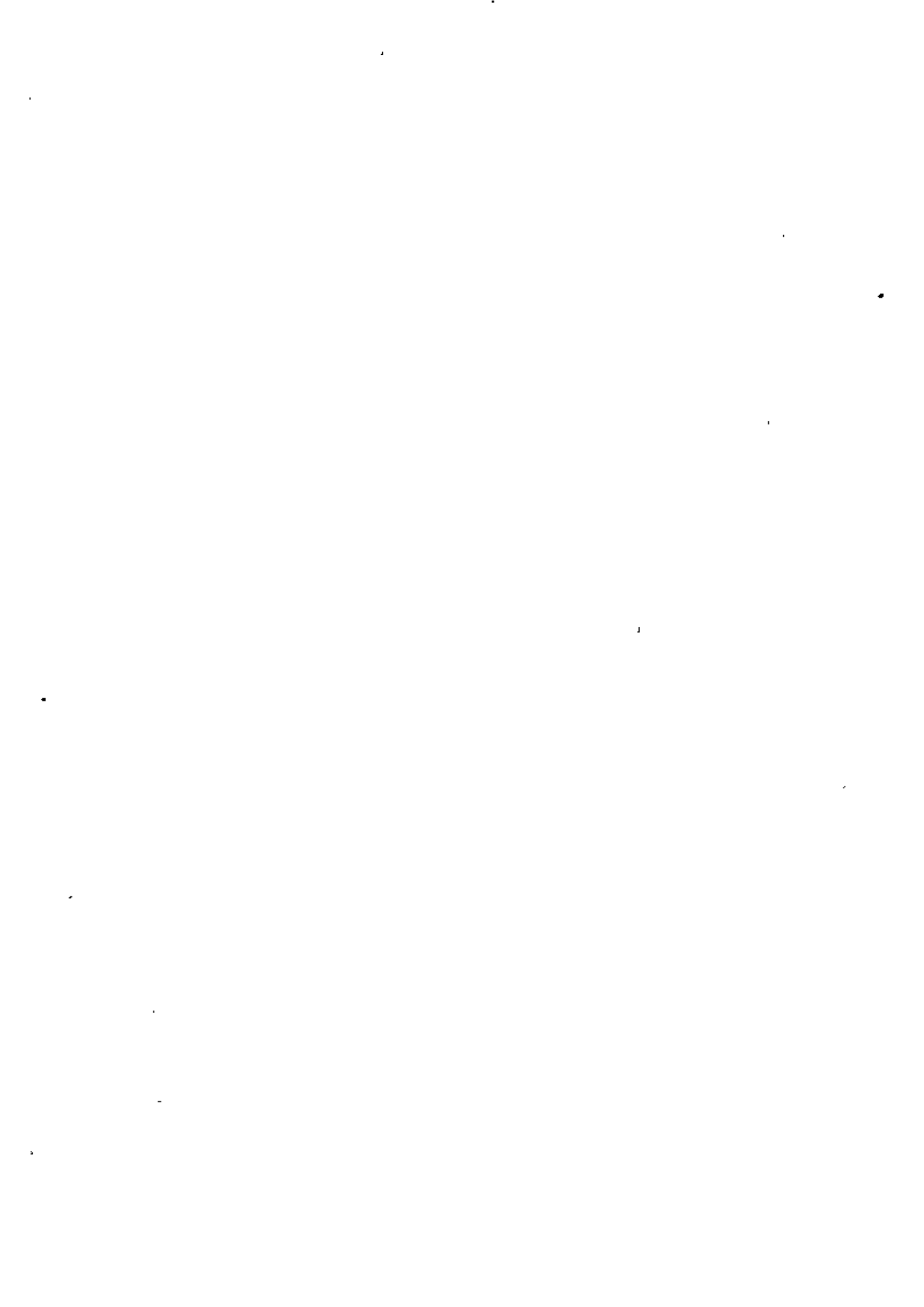
的方式来处理的問題上讓中印关系恶化。

在这个問題上，不可能有两种意見。除了一小撮反对我們外交政策的公然的敌人以外，印度全体人民是珍視印中友誼的。大家也承認，中国在西藏采取的行动决不危及印度的安全，这种行动也不会对印度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響。这應該成为我們的态度、我們的言行的基础。

必須立即采取坚定的步驟来弥补損害。这样做是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整个亚洲的利益的。

(原載1959年5月10日印度“新世紀”周刊，
195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譯載)

六



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发表的 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

据报道，达賴喇嘛在前往他在印度北部的住地穆索里途中，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的英文本是由印度外交部官員散发給报界的。印度新聞处广播的这个声明的英文本的譯文如下：

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一向得到承認的。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願望。在整个历史上，曾經多次表明了这一点。有些时候，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也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活动的。无論如何，在一切时候，甚至在中国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的时候，西藏在管理它的內部事务方面都是自治的。

一九五一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了中国和西藏之間的十七条協議。在那項協議中，接受了中国的宗主权，因为西藏人别无其他办法。但是甚至在这項協議中也規定，西藏将享有充分的自治。虽然对外事务要由中国政府掌管，但是据商定，中国政府将不干涉西藏的宗教和风俗习惯以及它的內部行政。事实上，在中国軍隊占領西藏以后，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內部問題上也是

这样，而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事务行使全权。

一九五六年为西藏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喇嘛任副主任委员，张国华将军任中国政府的代表。实际上，甚至这个机构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曾经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但是中国当局一直进行干涉。到一九五五年年底，斗争已经在康省开始了，这个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变得严重起来。在后来进行的斗争中，中国武装部队摧毁了许多寺院。

许多喇嘛被杀，大批僧人和官员被抓去在中国筑路，对行使宗教自由权的干涉增加了。从一九五九年二月初起，西藏人同中国的关系公开地变得紧张起来。达赖喇嘛在事前一个月曾同意到中国总部看文艺表演，而日期突然规定在三月十日。拉萨人民担心达赖喇嘛可能受到某种伤害，因此大约有一万人聚集在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夏宫，拦阻达赖喇嘛去看演出。

在那以后，人民自己决定组成一支卫队来保护达赖喇嘛。大批西藏人来到拉萨街头，举行示威反对中国人统治西藏。两天以后，数以千计的西藏妇女也举行示威，抗议中国的权力。尽管人民举行了这种示威，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还是竭力维持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并且设法同中国代表进行谈判，研究怎样才能最好地给西藏带来和平并且缓和人民的焦虑。

当这种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为加强拉萨和西藏的中国驻军而派出的增援部队到达了。三月十七日，迫击炮朝

着罗布林卡宮打了两三炮。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

在此以后，顧問們認識到对于达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离开拉薩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

达賴喇嘛願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薩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

达賴喇嘛由于他的人民的忠誠和热情支持，才能够从一条十分艰难的路綫到达这里。

达賴喇嘛所走的这条路綫包括渡过拉薩河和雅魯藏布江，通过山南地区、雅隆谷地和錯那宗，然后才到达丘坦穆附近的印度边境坎齐曼。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达賴喇嘛曾派遣两名使者越过印度西藏边境，要求印度政府允許他进入印度，在那里避难。达賴喇嘛极其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的自发的和热烈的欢迎，以及給予他和他的随行人員的避难权。

印度和西藏有着一千年的宗教、文化和貿易联系，对西藏人來說，印度一向是誕生了佛祖释迦的文明之国。达賴喇嘛对于他在安然到达印度时受到尼赫魯总理和他的印度政府同僚的好心問候深为感动。达賴喇嘛已經答复了这种問候。

自从达賴喇嘛在丘坦穆附近的坎齐曼入境以来，他受到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門边境地区的人民充分的尊敬和殷勤招待。达賴喇嘛希望說明，那里的印度政府官員如何不遺余力地使他在那里的停留和通过印度这个管理得极好的地

区的旅行尽可能舒适。

达赖喇嘛现在将前往穆索里，他希望在今后几天内到达那里。达赖喇嘛一俟有机会休息和回想一下最近的事件，就将考虑他的未来计划，如果有必要的话，并将立即说明这些计划。

他的国家和人民经历了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达赖喇嘛目前所希望说的只是表示他对于西藏遭遇的悲剧深感遗憾，并且热诚希望这些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

作为达赖喇嘛和西藏一切佛教徒的精神领袖，他最关心的是他的人民的幸福，以及保证他的神圣的宗教和他的国家的自由永远发扬光大。

达赖喇嘛对于他平安到达印度再次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在印度和国外的一切朋友、为他祝福的人和信徒表示真诚地感谢他们向他发来的许多表示同情和关注的电报。

(新华社 1959 年 4 月 21 日讯)

四月二十二日在穆索里发表的 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穆索里消息，劫持达賴喇嘛到印度去的西藏叛乱分子四月二十二日在穆索里宣讀了以达賴喇嘛名义发表的一个簡短声明。这个声明企图否認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官員散发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是別人強加于达賴喇嘛的。但是，这种辯解只是欲盖弥彰。

这篇声明是針對四月二十日本社政治記者評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而发的。在这篇評論中，記者指出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有許多明显的漏洞，人們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賴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別人強加于达賴喇嘛的。四月二十二日又以达賴喇嘛名义发表的声明，对于不仅本社政治記者而且还有印度的公正輿論和其他觀察家提出的許多漏洞，沒有作任何解答。这只能証明写这个声明的人完全不敢面对事实，也无法否認事实。

在过去这些天中一直同劫持达賴喇嘛的叛乱分子在一起，并且据印度报刊披露曾参加了十八日的声明的“討論”的印度外交官員梅农，在二十二日也发表談話，赶忙为自己洗刷，硬說十八日的声明是“达賴喇嘛写的”，是“西藏人自

已翻譯的。其他人不能对这个声明負責”。但是这个印度官員的談話显然太匆忙了，以至馬上又露了馬脚。据当天用达賴喇嘛名义发表的声明說，十八日在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是在达賴喇嘛“授权下发表的”，而不是“达賴喇嘛写的”。达賴喇嘛怎么能够授权达賴喇嘛写声明和发表声明，这个滑稽的矛盾他們两方面都沒有加以解释。

人們注意到，尽管想要改变达賴喇嘛是受人劫持的印象，二十二日的声明仍然不是由达賴喇嘛本人亲自发表的，而是由达賴喇嘛在写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中所說的劫持了他的“反动分子”发表的。在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达賴喇嘛甚至沒有露面。

这个声明同上次声明不同的，是它的起草人接受了上次声明中露了馬脚的教訓，把所有第三人称都換成了第一人称。

四月二十二日以达賴喇嘛名义发表的声明全文如下：

四月十八日我在提斯浦尔发表了一篇声明。当时我并不想接着再发表一篇声明。但是我看到新华社的报道暗示，早些时候发表的这篇声明不由我負責。我希望說清楚，早些时候的这篇声明是在我的授权下发表的，它表示了我的看法，我坚持这篇声明。我发表这项簡短的声明是为了糾正新华社的报道所造成的錯誤印象，我在目前不打算再說甚么。

（新华社1959年4月23日訊）

尼赫魯三月二十三日在印度人民院 就西藏局势发表的声明

最近关于中国西藏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消息自然在我国引起很大的注意。我們不很清楚所发生的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是我想就我們所了解的主要事实发表簡短的声明。上星期在三月十七日，在討論为外交部提出的要求的过程中，我簡略地提到那里的紧张局势。我提到曾发生意願方面的冲突，虽然最近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暴力行动。

后来我們从我們駐拉薩的总領事收到較詳細的情报。看来关于达賴喇嘛的各种謠言在拉薩引起了激动情緒。在大約两周以前，有一大批西藏人进入了印度总領事館。他們向我們的总領事談到这些謠言和他們感到的不安。三天以后，有許多西藏妇女到我們的总領事館来，要求我們的总領事陪她們到中国外事处，为她們提出某些要求作見証。总領事對她們說，这是不适当的，他不能陪她們去，也不能参与任何示威。总領事把这些事件提請拉薩中国外事局注意。他正确地决定不干预这种内部事务。

三月二十日，中国军队和西藏分子之間突然爆发了战斗。在我們的总領事館附近发生了射击，一些流弹击中了我們的建筑物。有一些时候，总領事无法走出領事館。我

們的全体工作人員和他們的眷屬都平安，未聞財產受到重大損失。显然，拉薩的局勢已經平靜了一些。

我們駐拉薩總領事館約有三十名工作人員。連同他們的眷屬，人數約為一百名。在拉薩地區另外約有十六名印度僑民，我們目前沒有關於他們的充分情報。

在拉薩戰事爆發後，我們立即通過我們駐北京大使和中國駐這里的大使要求中國政府最充分地保護我們在拉薩的人員和財產，中國政府答應這樣做。三月二十一日，拉薩中國外事處的一位代表訪問了我們的總領事，並且向他說，為了更好地保護他本人和他的工作人員，他們應當前往外事處。我們指示我們的總領事通知外事處，我們的總領事離開總領事館是不正確和不適當的。這牽涉到大批印度國民，包括我們的工作人員的眷屬，而且在我們的總領事館內有寶貴的財產和檔案。根據國際法和慣例，我們的總領事和他的工作人員以及我們的檔案和財產有權得到最充分的保護，我們毫不懷疑，中國政府將會認識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在拉薩爆發的這次暴力行為是一個新的事態發展。以前在西藏南部各地在康巴人和中國部隊之間曾發生衝突。但是拉薩地區一直是平靜的。

人民院將了解，這是一個困難而微妙的局勢，我們應當避免採取任何會使這個局勢惡化的行動。我們無意干預中國的內政，我們同中國有友好的關係。在一九五四年簽訂了中印協定。潘查希拉原則就是在这个協定中第一次規定下來的。

印度和中國西藏地區之間有長期的文化和宗教關係。

在这个地区中有許多朝圣的地方，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認為这些地方是神圣的，我国人民有許多人每年到这些地方去。达賴喇嘛是深受我国人民尊敬的，在一九五六——五七年，我們曾荣幸地在我国接待了他，我們希望他平安。我們真誠地相信目前的糾紛将会和平地解决。

我們在拉薩的总領事和他的工作人員由于非他們所能控制的一些原因，目前处于困难的境地。我毫不怀疑，人民院将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和我們在西藏地区的其他代表表示最好的祝願。

(印度新聞处发，新华社譯)

尼赫魯四月二十四日与达賴 會談后发表的談話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魯二十四日下午在会見达賴喇嘛以后承認，达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魯在穆索里同达賴喇嘛举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談話以后举行的記者招待会上說达賴喇嘛告訴他，他曾經給西藏的中国軍事司令写了几封信。

在这以前，尼赫魯曾經在印度人民院和記者招待会上两次公开表示，他怀疑达賴喇嘛的这些信件是真的。他在三月三十日在人民院中說过，“这些信是頗为令人驚訝的”，“是不是真的写了这些信”。他在四月五日又曾在記者招待会上說过，“說达賴喇嘛被迫做某种事情的，說达賴喇嘛事实上在抱怨他自己的非常崇敬他的人，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很奇怪的說法。”

尼赫魯說，“我沒有問他这个問題。这是在提到一个問題的时候(达賴喇嘛)說到的。”

有記者問尼赫魯，达賴喇嘛說了什么，尼赫魯說：“既然你問我，我可以回答。他承認由于两个原因，他給他們写了信。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想，我猜，我沒有問他——当时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他設法避免同中国人决裂，

并且希望可以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某种解决，因此他的心情非常烦乱和矛盾。”

記者又問，什么样的矛盾，西藏內閣是不是发生了分裂，尼赫魯回答說，“我所想的不是那里的分裂，我所想的是，一方面他希望避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的西藏感情把他朝另外一个方向拉。这种内心矛盾是存在的。”

关于达賴喇嘛离开拉薩一事，尼赫魯在他的談話中作了一番叙述，尼赫魯說，“到三月十七日下午四点钟为止，他們（达賴喇嘛一行——印度报业托辣斯注）还没有离开拉薩的明确想法。他們是在六小时以后，即晚上十点钟离开的。”至于这批人为什么要离开，尼赫魯說，“当据声明（按：指四月十八日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說那些‘炮弹或者什么东西落在他的宫殿上’——不管是什么原因——的时候，这就对他們的想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既然一切都完了，‘我們走吧’，于是他們就在六小时以内离开了。”他又說，“事实上，他們沒有带多少衣服”。

有記者問，达賴喇嘛是否希望在西藏实行改革，尼赫魯說，“当达賴喇嘛两三年前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曾对我說，他希望在西藏实行改革。他告訴我，西藏在精神方面是一个先进的国家，但是在社会方面和經濟方面，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过去对我这样說，今天也这样說了。”

有記者問尼赫魯是否把他早些时候在記者招待会上談到邀請班禪喇嘛来会見达賴喇嘛的建議告訴达賴喇嘛，尼赫魯說，“真是抱歉，我忘了把这件事告訴他。”这位总理又說，“我本来打算告訴他，但是我完全忘記了。”他这种說法

在記者們中引起了哄堂大笑。

关于会談本身，尼赫魯說，“这是一次相当好的会談，我希望这是一次有益的会談。”

有記者問，他是不是同达賴喇嘛討論了解决西藏問題的办法，尼赫魯說，不能“馬上”找到解决办法。“我們討論了創造一种可能有助于为解决办法鋪平道路的气氛的可能性。”

有記者問，他會否安排同达賴喇嘛再作一次会談，尼赫魯說，“我們沒有安排另外一次会談，但是过些时候我們大概会再会晤。”

当天在穆索里为尼赫魯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說，有人問他，在西藏发生了这一切事情后，他是否仍要坚持“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尼赫魯說，“我們对別人說我們的一切話不能充耳不聞，但是尽管这样，我們知道，潘查希拉是好的”。

（新华社 1959 年 4 月 25 日訊）

尼赫魯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人民院 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講話

我曾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講过几次話。上一次講話是在四月三日发表的，那时我通知人民院說，达賴喇嘛带着一大批随从，已經进入印度联邦的領土。我願提供关于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并且向人民院报告一下我們所掌握的这些新事实。

几天以前，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到达穆索里，在那里，政府为他們的居留作了安排。那以后，我曾有机会訪問穆索里，并且同达賴喇嘛作了一次长談。

最近几天，我們接到的报告說，有相当多的、为数几千名西藏人最近越界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門地区，此外約有几百人进入了不丹領土。他們要求避难，我們同意了。他們当中带武器的人被解除了武装。我們还不知道他們的确切人数。在能够按照他們的願望、同时考虑这种情况下的需要，使他們散去以前，現在正在一个营地作出暂时安排来安頓他們。我們不能讓这些难民无依无靠。除了牵涉到人道考虑之外，也还有法律秩序問題需要考虑。我們感謝阿薩姆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給予的协助和合作。

就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來說，我們不能不采取充分

的措施，这是为了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使得他們免于受到大批印度和外国記者的騷扰。这些記者們由于渴望取得关于这件世界大事的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使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麻煩，并且几乎会使他們应接不暇。我們急切希望給予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保护，同时我們也同意讓这些新聞記者有适当的机会見到他。我接到了通訊社和報紙的将近七十五个代表从提斯浦尔发出的申請，要求我給他們这种机会。因此事先派了一名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到提斯浦尔去，去应付聚集在这个阿薩姆邦小城的报界代表和攝影記者們。这位官員作了必要的行政上的安排，来尽可能地滿足新聞記者們要会见达賴喇嘛和替他摄影的願望。达賴喇嘛在进入印度之后不久，就表示希望发表声明。我們后来得到通知，这个声明将在提斯浦尔发表，我們的官員为向報紙記者們分发声明譯文作了安排。

鉴于所提出的某些不負責任的指責，我願意說清楚，达賴喇嘛对于這項声明以及其后他在穆索里发表的較簡短的声明完全負責。我們的官員同这两个声明的草拟或者准备沒有关系。

我无需对人民院說，达賴喇嘛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願进入印度的。我們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建議他来印度。我們自然會考虑到他謀求在印度避难的可能性，当这样的請求提出时，我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带着大批人进入我国偏僻的一隅，这在运输、組織和安全方面造成了特別的問題。我們派了一名官員在邦迪拉迎接达賴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并且护送他們到穆索里。其所以选择这位官員，是因

为他曾任駐拉薩总領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达賴喇嘛和他的官員所熟悉的。选择穆索里作为达賴喇嘛的居留地是在了解了他自己在这个問題上的願望和在他同意之后才最后确定的。我們方面并不想对他施加任何不恰当的限制，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不作某种安排来防止任何不幸。應該記住，在西藏发生的最后发展到达賴喇嘛离开拉薩进入印度的那种事件，在印度人民中間和世界报界中引起了极大的关切。在他到达穆索里以后，就采取了措施来防止达賴喇嘛受到要想見他的群众和新聞記者的麻煩。除此之外，对他的行动沒有任何限制。曾經告訴他，他和他的随行人員可以在穆索里随意走动。应当記住，达賴喇嘛最近不仅經過了一次艰苦危险的长途跋涉，而且遭遇了一場令人哀伤的經歷，甚至硬心腸的人也不能不感到震动的。而他不过刚刚二十四岁。

这就是某些十分明显的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背后隱藏着可能有深远后果的严重发展。西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着悲劇，人們冲动了起來，发出了种种指責，并且使用了只会使局势更糟、使我們同我們北方邻国的关系恶化的語言。我确信，人民院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考虑这样重要的問題的时候，我們应当有节制和运用智慧，使用温和确切的語言。在現在的冷战时代中，有一种使用放縱的語言和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狂暴的指責的傾向。我們幸而一直置身于冷战之外，我希望在这一次，就象在任何其他时候一样，我們將不使用冷战的語言。問題太严重了，不能以随便的或者激动的态度来处理。因此，我願呼吁报刊和公众說話

时要有节制。我感到很遗憾，我們这方面偶尔也有失去节制的时候。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几天以前，有人对中国国家元首毛澤东主席的画像表现了严重的不礼貌。这是少数不負責任的人在孟买干的事。我們不能讓自己在一时激动的情況之下被推上錯誤的道路。

向中国的領袖、报纸和人民发出任何类似的呼吁的事，不能由我来做。我所能說的只是，对于中国的負責人士对印度所作的評論和指責的語調，我感到非常难过。他們不顧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語言。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以行为有度和彬彬有礼著称的伟大国家，就尤其令人难过。对印度所作的指責如此荒誕，我觉得很难对待这些指責。有一种指責說我們劫持达賴喇嘛。中国当局肯定应当知道我們在这个国家中是如何行事的，我們的法律和宪法是什么样的。即令我們有这样的意向，我們也无法违背达賴喇嘛的意志而对他实行某种拘留。而且根本不存在我們想这样做的問題。我們这样做，不能得到什么，而只会得到困难問題的負担。不管怎样，这个問題是能够容易地澄清的。达賴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西藏或者到他願意去的任何地方去。由于班禅喇嘛特别发表了某些奇怪的言論，我已經声明，我們欢迎他到印度来亲自会见达賴喇嘛。如果他願意这样做，他将受到一切礼遇。我还說过，中国大使或中国政府的任何其他使者可以为此目的前来印度会见达賴喇嘛。任何人要和平地到印度来都不会遇到障碍。不管我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們將給予他一位客人应受的礼遇。

还提出了另一个甚至更奇怪的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說法，据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是英国的帝国主义和扩张的传统的繼承者。英国的政策是对西藏实行扩张的政策，而且他們在本世紀早期曾以武力来执行这种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我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残酷的冒险，它給西藏人带来了很大的損害。由于这种冒险的结果，当时印度的英国政府在西藏建立了某些治外法权。当印度独立时，我們繼承了这些权利中的一些。由于我們是完全反对在另一个国家拥有任何这些治外法权的，我們不想保持这些权利。但是人民院知道得很清楚，在独立和分治后的早期，我們非常忙，而且我們必須应付我們自己国内的非常困难的局面。我們沒有去注意西藏，如果我可以这样說的話。由于不能够找出适当的人員来担任我們駐拉薩的代表，有一段时期我們讓原有的英国代表繼續在拉薩留任。后来印度人代替了他的位置。在中国軍隊进入西藏以后不久，这些治外法权的問題就提出了，我們毫不犹豫地同意放弃这些权利。不管西藏可能出現什么事态发展，我們本来总是要放弃这些权利的。我們从西藏的某些地方撤出了我們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設施和休息所。我們規定了潘查希拉五項原則，把我們同西藏地区的关系放在新的基础之上。我們非常关切的是維護印度和西藏之間在香客往来和貿易方面的传统联系。我們在这个問題上采取的行动以及我們后来有关西藏的所作所为足以証明我們的政策，足以証明印度在西藏沒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的确，甚至从最狹窄的实际观点来看，任何其他政策都会是

錯誤的和無用的。自從那時以來，我們一直不僅竭力遵守我們締結的協議，而且竭力謀求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友誼。

因此，竟然提出這些既不適當又完全沒有根據的指責，這是使我們感到深為遺憾和驚訝的事。我們已經向中國政府表達了這種深刻的遺憾情緒，特別是對最近在北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屆會議上的發言的深刻遺憾情緒。

我前些時候說過，我們的廣泛政策是受三個因素支配的：第一，維護印度的安全和完整；第二，我們跟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第三，我們對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我們將繼續奉行這種政策，因為我們認為，這不僅在目前是正確的政策，在將來更其是正確的政策。如果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亞洲的偉大國家，這兩個過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鄰邦的國家竟然彼此產生了敵對情緒，這將是一個悲劇。我們這方面將奉行這個政策，但是我們希望中國也會這樣做，我們希望不要說出什麼話或者做出什麼事來危及從更廣泛的亞洲和世界和平的觀點來看是如此重要的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五項原則之中就有一項規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無根據的指責、使用冷戰的語言，這種互相尊重就要受到嚴重的損害。

我以前已經說清楚，關於噶倫堡是西藏叛亂中心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有眾多的西藏血統的人作為印度國民居住在我們印度。我們印度還有一些西藏移民。所有這些人都非常尊敬達賴喇嘛。在他們中，有些人對於西藏的事態發展感到極不愉快；有些人無疑是有反中國情緒的。我們已經向他們表明，不允許他們從印度進行任何顛覆性

活动，我要說，一般說来，他們的行动是遵照了印度政府的指示的。显然我不能够說某人沒有秘密地干某件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象或者說住在噶倫堡的一小批人組織了西藏的一次大規模騷乱，这似乎要拿出很大的想象力，并且不顧明显的事实。

康巴暴乱是三年多以前在中国本部靠近西藏的地区发生的。难道要噶倫堡对此負責嗎？这次暴乱逐渐扩大，而且无疑在沒有参加这次暴乱的众多的西藏人思想上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對他們的前途的恐惧和忧虑控制着他們的心灵，激昂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着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恐惧也許是沒有根据的，但是这种恐惧无疑是不能否認的。要适当地对待这种情緒，只能采取比战争温和的办法。

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到这里来的时候，承蒙他同我相当詳細地討論了西藏問題。我們进行了一次坦率和充分的会談。他对我說，虽然西藏长时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不認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那里的人民不同于中国本部的人民，正如中国的其他自治地区的人民不同于中国本部的人民一样，尽管他們构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因此，他們認為西藏是一个将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地区。他还对我說，誰要是以为中国将把共产主义强加于西藏，那是荒謬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这种方式强加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的，他們不想这样做，尽管他們希望逐步地实行改革。他們打算甚至把这种改革也推迟相当的时候。

大約在那个时候，达賴喇嘛也在这里，我当时同他作了长談。我告訴他周恩来总理的友好的态度和他关于尊重西

藏自治的保証。我当时建議他真心誠意地接受这些保証，进行合作来保持这种自治，并在西藏实现某些改革。达賴喇嘛当时同意，他的国家虽然据他說在精神方面是先进的，但是在社会和經濟方面是非常落后的，因而需要改革。

这些友好的意图和态度究竟实现到了什么程度，这不是由我們來說的事。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停滯不前的、沒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間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絕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質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 and 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沒有作，或者作了沒有成功。

如果說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負責，看来这种說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緒，这种情緒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甚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實質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

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去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三天前我在穆索里同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我谈到了他不得不应付的各种困难，他的人民对于那里的情况的日益增长的愤懑，谈到他如何设法约束他们，谈到他认为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的佛教正在受到威胁的想法。他说，在最后时刻来到以前，他还不想离开拉萨。只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据他说几发炮弹向他的宫殿打过来时，落在附近的池塘中时，他才突然决定离开拉萨。在当天的几个小时内，他和他的随行人员离开了拉萨，开始了前往印度边境的危险的旅程。离开是这么匆忙，甚至不可能携带足够的衣服等杂物。当我和达赖喇嘛

会談时，他的随行人員一个也沒有在場。速譯員也是我們自己的。达賴喇嘛告訴我，先前发表的两个声明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存在任何人强迫他发表的問題。尽管他很年輕，可是我很难想象他会被迫做他所不希望做的事情。我完全同情这个青年人。他在年輕的时候就不得不担起重担和承担巨大的責任。在过去几个星期，他身心十分劳累。我劝他休息一个时期而不要作出任何仓卒的决定。他对于西藏的情况感到很不愉快，他特别切望战斗停止。

(印度新聞处发，新华社譯)

尼赫魯五月四日在印度聯邦院 再就西藏局勢發表的講話

據印度新聞處報道，印度總理尼赫魯五月四日在聯邦院（印度議會上議院）就西藏局勢進行辯論以後發表了講話。

尼赫魯在講話中說，“不幸的是，在一些別的国家，特別是在中國，關於我們在我們的議會這裡或議會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許沒有得到充分的了解；這就是說，他們可能不完全了解，在這裡，每個人都有權利說——在議會這裡、的確還在議會以外和在報紙上——每個人都有權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一些關於不許中傷或誹謗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之寬的，他或她所說的話，事實上可能是譴責政府的，而它常常是這樣的，它並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對議員先生們在議會中或議會外或報紙上所發表的言論提出——已經提出異議。”他說，“這裡的情況與中國的情況是不同的。”

談到在孟買有人侮辱毛澤東主席的畫像時，尼赫魯說，“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對這件事感到遺憾，同時也是說明，我們所了解的並且也是正確了解的關於這一事件的事實——我們對這些事實應該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為清

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們关于事实的說明沒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們呆在这里，我們对我們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應該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論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見。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遺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沒有任何关系。”

尼赫魯接着談到他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院（印度議會下院）就西藏局勢发表的談話，他說，“就重要事实而論，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談到了，我的确沒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沒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沒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願意再次說，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設想，我們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們在噶倫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員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問題进行爭論，因为我們面前的問題比西藏問題——整个西藏問題——要严重得多，要深刻得多，虽然西藏問題是重要的，而我們所討論的事件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們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們的言行必須特別謹慎。現在我認为人們在这种場合講什么話要有限制也要負責。”

他又說，“首先，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們的目的不是单单譴責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話。我很遺憾地說，最近在中国，这种譴責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多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認为我們不該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況下被几句口号弄

得坐立不安。我們絕不能被人從我們的主要道路上引開，因為這在將來是會引起很大的後果的。”

在答復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發生以後，印度是否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尼赫魯說，“有時候我懷疑，我們所使用的言詞究竟是包含同樣的意思呢，還是在我們心目中有著某種不同的含義，可是——我並不是說我比別人優越——就印度來說，我們真誠地努力遵守這些原則，並且我認為，我們並沒有違反任何原則。站起來批評別的国家或者為別的国家辯護不是由我做的事情。”尼赫魯接着說：“我希望向對面的議員先生保證，就政府來說——我不能夠代表印度每個老百姓講話——我們遵守這些原則，並且我們將努力遵守它們，不管別的国家是否會這樣做。有些人肯定地——如（議員）古普塔所說的——利用西藏境內以及與西藏有關的這些事件的叫嚷說，印度現在將不得不考慮，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結盟政策。所有這一切表明對於我們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誤解。不結盟——雖然這個字眼本身是一種消極的字眼——仍然有着積極的意義，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們不打算與任何国家訂立軍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說明這一點，因為一旦我們放棄了不結盟的主意，我們就馬上失去我們所依靠的每一只錨，我們便將隨波逐流。我們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這樣我們便失去我們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個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種非常可貴的東西。因此，這種總是想從這個国家到那個国家得到某種東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這也許是與本題不很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說，

我們制訂一个共同的防禦政策吧。我完全贊成解决我們同巴基斯坦的糾紛，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們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們說我們有一項共同的防禦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誰呢？立即产生这样的問題：‘这种共同的防禦政策是对付誰的呢？’我們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約或东南亚条約組織或某种組織的成員？我們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禦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軍事联盟的另一个說法。我們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們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們希望我們將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們不想把我們自己、我們的观念、我們的政策同其他国家連在一起，卷入軍事防禦和进攻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他还說，“我們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他說，“我們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憤而改变我們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們沒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暫時发生的事情就使我們改变了。”

他表示希望：目前我們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漸漸消除。但是，他說，“我們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說是寄寓——如果你願意这样說的話——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則）的东西，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受到了极大的損害，这不仅对西藏來說是一个悲剧，而且對我們中間的許多人來說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他說，这些字眼象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無論你用什么字眼都沒有什么关系——已經开始失去它們的光澤，开始被人們毫无意义地濫用；事实上，就象甚至“和平”

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象霹靂或者小規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他说，“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说，“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现在，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

已經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語已經失去意义，因为我覺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責。”他說，“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領袖們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責。这些指責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領袖們这样不負責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們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們認為他們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別先进的。这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且不管別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們，因為他們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為他們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說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尼赫魯在講話中敘述他所知道的西藏叛乱事件的經過时強調指出，印度在拉薩的总領事不想干預西藏的局势。他說，“(对这位总領事)我們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說：‘不要牽涉在拉薩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三月)十四日的事。这种情况繼續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会說过，在拉薩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說是否正确，我不知道。問題是，在那个时候沒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三月二十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們坐在領事館內的总領事也不知道，人們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十七日晚上，达賴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員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薩。据他們說，在十七日下午四点鐘，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

宮的一個湖里。噢，這使得他們認為‘現在是最後的時刻，現在宮廷要遭到轟擊，到處都要爆發戰爭’，於是他們就離開了拉薩。”

他又說，“據我所知——我並不肯定——即使在那時，他還沒有離開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個打算一定是在後來拉薩遭到炮彈轟擊的時候形成的。總之，在從十一日到二十日或二十一日這一週內，在這十天左右時間內，這就是我們得到的消息。我們對此什麼事也不能做，而且在（三月）十日或十一日以前，除了我們自然知道各種對立的力量在拉薩和西藏活動以外，我們對於局勢毫無所知。然後，我們面臨了達賴喇嘛可能到這裡來的問題，我們決定，我們應當接待他。他來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經拒絕過，可是人們一再向我詢問：‘你打算對來自西藏的無論多少難民都開放門戶嗎？’我拒絕那樣做，雖然我內心知道，我不能夠認真拒絕給予陷於非常困難處境的人們以避難權，我不能這樣做；但是我當時不願意說出這一點，從而招致人們從各地蜂擁跑到印度來。事情的經過和我們的所作所為的簡單情況就是如此。現在我們被稱為擴張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分子等等種種名目，我認為，這對我們究竟這是怎樣的人不會有任何實際影響；然而，由於這些指責出之於我們認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確實使我們難過。”

尼赫魯說，“現在我想只向你們談幾個事實。北京報紙上又出現了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它們現在追述了一九五〇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們在中國軍隊進入西藏的時候發出的一些備忘錄。這是一些非常客氣的備忘錄。對這

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提到这些备忘录，說我們当时写給他們的東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說我們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們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錯誤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們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們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談到班禅額尔德尼四月二十九日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會議上的講話时，尼赫魯說，“当我讀到一位曾是我們的貴賓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講話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說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沒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說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賴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們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他說，“現在，就我們而論，我們既沒有从噶倫堡，也沒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們运用了我們給予避难权的毫無疑問的權利。我已經說过，达賴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隨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他还說，“达賴喇嘛在这里並沒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願意这样說的話——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談話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說，他就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願意恭恭敬敬地說，任何否認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隨便講話的。”

他說，“此外，議員先生們也許在報紙的標題——因為標題用了一些奇特的說法——中看到我曾經說過，如果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我會感到高興。我曾經這樣說過。有人曾向我提出問題，我就說，‘如果他體面地回去，我自然會感到高興’。但是這完全不是說我要把達賴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處于一種為難的境地。完全要由他來決定怎樣做，什麼時候做。當我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見是：你經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煩惱的經歷。作為一個比你年紀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議你休息幾天，安安靜靜地考慮一下發生的事情，然後作你願意作的事情。”

尼赫魯在講話中再一次談到他對西藏叛亂事件的看法，他說，“我並不確切知道西藏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聲明中所說的，根據中國的說法，這是相當重大的事情，規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過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圍的環境，那麼人們就很可以設想，除了所謂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會有這些人的——以外，事實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說，不管他們是多數還是少數，但是無疑是很多人——既然採取了他們所採取的這種步驟，這的確意味着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步驟。無論如何，事情是發生了，人們對此有着強烈的感受。”

尼赫魯說，關於“難民”，現在最新的情況是，現在有接近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難民”正在經過“東北邊境特區”的卡門地區，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過不丹，有七百人已經到達錫金——共約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經要求我們接受經過他

們的領土的西藏“難民”，我們已經同意這樣做。這樣，我們有着大約九千名“難民”，我們已經負起為他們作某種安排的責任。少數難民進入印度時帶有武器。他們一進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裝。他說，這些“難民”中一部分暫時收容在阿薩姆邦米薩馬里的營場里，還有一部分將由西孟加拉邦修建營場來收容。他說，外交部已經指定專門的官員去處理難民的問題。

他說，“我們不會讓他們象囚徒一樣長久呆在營場里。事實上，我們給邊境官員的指示就是要他們告訴難民們：我們並不負責無限期地維持他們的生活。”他說，“自然，當這些人進來的時候，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要負責的。我們不能讓他們在印度流浪。這裡又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除了在山區較冷的气候條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長住下去的——我們根本不能把他們送到印度其他地區去。”

(新華社1959年5月5日訊)

尼赫魯五月八日在印度人民院 討論“西藏問題”时发表的講話

副議長先生，在过去几星期中，在本院以及联邦院已經数次提出这个关于西藏事态发展的問題，我已經有机会就这种事态发展造成的局势发表了多次講話。我觉得，目前对于基本事实談得已經够了。来自中国的言論对于大家所知道的这些事实提出了异議。我們对于来自中国的言論中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論，也不認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們繼續进行这种爭論会不会有甚么用处，这样做实际上只能意味着重复已經說过的話。然而，我們在这里进行这次短時間的討論也許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次討論中，对于許多基本事实提出了异議，或者对于基本观念提出了异議，因而它提出了比西藏发生的事情要广泛得多的問題。

就在我之前作了热烈发言的那位議員先生（指印度人民同盟議員瓦吉帕伊），說了許多對我們政策的一切基本假定提出异議的話；这种政策是为本院——我想还为整个国家——非常一致地接受的。尽管如此，他对所有这些基本假定提出了异議。要就是他从未相信过这些基本假定，要就是西藏发生的事情使他改变了意見。

我不打算在这几分鐘里討論我們的政策的所有的基本

假定。現在我想說的只是，我不贊同那位議員先生所說的話。我不同意他所說的許多東西；就政府而言，我們不會奉行他主張我們應該奉行的那種政策。我希望十分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我可以順便說一下，我們沒有對達賴喇嘛實行任何限制，有的只是由他本人來判斷的良知和禮儀的限制。但是，這位議員先生竟建議我們讓他去做他自己並沒有提出過的某種事情，那就是，使印度成為某種宣傳運動的大本營；竟建議我們讓這位議員先生和他的政黨參加這一宣傳運動，講出這種話來似乎是如此奇怪，如此驚人，我甚至不能想象，如果他事先考慮過的話，他怎麼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建議。對於這一點我用不着多說，因為這同目前在世界上或者在印度或者在西藏或者在中國或是任何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他還強調了一九五四年的協定——同中國締結的關於西藏的協定。他說，我們根本不該簽訂這項協定。我也不太了解這種話或這種觀點是什麼意思。他究竟期望我們怎麼做是不清楚的，除了也許是在拉姆利拉廣場舉行公眾的集會並發表演說以外。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由在印度各地舉行的公眾的集會來執行，這不是辦法。無疑，公眾的集會是重要的。但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不僅有基本政策和假定，而且有关于外交政策的肯定的事實。

我心中毫不懷疑，我們同中國簽訂的關於西藏的協定是一個適當的協定。這是一個正確的協定，我們將遵守它。甚至他說這項協定已經被破壞，也是不正確的。可以說，他

認為，那項協定的某些含義，在他看來或者在別的任何人看來沒有得到貫徹。這是另一回事。但是，並不存在那項協定已經被破壞的問題。它繼續存在；它仍然起作用。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人了解所有這些問題的背。我們很自然地動了感情，我們由於最近的事件而產生了一些感情的浪潮，發生這種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同西藏、同西藏人民的，或者是西藏的山岳，或者是開拉斯山，或者是馬那薩羅瓦湖（以上兩地即康仁波清和馬法木錯，是一九五四年簽訂的中印兩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提到的印度香客按慣例前往中國西藏地方朝拜的地点。——編者注）等等有着某種親密的感情上的聯系和其他的聯系——這是混雜在一起的東西。我們能夠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尊重這種感情上的反應。儘管如此，我們確定或企圖確定的任何政策是不能拿一種感情的浪潮作基礎的。它們必須同事實有一些關係。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議員先生知道西藏、中國、蒙古、不丹和錫金以及尼泊爾在過去幾百年中的歷史背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願意研究它們。我不知道剛剛發言的那位議員先生究竟對它有沒有什麼了解。我恰好對它有所了解，我曾經不怕麻煩讀了許多書籍和歷史、中國的歷代的編年史和印度的報告等等。下面是過去六七百年或者更長一段時間的歷史，這段歷史是從成吉思汗侵入西藏，是從忽必烈汗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占有西藏（他認為當時的達賴喇嘛是精神方面的法師）的時候開始的。這是一種奇怪的結合。在政治上，忽必烈汗統治着西藏，但是他認為達賴喇嘛是他

的精神領袖，这样，你們就看到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結合。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西藏同中國的關係是非常奇怪的，因為——我相信我這樣說是不錯的——中國人從蒙古人時代起一直是相當蔑視西藏人的。中國人相當蔑視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外的一切國家。長期以來，不管是在唐朝，還是明朝還是最後在滿清，他們都自認為是中國，是天朝人，是大國。在長時期內，中國同西藏的關係經常變化，有時是主權，有時是宗主權，有時是半主權，有時是半獨立，象這樣一個接一個地一直到滿清王朝到二十世紀初期對西藏進行了完全的控制，相當大的控制。甚至在清朝的末日當它垮台的時候，它仍然在西藏擁有相當大的影響。

當滿洲王朝在大約四五十年以前崩潰時，它削弱了。雖然它削弱了，可是不論是誰在中國執政，不論是皇帝還是袁世凱總統，不論是在他們之後的軍閥，還是蔣介石元帥的政權，還是人民政府，從皇帝到共產黨人，他們奉行的政策是一貫的，即認為他們自己是西藏的統治者。毫無疑問，在西藏強盛的時候，它不時對此進行抵抗。曾經有過一些時候，至少有兩次，西藏軍隊曾經象中國軍隊一再進入西藏那樣到達中國首都——這是相當古老的。歷史也有過這樣一些時候，即尼泊爾軍隊進入過西藏，而西藏軍隊也進入過尼泊爾——至少有一次，克什米爾的某一位將軍佐腊伐爾·辛格越過西藏的喜馬拉雅山進行了輝煌的戰役，當然，他遇到的只是比西藏人或任何人更強大的敵人——西藏寒冷的气候。西藏的低溫使他和他的軍隊在那裡復沒。所有這一切都是歷史，都是混亂的歷史。毫無疑問，過去同西藏關係最

亲密的国家是蒙古和中国，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宗教原因、文化原因，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算数。在考虑目前的局势时，我们必须按照事物在目前和在不久以前的情况来看待它们。我们不能想到成吉思汗时代，或者忽必烈汗时代，或者满洲皇帝，或者蒋介石，或者任何其他人。关于目前的局势，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接受議員瓦吉帕伊先生的說法，我们就应当或多或少对在这个問題上发生武装冲突有所准备。我们不能拍拍某人的背，要他去打，并且說我們将在背后为你喝采。这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在我們的思想明确我們所說的話或所要达到的目的。我認为，不管可能发生什么問題，我們的目的首先是要和平解决这些問題。好战的言論和好战的做法是不会促成和平解决的。很明显，如果中国有些人認为，通过威胁和强硬的言論，他們就能吓倒印度，那是錯誤的。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印度有些人認为，通过威胁和好战的言論，他們就能吓倒中国，这同样是錯誤的。显然不是这样，大国——印度或者中国——是不会这样受人摆布的，它們会作出相反的反应。

就中国來說——不是对我們，而是对我們所熟知的其他国家，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国本身是一方面的軍事集团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本身同冷战是密切相关的。这不是說对我們，而是說由于这个集团体系。他們已經习惯于我个人認为在国际的言談中是不正确的表达自己意見的方式。

至于談到冷战的手法，对于印度來說，我們最近对这种

手法已經有了一些體驗。誠然，我們對它是作出了反應。我們不喜歡它。這裡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採取那種手法。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它也關係到我們的政策。我認為，無論是那種政策還是可以稱作冷戰表達方法的那種表達方法，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不對的，肯定對我們來說是不對的，除非我們想完全改變我們的政策。我們不想改變我們的政策。我們認為，無論從什麼觀點來看，改變這一政策都會是有害的。我們應該遵循那一政策。那個政策主要並不是根據別的国家做了什麼，而是根據我們所能理解的那種政策本身的正確性。我們可能不時地控制不住自己。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是人。可是，假如我們頭腦冷靜地考慮，我們一定會認識到，我們必須堅持那一政策。如果是這樣，那麼要是我們所表達的意見、我們的挑戰和我們的威脅等等不符合那樣一個政策，我們就不應該做那些事情。

我要向本院提出，這並不是示弱。我想，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認為印度在過去幾年中所採取的是一個軟弱的政策。有些人指責我們向后彎，指責我們偏袒這一邊或者那一邊。我想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如果說有時候我們講起話來溫和而友好，這並不表示軟弱，而是表示一種肯定的信念，即這是處理國際問題或者就此而言處理國內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方式。因此，我認為我們決不能談論這些好戰的做法或威脅。我們決不能被憤怒支配，儘管有時候我們可能對於正在發生的事件感到有點生氣。我們必須以我們堅定的政策和沉着的態度來表明，我們將繼續進行我們一向

所作的那种友好的努力，即令事情弄到我們的边境上来了。

对于西藏人民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同情的。这当然不是由于西藏人民有着封建政权。他們一直与外界隔絕，一直有着靜止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几百年前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过，但是在別处已不再存在。这里沒有人希望保持这种制度。事实上，我十分肯定，甚至达賴喇嘛也不希望在西藏保持它。这里，我們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完全与世隔絕了好几百年的社会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事件把它推到我們的疯狂的世界中来了，冷战和种种事情出現了，活跃的政策、可怕的政策和专断的政策出現了。想象一下这两者之間的对比吧。这是一个鴻沟。从这种事情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痛苦的后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减少这种后果。你可以設法賴和这种冲击的影响。可是你根本不能轉一下念头就使它消失。我相信中国政府过去的政策是慢慢地实行所謂的改革或者不管是什么措施，这个政府了解，象这样一个国家是不能用突然的办法来对待的。那个政策是否改变了，我說不上。也許它改变了一点。那是很可能的。在中国是否正在发生其他的变化，我說不上。这肯定是一种政策，他們公开和私下說过，他們認識到这一点。

我或者我們在处理这些問題时还有一个困难，我們所使用的字眼对其他人來說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我們談西藏自治。中国人也談西藏自治。可是我不仅怀疑，我認為它包含的意思是否跟他們所認為它包含的意思相同。我認為不是这样。还有这么多的其他的字眼。我并不是在談任

何故意的歪曲。撇开那一点不談。撇开任何歪曲不談，思想方法改变了，不管怎么样，它們改变了，而冷战方法使它們改变得更多。的确，要講同一的語言——我指的是內心的語言——是非常困难的。也正由于那一点，困难产生了，并且产生了很大的誤会。然而，我无法談到所有这一切問題。

我可以談一件事。我想丹吉曾提到一个叫馬朱达的人召开的关于西藏的什么會議的事。除了今天以外，我一直沒有听到过它。事实上，正当我来的时候，我才听到关于它的一些情况。就我所看的一切文件而言——我的确看到它們——我想，不管那个會議看来是想达到什么目的，或者不管它看来要表示些什么，看来都是非常錯誤的，它是一种錯誤的作法，这种作法不会对任何人有絲毫好处，而可能造成很大損害，如果这的确是印度任何負責人士采取的作法的話。因为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一件事。我們究竟要怎样呢？我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們怎么能实现它呢？我們对它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認为，我們对西藏的事件感到忧愁；感到难过。我們为什么难过呢？大概是因为我們觉得有些人正在受到袭击，受到压迫；不管某些人是象丹吉所說的那样是一些封建地主或者那样一类的人，还是象其他人所說的那样是西藏的普通人民，或者不論这是些什么人，无论如何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我心里毫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上层封建分子和其他人之間划一条界綫是困难的。他們全都可能混在一起。結果，目前他們全都被鏟除了。如果一个社会已經存在了千百年——它可能已不再有用了，可是事实是——要

鏟除它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它可以慢慢地加以鏟除，它甚至可以迅速地然而是在有一定程度的合作的情况下加以改变。但是，如果对那种社会采取任何一种强迫鏟除的做法，那就必定会是痛苦的，无论它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当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需要处理这样一些从社会组织来说可以叫作原始性质的社会的时候，该怎样加以处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这些困难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本来是应当在可能稍微慢一些然而得到较大程度的合作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本来是会这样发生的，因为这种改变只有在有关人民自己进行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才能使社会结构和有关的人受害最小——别人可以帮助他们，别人可以向他们提出建议，但是要由他们自己进行改变。一旦用坏方法来办好事，好事就变成坏事。它产生不同的反应。那就是说，我不能判断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我没有掌握事实，本院的任何人也没有掌握事实，只是一般地在这里和那里有某个零星的事实。但是，我只是要不揣冒昧地说，所有这些复杂的做法——不是容易弄清楚的；无论如何，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无疑为西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本来是希望避免它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人们奇怪地谈到召集一些国家的代表和发出做这种事情做那种事情的命令。我很惊奇，他们竟这样想，好象这是办得到的一样。

经过一些年的努力以后，现在将要——我相信——在欧洲某地举行所谓最高级会议了，地球上的各大国、俄国和美国和英国和法国而且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国家——意大利

利——或者不管可能是什么国家被召集到那里去决定世界的命运。这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它们会作出什么决定，我是不知道的。我祝它们成功。我祝它们达成某种谅解。但是，这里有些議員先生随便地说，我们应当发布命令和法令，聚在一起作出决定，不然的话将对你们更加不利，这种作法似乎简直是演滑稽歌剧的作法，它同现实毫无关系。

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大国，印度是大国——在幅员方面是大国，在历史背景方面是大国，在许多事情上是大国。我说的主要不是军事力量方面，虽然从防御或进攻的观点来看，无疑的，他们的潜力或实力是相当大的。

从任何长远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者哪怕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和印度做朋友，互相合作，是相当重要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它们应该走同一条道路，可是它们彼此不应该妨碍，它们彼此不应该敌视。这对于印度，对于中国都是不利的。事实上，中国现在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并且正在变得愈来愈强盛。可是，即使从中国观点来看，有一个采取敌对态度的印度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情况会大大不同——我不是在谈军事方面，而是其他方面。这两个国家彼此不敌视，这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即使它们以不同的和多种的方式行事。如果中国对我说该怎么做，我大概会恼火。如果我对中国说该怎么做，中国大概甚至比我还要恼火，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人，而中国人被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是非常温和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

现在，保持我们的尊严，保持我们的权利，保持我们的

自尊，然而却不讓自己隨波逐流地採取錯誤態度和敵對態度，並設法幫助消除或解決發生的問題，我們這樣做，可能對事情有一點幫助——這些問題不可能很快得到解決——這就是人們在當前情況下能夠做的最大限度，無論如何，創造一種可能幫助這樣做的氣氛。這會有多大作用，我不知道。

因此，我不揣冒昧地說，這應該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總的態度。我們不能再前進了。我們採取這種辦法也許對事情有幫助。

畢竟，本院和我國已經以相當有力的語言表達了他們對西藏的局勢發展，對西藏的事件的反應。沒有誰懷疑它們。但是我可以說，用激烈和敵對的語言講話不會具有說服力，事實上，它只會造成更大的鴻溝，而減少在達成諒解或在尋求解決辦法方面提供任何幫助的可能性。

因此，我想建議，我們不應該讓自己在這些問題上失去自制。有兩三位議員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地圖的問題。毫無疑問，肯定把相當大的一片印度領土標得好象是屬於中國的那些所謂舊中國地圖還繼續存在，這種情況，一直是使我國人民經常感到惱怒的一個因素。這並不是引起了什麼危機，然而，我國人民自然很難理解，為什麼這種事情無限期地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請注意，問題不是某些地方有某塊零碎的土地引起爭執，在這種爭執上我們是可以進行討論的，而且有兩三塊土地我們已經進行過討論，並且將要進行討論——而是發行這些不符合事實的地圖的做法，這些地圖在事實上不真實的、很難根據蔣介石元帥的政權或者

以前任何政权的历史認為它們是正当的。

我只想再說一句話，我想，丹吉談到达賴喇嘛的宮殿等等的事。我認為这是言过其实。首先，这不是他选择的，这是我們选择的。它比穆索里通常的房子稍大一些。我們不得不找最大的房子，因为有关的人是很多的。

象我已經說过的，除了保安原因外，根本沒有什么監視他的事情，我們並沒有阻止他会見任何人，如果他想会見的話。事实上，沒有大量的人，有些人是去參拜他，有些人——往往是錫兰和其他地方的佛教代表前来見他，他們全都到那里去。沒有誰阻止任何人。当然，至于奇怪的新聞記者，特別是来这里寻求聾人听聞的消息的外國記者，就是他們，我們也不阻止，但是我們不欢迎他們，因为这样的人把任何事情都弄得极其聾人听聞。

前几天，我在另一个地方說过，所有这一切神王等等說法是我所不喜欢的。他是达賴喇嘛，人們称他达賴喇嘛，如果有誰老是称他为神王来制造聾人听聞的事情，我可以說，达賴喇嘛本人不喜欢这种事情。

因此，我們不希望这整个事情被弄到或保持在聾人听聞的水平。正因为如此，我們根本不希望那么多的記者去那里恳求他，他們去，就总会发生困难，譯員問題等等，于是就会发生混乱、矛盾等等。

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你可以允許一些共产党朋友去見他。

尼赫魯：我們將允許我們的共产党朋友和我們的人民社会党朋友，两者都允許。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我們允許的

問題，我們不發許可證。這要由他決定。

阿恰里亞·克里帕拉尼：你可以給他們一些額外的便利。

尼赫魯：現在我們必須面對關於這些難民這個更大的問題。這是一個困難問題，是強加在我們身上的。

我是否可以就那個問題再講一句話，在三月十一日以前——就是說不久以前，大約是七星期以前，是吧？——我們對西藏可能發生的事情還毫無所知。在三月十一日，我們得到的第一個消息是關於西藏人在拉薩舉行某些示威的消息，在十七日即六天以後，這件轟擊達賴喇嘛宮殿的事情——據說是這樣——發生了。丹吉談到一點射擊不准的事情。我所說的只是別人所說的。並不是瞄得不准，而是故意向那里轟擊以作為一種警告。無論如何，當時的局勢在發展，到二十日，那里發生了戰鬥。在那以後，局勢迅速發展，本院是知道以後發生的事情的。達賴喇嘛在十七日傍晚離開那里，在月底到達這裡，於是種種事情的確使我們忙得不可開交。直到达賴喇嘛實際進入印度的大約前兩天，我們才知道他正在前來這裡。當我們知道他往南走的時候，我們曾設想他可能前來，但是只是在那以前兩天，我們才聽說他希望到這裡來，於是種種事情使我們忙得不可開交。

我們決定接待他；後來，在其他人來的時候，我們決定也讓他們進來，於是除達賴喇嘛以外又來了這麼許多難民。目前的估計是一萬左右——這裡面有各種各樣的難民，有老年的，有的是青年，有的是婦女；這對我們來說顯然是會

成为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不会永远把他们安置在用铁丝网围起的场子里；目前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两三个营场里。

米什拉问：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吃的和住的地方了吗？

尼赫鲁答：不过，我们愈早把他们分散开来愈好。也许有些人会要留一个时候，我不知道。

乔杜里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只是一个小问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许多观察家的很大的兴趣，那就是达赖喇嘛被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副委员长之一。

一位议员先生说：是班禅喇嘛。

乔杜里说：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都当选了。我对我讲的事实很肯定。是这样的。

既然他也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我国政府有没有接到这里中国大使馆的要求，让中国大使或者他的任何代表来见见人民共和国的副委员长？

尼赫鲁：没有，先生。我们没有接到这种要求。你也记得，我说过欢迎中国大使来会见他，如果他希望会见的话。

纳雅尔：我希望问一下总理先生，前来的这一万名难民都是富有的封建贵族呢，还是西藏的普通老百姓。

尼赫鲁：我无法对他们所有的人作任何说明。他们还没有到达，他们正在途中。可是西藏大概不大会有一万名贵族。

(印度新闻处发，新华社译)